

《闽都文化》杂志理事会

理 事 长	练知轩		
执行理事长	林宏修	黄 涛	徐启源
副 理 事 长	林 锋	高 翔	
理 事	鲍 闽	陈伙金	林 山
	黄文山	苏 忠	

《闽都文化》编委会

主 任	徐启源		
编 委	汪征鲁	赵麟斌	陈伙金
	鲍 闽	林 山	陈章汉
	黄文山		

《闽都文化》总第 67 期 2020 年第 2 期

主 管	福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主 办	闽都文化研究会
	闽都文化研究院

出 版 单 位	《闽都文化》编辑部
主 编	鲍 闽
执 行 主 编	黄文山
副 主 编	刘小敏 郭志杰
编辑部主任	曾建梅
编 辑	李铁生 王春燕
编 务 主 任	王 坚
编 务	单 南 何财铭
装 帧 设 计	乔 麦
封 面 摄 影	陆则起
地 址	福州乌山八十一阶 1 号
邮 编	350005
电 话	0591-88302020 88302021
电 子 邮 箱	minduwenhua@163.com
网 址	http://www.mdwhyjh.com/

闽 都 文 化

M I N D U C U L T U R E



敬请关注
闽都文化研究会微信公众号

杂 志 刊 号	CN-35 (Q) 第 0093 号
印 刷 厂	福州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12.00 元

声 明：本刊所发文章、图片未经作者和本刊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刊登。本刊已许可中国知网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支付的稿酬已含著作权使用费，所有署名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之行为视为同意上述声明。如作者不同意网络传播，请在投稿时声明，本刊将做适当处理。本期图文资料署名如有疏漏、差错，请与本刊联系。刊物如有印刷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电话：0591-83782241。

P4



品味一生一世

P21



消失的“马祖贩”

P28

守望船政人



世味流年

4 陈家恬

品味一生一世

船政之光

9 杨济亮

船政人物在台湾

16 康延平

立此存照

——75 年前的台湾回归

海峡流觞

21 林 庚

消失的“马祖贩”

24 施昌寿

在高雄的日子

岁月写真

28 邓啸林

守望船政人

左海风流

33 鹿 野

反抗者何遂

40 建 梅

创业者何康

聚焦世遗

47 莫 洁

“发现”编木

53 景 艳

编木为虹

Contents

P47



“发现”编木

P60



芳野行踪

P84

百舸争流待后生



在线读城

60 张 茜

芳野行踪

史池钩深

64 汪征鲁

剿繁决剧的能吏马亮

——两宋福州知州系列谭

闽地风采

70 林思明

名山石上文

——程师孟帅闽前后交游碑刻
与诗作欣赏

77 刘湘如 林依光

《容斋随笔》作者在福州

79 林 肖

无患瓷

84 林 敏

百舸争流待后生

八闽文脉

89 黄以胜

偶遇御医力钧

91 邱伟坛

隐去庐山真面目

封面 陆则起

屏南百祥桥

封二 杨 挺

绿风漫拂

封三 陈 曦

江上清风

封底 李锦峰

忆江南

品味一生一世

陈家恬

每年胡枝子含苞、盐肤木开花的时候，就有外地人来卖菜籽，有的是永春人，有的是大洋人，有的是霞拔人。永春属于闽南地区，相距永泰甚远，但他们的菜籽早已赢得乡亲信赖。大洋、霞拔是永泰县的两个乡，可谓乡里乡亲，彼此互信，也在情理中。

菜头籽、包菜籽、花菜籽、白菜籽，但凡村

里种过的蔬菜种子，他们的货担里都有。

菜籽是一份一份地量，一份一份地卖，而不是一两一两地称，一斤一斤地卖。量具呢，有的是酒盏，大小不一；有的是竹筒，小的像酒杯，大的像米管。一份多少钱，由他们说了算。每份一两块钱罢了。一户人家至多买三五份，没有多少钱，不大计较价格，计较的往往是量得满不



满，锥不锥。

他们的买卖也不一般，并非一手收钱，一手交货，而是一律拍赊，落落大方。有人看他们做小本生意不容易，当场就掏出钱来，但他们不肯收，还说：“等到收成了，再来拿，你放心，我也放心。现在收了，要是包菜不包，花菜无花，白菜不白，菜头冇头，怎么办？”既在理，又顺溜，引来一片莞尔。都说“做媒人不能包生团”，而他们却旦旦承诺，即使叫你怀疑，也觉得不好意思。他们随身带一本账簿，姓甚名啥，要么你报他写，要么你自己写。寥寥几笔即成玉律，胜过所有文书。那是最可靠、最纯朴的诚信。谁也没有疑虑，谁也毋庸置疑。届时，没有一个人赖账，双方高高兴兴，又赊出新一茬菜籽。

掘了早薯的园地，割了中稻的田地，大多不闲置，有的种菜头，有的种小麦。

菜头是极其重要的蔬菜。一户少则种三五分地，多则种一两亩地。饭桌上，整年飘着菜头的味道。

菜头多种多样。我说的菜头不是绿的，不是红的，不是紫的，不是圆锥形的，不是扁圆形的，也不是壮如牛脚的大菜头，而是普普通通的——内心洁白，表里如一，长圆锥形，最大也比不过锄柄的那种。

菜头其实是萝卜。但在我的老家，没人叫它萝卜。

有关菜头的文字记载，最早大抵是《诗经·国风·邶风·谷风》，那句“采葑采菲，无以下

体”中的“菲”字。菜头跟番薯一样，也有许多别称。《王祯农书》里说，北方人谓之萝卜，一种而四名：春曰破地锥，夏曰夏生，秋曰萝卜，冬曰土酥，谓其洁白如酥。此外，萝卜、芥根、地酥、芦菔、雹葵、紫花菘、温菘、萝卜、仙人骨，这些头衔也都属于它。当然，它还有一个高雅的名号：莱菔。菜头就是凭借这个名号，蜚声于五彩缤纷的中药世界。菜头可谓名、字、号俱全，比名人还名人。

顺带说一下“葑”。葑，芜菁古称，即蔓菁。那么，蔓菁为何物？唐人韦绚笔记小说《刘宾客嘉话录》写道：“诸葛所止，令兵士独种蔓菁者何。”所以它又被称为诸葛菜。乡亲们习惯叫它香炉头。事实上，许多人分不清芜菁和芜菁甘蓝。它们都属于十字花科芸薹属植物，成熟后，地里均有可观的肉质块根。它们很像兄弟姐妹，却非孪生，只要仔细观察，就不难区分。从叶片上看，芜菁是翠绿的，而芜菁甘蓝则是淡蓝的；从块根上看，芜菁像小香炉，呈白色，而芜菁甘蓝则像大纺锤，呈蓝色。

其实菜头是一种极平凡的蔬菜。它的种植方式跟小麦没什么两样，也是整地、起垄、啄掘、下基肥、播种，还有锄草、追肥、露水、收成。如果说有所不同，就是在它发叶三四片时，要间苗一两次——拔去过密或弱小的，每垄保留两三棵。

间苗跟拔稗一样费工，但心情却有天壤之别。因为稗是不能吃的，而菜头苗不仅可以吃，



菜头苗

而且好吃。菜头苗有个美丽的别名：菜团面，极言其幼、其细、其嫩、其柔。“幼面面”这一俗语，也许就来源于此。恰逢蔬菜青黄不接，菜团面的到来正当其时。一条瓷白的主根，擎着几片碧绿的嫩叶，用不着搓洗，过过水，就干净了。切也罢，不切也罢。炒也好，焯也好。幼小的菜团面一样维护着菜头的清高，如同它的名字，总是嫩的、绿的、清甜的、爽口的。

保留下来的迅速生长，几日不见，就大了许多。当它们刚刚长到镰刀柄那么粗时，母亲便开

始打它们的主意——先拔一些，并不多，一大把而已，抓在手里，径直回家，要么连叶一起煮，要么择去缨子，切成椭圆形薄片，或者擦成丝，干炒，没有味精，却像拌了糖，清甜、缠绵，配起饭来咕咕吞。半大不小的，拔了，确实可惜。可是，面对清汤寡水的饭桌，如何是好？能应付一顿算一顿，能敷衍三顿过一天。

白白嫩嫩的菜头越发膨大，努力向下钻探，以增加生命的深度；努力向上挺拔，以增加生命的高度；努力向周围扩张，以增加生命的宽度。此时此刻，如果仅仅说它们从泥土里探出头来，显然是小气了——不妨说它们大半身屹立在外面。是的，它们不怕风，不怕雨，不怕霜，不怕雪，不怕天寒与地冻，气宇轩昂，英姿飒爽，有如雄兵列阵。

一看那些胖嘟嘟的样子，就知道它们是早熟的，将要抽薹。抽薹是许多植物发生质变的标志。菜头一抽薹，它们的内心即告虚空，外围的肉质也渐渐纤维化，像纱布，像蚕茧，裹住自己，不能食用，顶多开些或白色或淡紫的花，送给蜜蜂，送给蝴蝶；再结一些瘦小的荚，留下一些干瘪的籽。

于是，视其成熟程度，分批拔起，好让那些尚能长大的菜头充分长大。收获总是喜悦的。每次跟大人去拔菜头，都会想起那首从外村听来的儿歌《拔萝卜》：“拔萝卜，拔萝卜。嘿哟嘿哟，拔萝卜。嘿哟嘿哟，拔不动……”跟着我一起快乐的，还有两条如影相随的小黄狗。



晾晒菜头



腌制好的菜脯

若要整条腌制，就让菜头在地里曝到七八成干时，再收回。择去缨子。根须留也行，不留也罢。清洗干净，将它们腌于木槿或水缸，每隔一层撒些盐巴，两个月即可熟透。想吃的时候，揀出一条，取其一半，足够你啃食一顿，同时附赠悦耳的脆响。

若要切片腌制，相对麻烦些。择去缨子和根须，洗去泥土，切成小拇指大的菜头片。摊于箬或崎簰，曝上几天。抓起一把，感觉软而不黏，润而不湿，那是正好的。收起来，摒于箬，撒些盐巴。光着脚握，又蹠又搓，又踏又揉，反反复复。直到它变得软绵绵、湿漉漉了，将它装入瓮或糟菜筒。一层层捶实，撒盐。装满，赭土封口。那一截直径四五寸，高三四尺，中间竹节掏空的糟菜筒，它的粗大，它的原始，它的简洁，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腌个把月，即可启封，有一股浓郁的菜头香味扑面而来。呈现在

你面前的幽香淡黄的菜头片，已经拥有另一个名称：菜脯团。掏出一些，清洗，拧干，放入沥了几滴茶油的热鼎。轻轻拨动，文火炒片刻，即可出鼎。又脆又香，淡咸之中有微甜。难怪人们在谈某事可望玉成的时候，往往会说：“有点菜脯味。”口气里透出耐人寻味的欣喜。若嫌个把月的腌制时间太长，就用开水烫一烫揀好的菜头片。拧干，装入小瓮，置于灶眉催熟，两三天便可应急。只是味道不如自然腌熟的纯正。

若要做咸菜脯，那就把洗好的菜头加盐焗熟。捞起，或沥干，或焙干。贮存，随吃随取。若想吃干菜头片或干菜头丝，那就把洗净的菜头切成细条，或擦成丝，曝干。清甜是它们的共同优点。

至于菜头缨子，最简单的做法是焯熟曝干。其实许多青菜都可以曝干贮存。比如菜豆干、芥菜干、包菜干、牛皮菜干。这一点，与鲁迅先生

写到的绍兴颇为相似：“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馑，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专喜欢储藏干物品。有菜，就晒干；有鱼，也晒干；有豆，又晒干；有笋，又晒得它不像样；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为特色的，也还要将它风干……”只是，我所感受的储藏干物，既不关涉曾经的饥馑，也不关涉不虞之患，完全契合《诗经·谷风》中“我有旨蓄，亦以御冬”的初心，仅仅是贮存方式的创新，恰恰彰显农民的节俭与聪慧，更何况它别有风味。不过，菜头缨子大多用于腌酸菜。腌菜头缨子与腌菜脯、腌芥菜相似。酸菜头缨子要比酸芥菜好吃。它的酸度没有那么高，纤维也没有那么多，口感良好。母亲淘洗酸菜头缨子的时候，那飘散开来的味道，常常把我吸引过去。她知道我想要什么，随手扯下几个薹子给我。她也会叼一个在嘴角，半咬半嚼，慢慢品味。而我却像牛羊吃草，迅即吃完，又跟长臂猿似的，将手伸到她面前。她要么翻来覆去地寻找，再扯几个薹子塞到我手上，要么直接从自己嘴角抽出一个应付我。还有酸菜头缨子羹——少许茶油正在鼎里冒泡，撒下几粒盐巴和一撮虾米，再撒下一把酸菜，摒入米饭，烧开。有点白，有点稠——说它是乳汁、琼浆、玉液也不为过。对我来说，饭桌上有了它，其他的就变得可有可无了。

台湾著名学者蒋勋先生在《从巴黎到池上乡村，我找回了平衡》一文中写道：“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像储藏宝，14年的橄榄，18年的菜脯，市



酸菜头缨子

场上买不到——不是价格昂贵，而是时间珍贵。在一切求快的时代，我们失去了对物质等待的耐性，没有耐性等待，会知道什么是爱吗？”在我的老家，再也见不到大片大片的萝卜景致了；虽有零星栽种，恐怕也没有人自己腌制菜脯，尤其是用缨子腌制酸菜了，因为超市里的小包装多得很，尽管品质一般，口味也不地道，倒也敷衍了人们对传统酸菜的思念。“18年的菜脯”，我是不敢奢望的。我心灵中的许多失衡，能够找回吗？除非待到告老之后，过上亦耕亦读的传统生活，步入随心所欲的田地。

我的童年关于菜头的暖色记忆大抵如此，虽然显得寒酸，但它却像母亲亲手泡好的酸菜头缨子羹，其中酸甜，足以品味一生一世。

船政人物在台湾

杨济亮

1945 年抗战胜利后，船政系人物与台湾关系密切。闽江江防司令李世甲率部接收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台恢复造船业，主要依靠福州船政系人才。1949 年以后，船政系列学校毕业生在台将领约 65 人，其中包括叶昌桐上将，郑本基、宋炯、欧阳良等中将，大量海军军官来自马尾海军学校。有多人入主台湾军政高层，在工商界也有不少出色的企业家。



李世甲

一、抗战胜利后李世甲率部接收台湾

1945 年 10 月 25 日 8 点 55 分，台北公会堂（今中山堂）内乐队高奏《胜利进行曲》，身穿崭新陆军上将服的陈仪缓步走入大厅，他的身后紧跟着台湾警备副总司令陈孔达、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行政长官公署秘书长葛敬恩、70 军军长陈颐鼎、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

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主官陈仪，将第一号令传达给日本台湾总督安藤利吉，依照此项命令，

台湾全境及澎湖列岛应交还中国，所有日本在台湾及澎湖列岛的陆海空军和警察，均应缴出武器，听候处理。短短 5 分钟的仪式，结束了日本在台湾 50 年的殖民统治。为纪念台湾从日寇统治下重归祖国怀抱，国民政府决定 10 月 25 日为“台湾光复节”。每年这一天，全省各地都要举行隆重热烈的庆祝活动，并放假一天。

为了这一历史性时刻，早在 1944 年 10 月，国民政府就成立了台湾接收委员会，负责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陈仪为主任委员，福州人钱履周

为该委员会九名委员之一，并兼常委，后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1945年5月，日军准备撤退，李世甲率海军陆战队与陆军八十师分三路进迫福州，先后收复了福州、马尾、长门。6月，李世甲调任海军第二舰队司令。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他作为接收专员，负责接收厦门和台湾的日伪海军。李世甲受委任后即以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名义，在福州《中央日报》上发布海军总司令部命令，通知在抗战时期所有因编制紧缩和因病因事离职的官兵限期报到。经审查共录用200多人（多为福州人），作为接收台湾日本海军的补充力量。

10月16日，戴锡馥团长率海军陆战队等官兵约1500人率先乘大帆船，从福州马江出发前往台湾，因沿途遇风受阻，延至28日才达基隆。

李世甲则于10月18日率部乘炮艇也从马江出发，19日晚上到达基隆，翌晨抵达台北，在台北教育公堂设立了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当天上午，李世甲即命令日本海军驻台湾司令官福岛中将，立即造具台湾日本海军投降官兵花名册，并造具舰艇、炮械、弹药、财产、物资，以及档案、图表、机密文件等清册各三份，听候点收；禁止对外通信，所有电台均由我方监视；战争期间，

在台湾海峡港口所布水雷，严令限期扫清，不得遗漏。当时台湾的日伪军加起来有20万人以上，日侨民有几十万人。日本受降之后，李世甲火速开始接收工作，由海军上校参谋严寿华负责接收在基隆的日本海军，由海军中校参谋叶心传负责接收在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自己则到高雄左营军港接收日本海军，命令军港司令黑赖贺少将把武器、物资悉数上报。经过两个月的工作，一共接收日本海军俘虏19000多人，就地集中管理，分批遣返。李世甲接收马公、左营两港后，又被海军总司令部任命为台澎要港司令。同年11月，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乘“长治”号军舰赴台湾，在高雄左营与李世甲会集后，至台湾各港岸视察接收情况。这年冬季，国民政府裁撤海军总司令部，设立海军处，由军政部长陈诚兼处长，陈绍



叶昌桐拜谒陈绍宽故居

宽被迫去职。李世甲深感海军处境困窘，于1946年5月辞职离台返榕，不久，转上海休养。

二、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在台恢复交通和航运业，主要依靠福州船政系人才

战后的台湾百孔千疮，一片颓废，急需人、财、物的支援。福州作为与台湾历史渊源紧密的福建省会，迅速掀起声援台湾复兴建设的浪潮，福建同意台湾方面以其特产来交换所需物资，并给予优惠价格，以推动台湾经济快速发展。1947年，福州市政府紧急向郊区购买生猪运台救急。在人才支援方面，当时，台湾的专业技术人才严重不足。福建学院、协和大学、法政专科学校、高工、高农、高商、高航及省福中等院校的青年学子纷纷奔赴台湾。在国民党海军接收马公、基隆、左营等军港后，马尾海军制造所专家及海军学校毕业生即前往台湾，主持这些军港和造船所的建设。福州海军学校、福州海军制造学校和福



萨本炘

建省马江私立勤工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福建省立林森高级航空机械商船职业学校毕业生和马尾造船厂技术人员中的许多人，纷纷进入三个军港及造船所工作，成为台湾铁路公路交通、港口、航运和造船业及之后核电业的技术骨干。

萨本炘，其叔祖是清朝海军统制、民国海军总长萨镇冰，其长兄是“中山”舰舰长萨师俊（本俊），萨本炘排行第三。1913年，他考入福州海军学校第12届管轮班，受到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影响，立志投身祖国的海防事业。当年10月，船政后学堂直属海军部管辖并改名为福州海军学校，管轮班改名为轮机班（即第一届）。萨本炘在校8年，刻苦、勤奋、好学，学业成绩优异。1920年9月毕业，就被派到“江真”号炮舰实习。1925年，萨本炘赴英国格拉斯工业大学学习造船。1934年曾任马江勤工学校校长一职。1945年，收复台湾，结束了日本军国主义统治，国民党政府着手在台恢复修造船业。1946年9月，经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举荐，任命萨本炘为台湾机械制造公司总经理协理兼总工程师及基隆造船厂厂长。其时，恢复进程相当缓慢，直到1948年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台湾机械公司和台湾造船公司。造船公司系以基隆造船厂为基础进行扩展，改派周茂柏出任公司总经理，仍属海军造船基地。萨本炘则到广州，应中山大学工学院陆风书院长之聘，担任该校教授。1948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前夕，萨本炘毅然由广州回到福州故里。

福州闽侯人林则彬，光绪二十七年（1901）11月生，1913年经人推荐考入福州海军制造学校丙班就读，曾因用功过度而咯血，后因学潮肄业。他学的是制造专业，却被派到漳厦铁路从事测量选线，3年后任胶济铁路工务段段长，1934年升任铁道部新路建设委员会委员，1936年任成渝铁路重庆江津工务段段长，抗战时，曾负责川滇铁路造线，曾任中印公路副处长，承担尤陵到密支那洲公路施工。

1946年，林则彬受职为台湾高雄港务局局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宣战后，美军飞机自菲律宾起飞，轮番轰炸高雄港。接任时，港区仓库荡然无存，航道大小沉船百余艘（达10万吨位以上），码头毁坏达97%，满目疮痍，一片狼藉。港务局仅180名员工，人力既缺，财力更紧。林则彬身先士卒，刻苦奋斗，前后历时3年，打捞沉船，清港除障，重建仓库，修复码头、驳岸、港区、道路、桥梁等，使之恢复生机，由进出4000吨轮船提高到万吨轮船，为后来扩建高雄港打下基础。

1949年，林则彬转任台湾省公路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至1957年升任为局长，仍兼总工程师。台湾光复初期，主要公路均系卵石路面，年久失修，又经战乱，不堪使用。自接任至1954年



林则彬（前排右）与工人们在修路时的合影照

5年中，修复西岸主干线，使全线300多公里的公路贯通，并铺设沥青路面，成为台湾第一条柏油路。又修建中坜至丰原130公里的中丰公路，整修恒春三线公路计106公里。在此基础上，1954年决定修建中部东西横贯公路。此路须翻越3200多米高的中央山脉，沿线悬崖峭壁，深溪穷谷布满其间，地形十分复杂。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已有计划，并修建台中至屯原与花莲至铜门两段，不久因工巨费艰，未竟所施。台湾光复之后，又议修建。自1950年起，叠经勘测，终以工程浩大，经费无着而作罢。1954年当局决定兴修。林则彬不惧勘测时左腿已被巨石砸伤之悸，身先士卒，身体力行，施工中时刻不离第一线。他亲率公路工程人员20多人，历时40多日，深入中央山脉原始森林踏勘选线。几经研论，最后选定主线由台中经丰原、谷灵、梨山、天祥、太

鲁阁而达花莲，支线由梨山经思源、埤口、四季至宜兰。主、支线全长306公里。1956年7月动工，1960年4月完工通车，历时3年10个月。在近4年施工中，林则彬和建设者基本上是靠人工和简陋工具完成台湾东西横贯（中横）公路，结束了台湾东西不直通的历史。1963年林则彬着手兴建北部东西横贯公路。始自台北县，经桃园县之三民乡、复兴乡、荣华、马陵，跨过中央山脉，经池端至宜兰县，与中部东西横贯公路相接，全长90公里。此线地形复杂，难度之大不亚于中部东西横贯公路跨谷架桥。大汉溪深谷的一座长为71.5米的钢拱桥和一座吊桥，工程极其艰巨，而设计、施工、监造，都由福建连江人、工程师严启昌完成。因设计独特，景观优美，今已成为旅游景点。

1993年秋，93岁的林则彬带着小女林淑德专程回到别离50年的福州，并写有《福州故乡行》：“11月20日晨，经六一路、福马公路，穿鼓山隧道、快安隧道及马尾隧道到罗星塔前，经

200多石阶入塔内到顶层，远眺码头及船厂，闽江正在拓深航道及填海工程。回程经水运所，即前船政局旧址，亦系余母校（海军制造学校）地址，一切改观了。”他对故乡和母校都具有深深的感情，说是收获甚多，不虚此行。

20世纪50年代，借助先进工业国家经济转型的机遇，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出口量急剧飙升，因此，急需提升台湾的港口吞吐能力。经过多方反复物色，最后选定了福州籍军人、“海军后勤署”署长、少将陈鸣铮领衔建港工程。陈鸣铮，1916年出生，少时在福州海军学校第5届轮机专业学习。他是1938年武汉会战中“中山”舰20多名幸存者之一。此后，他担任“太康”舰轮机长、第一舰队司令部轮机长、“海军后勤署”署长等职。1971年调任台中港工程局局长。陈鸣铮率领建港大军，历时12年，在沙滩上建成了一个年货运量达755万吨的大港。

其他曾在台湾航运港务、造船修舰系统任职的船政系人物还有1937年福州海军学校第6届航



陈鸣铮



池孟彬

海班毕业的池孟彬、林濂藩、曾耀华、邓先涤，第7届航海班毕业的甘敏，第8届航海班毕业的陈在和以及福州海军学校造舰班毕业的王衍球和官明，轮机科的陈定九、黄玉春等。这其中，闽侯人池孟彬是池仲佑的侄孙，曾参加抗战时期长江中游布雷工作，后任台湾航业公司总经理、阳明海运公司董事长；林濂藩自幼以乡贤林文忠公为范，官至台湾海军中将，1976年任台中港务局副局长，负责港航营运等工作；闽侯人王衍球曾任台北市“中国造船公司”基隆总厂厂长、高雄总厂厂长、联合船舶设计中心董事；官明去台湾后，一直服务于台湾造船公司，历任台船设计组长、联合设计中心高级主管。

另外，闽侯人朱以润曾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对台湾的核电工业贡献良多，曾获“十项建设”有功奖。1946年，朱以润毕业于马尾私立勤工工业职业学校。其父朱心庄毕业于福州海军飞潜学校（第1届特别级）。

三、1949年以后的船政系在台军政人物

船政学校毕业生在台将领约65人，其中包括叶昌桐上将，郑本基、宋炯、欧阳良等中将，大量海军军官来自马尾海军学校。梁序昭，福州仓山梁厝人，早年入福州海军学校丁戌班学习德文，后转烟台海军军官学校航海班17届毕业。历任舰长、第一舰队司令、第二军区司令。国民党第八届中央委员。1949年赴台，初任“海军总

部”署长，旋任“海军舰队训练司令”。1954年6月升任“台湾海军总司令”。1959年调任“国防部副部长”，至1963年12月。1964任驻韩国“大使”。1967年回台，受聘“总统府战略顾问”，后改聘“国策顾问”。

魏济民，福州海军学校第5届航海班毕业，抗战后任青岛海军军官学校校长。1948年冬，青岛临近解放时，魏济民奉令将海校迁福建厦门。1949年2月，因“重庆号”起义事件，被当时台湾海军司令桂永清陷害扣押，直到1952年桂永清被赶出海军，魏济民无罪释放。魏济民获释后，蒋介石为安抚他，曾亲自召见慰问。后魏济民外放任联合国代表团顾问，20世纪60年代初任台湾驻委内瑞拉“大使”等职，退职后迁居美国。

常香圻，是船政学堂管轮第8届毕业生常朝干的亲侄子，1931年经其保荐，考入福州海军学校第5届航海班，成为魏济民的同学。因学业优良，常香圻提前两年毕业，于1935年6月被选送赴英国皇家海军大学留学。1938年抗战全面爆发，常香圻与同学们一起回到了战火纷飞的



宋 炯

祖国，任海军学校教官，在海校千里转移中，仍坚持教学。赴台后，一直在台湾海军军官学校当教官，后升至台湾三军大学教育长，中将军衔。

此外，台湾国民党海军中船政系海军将领还有福州海军学校第3届航海班毕业的郑天杰、陈庆甲和林溥，第5届航海班毕业的柳鹤图，第6届航海班毕业的邱仲明、林鸿炳、何树铎，第8届航海班毕业的陈在和、葛敦华和江济生，航海班第9届、青岛海军学校毕业的邹坚，福州海军学校第10届航海班毕业的张振亚、林蛰生，第11届航海班毕业的郑本基、刘和谦、罗锜、区小骥，第4届轮机班毕业的王先登，第5届轮机班毕业的杨熙龄，第6届轮机班毕业的曾尚智，第7届轮机班毕业的欧阳良、张宗仰，航海18届寄闽班毕业的高如峰等。

船政系精英赴台后也有不被重用的，如美国波音飞机公司的第一任总工程师王助（1893—1965）。1918年王助任海军部福建马尾海军飞机工程处副处长，并兼任飞潜学校专业教官。由于他出身烟台海军水师学校，隶属于北洋海军系统，带他到英国留学的清朝大臣萨镇冰甚至将孙女嫁给他。这样的背景反而成为王助无形的“枷锁”，始终未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只在成功大学教书。1965他在台南抑郁而终，享年73岁。

20世纪80年代初，两岸人员往来松动后，不少船政精英选择了回乡定居。如福州马尾海军



林纘民（左四）到福州大学任教

学校轮机科毕业的陈定九（1898—1987），宁德霞浦县人。1949年随国民党退台后先后任台湾第三造船厂工程师，基隆海洋学院副教授、图书馆副馆长兼外文部主任。1979年元旦，他从广播中听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深受鼓舞。7月，他借台湾当局放宽出境旅游之机，办理赴美旅游签证，至11月24日毅然回归祖国首都，与妻儿团聚。不久，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员办公室专员（后改为参事室参事），定居北京。还有黄花岗烈士林觉民的堂弟林纘民，早年毕业于福州马尾海军学校，是台湾海洋学院教授，20世纪80年代初回到故乡福州并被福州大学聘为机械系教授。闽侯人林可玘（1901—1997），1913年考入海军制造学校，曾任台湾“立法院立法委员”，并任青年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等职。1992年，林可玘回到大陆，定居于故乡闽侯上街镇。

立此存照

——75年前的台湾回归

康延平

这是一个必须充满仪式感的时刻，它是用14年的战争、3500万个鲜活的生命、中国半壁江山的损毁换来的。这场用血与火换来的胜利时刻定位在1945年，而16个受降区中的台湾受降区又显得那么与众不同：只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输掉甲午海战，它先于大陆50年就成了日占区。

但这一天——1945年10月25日，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政府，理直气壮地收回属于自己的领土，这一时刻自然永载史册。

盟军代表陪同下，步入会场。日军投降代表安藤利吉、谏山春树等则在陈仪下令后才列队低头进入会场，并在指定位置立正后向陈仪行鞠躬礼，随后又自行解下所佩军刀双手呈给陈仪。

9时整，陈仪高声宣布接收令，安藤利吉谦卑地点头后在受领证上签字画押。陈仪审阅受领



受降典礼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举行

1945年10月25日，中国战区台湾受降区受降典礼仪式在台北公会堂举行。当天上午8时50分，受降主官国民党上将陈仪将军在多名国军将领及

证后也用点头以示认可，并下令日军代表退场。

整个仪式前后只用了5分钟。但这5分钟宣告了台湾日本殖民统治50年的终结！

不知是巧合还是特意掐时间，这5分钟让整个仪式更具仪式感——5分钟吐尽50年郁闷。

签字仪式后，陈仪昭告天下：

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此一极有历史意义之事实，本人特向我国同胞及全世界报告周知，台湾现已光复。

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二战”结束。作为战败国，日本政府不得不执行《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无条件向中国政府移交台湾、澎湖列岛主权。

8月26日，中国战区受降主官、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宣布，台湾、澎湖列岛为中国战区第16受降区，受降地点设在台北。由于历史原因，与其他15个受降区相比，接收台湾受降区形势更复杂、任务更艰巨。

首先，台湾受降区与另外15个受降区社会性质截然不同。另外15个受降区在中国大陆战区，是日本从1931年开始逐步入侵后形成的沦陷区，而台湾受降区却是1895年日本根据《马关条

约》割去的中国领土，也就是它们是日本的殖民地。日本在对台湾、澎湖列岛实行的50年殖民统治期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日本政府统治机构。

其次，台湾受降区日本驻军人数颇多。“二战”期间，日本在台湾实施战时体制，推行“皇民化、工业化、南进基地化”的治台政策，使台湾成为日本侵略东南亚国家及中国大陆的重要军事战略基地，大批日军包括陆军、海军、空军等各军种部队进驻台湾。截至日本投降时驻台日军仍有20万之多。而且这些日军仍有一定的作战实力。再加上战争期间驻台湾、澎湖列岛的日军未曾受到中美军队的地面军事打击，仅遭受美军的几次空袭，所以直到投降日，驻台日军伤亡很少，各部队编制员额仍旧充足、武器装备完备、军需供给充足，整个部队仍有一定的作战能力。

再者，通过50年的经营，台湾有了数十万的日本侨民。这么多的侨民要返回日本，还有日军战俘需要遣返，这成了中国军队军事接收中的又一项繁重任务。

三

1945年9月14日，接收台湾的工作紧锣密鼓地开始了。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空军上校张廷孟率领空军部队5架P-51式驱逐机，率先飞到台北松山机场，成为首批进驻台湾的中国军队。

飞机降落后，张廷孟一路径至总督府。日本在台的“末代总督”安藤利吉急急忙忙跑到门口

迎接。一身戎装威严无比的张廷孟指着总督府门前的太阳旗厉声下令：我是中国空军第一路军司令张廷孟，奉命接收台湾机场。我代表中国政府命令你立即降下日本国旗！安藤利吉应声诺诺，下令降下日本国旗。

9月17日，张廷孟又率领第22地区空军部队飞到澎湖列岛，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中国第23地区空军部队则于9月26日飞抵台南。

由海军接收专员李世甲率领的中国海军第二舰队陆战队第四团及海军布雷中队1500名官兵，于10月19日晚到达基隆，第二天一早进入台北。在台北教育公会堂设立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部后，李世甲命令日本海军驻台司令制作投降官兵花名册，并将所有舰艇、炮械、弹药、财产、物资和各种档案、图表、机密文件也归册，一式三份，听候接收。为防止暗中破坏者内外勾结，中国海军随即监视了所有电台，切断日军官兵对外通信渠道，同时严令他们限期扫清战争期间在台湾海峡和各港口所布水雷，不得遗漏。



从10月13日开始，中国陆军第70军和第62军分批从原驻地乘军舰进入台湾，分别负责台湾岛北部和南部的军事接收。

10月17日，由柯远芬率领的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的工作人员200多人进驻台北，这标志着中国接收台湾的行政机关和军事指挥机关同时进驻台北。

作为中国战区最高长官的蒋介石任命陈仪为台湾行政长官，统一领导接收台湾工作。

10月24日，受降仪式的前一天，台湾受降区受降主官、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陈仪上将飞抵台北。安藤利吉亲自率领日军高级将领到台北松山机场列队恭迎。就在陈仪走下飞机、军乐队高奏礼宾曲时，曾经不可一世的安藤利吉庄重地向陈仪行礼后又立即低下头去，以示日军臣服之意。

10月30日，陈仪向台湾地区日本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安藤利吉发出军字第一号命令：



基隆港旧景

自11月1日由台北开始，向中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李世甲所指定人员移交海军舰船、武器及所有物资，受其区处。

李世甲令第二舰队参谋长彭瀛驻台北，为台北地区接收日本海军的负责人，并设海军基隆港口办事处，令海军上校参谋严寿华为处长，负责接收驻在基隆的日本海军。

之后，李世甲亲自率领海军陆战队推进高雄左营军港，令该军港日军司令官黑濑贺少将悉数交出武器物资等待遣返；11月初，又率部渡海至澎湖列岛接收马公港，设海军马公办事处，由海军中校参谋叶心传任处长，负责接收澎湖列岛的日本海军。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16个受降区内，台湾受降区的军事接收工作从1944年4月开始到1946年3月结束，持续时间长达23个月，是开始时间最早、结束时间最晚的一个区。在这个区，中国军队共接收驻台日军飞机890架、船舶525艘、

车辆2097辆、炮1315门、枪13万余支、弹药680多万发以及一大批军用物资器材。

各种火炮拨发给驻台中国军队作军事训练使用，弹药一部分上缴中央，失效报废的就地掩埋。火药则直接拨发给行政公署下属的工矿处使用。

汽车、船舶一部分拨发给驻台中国军队使用，一部分拨借给行政公署下属的警务处、农林处和市政府以及水上警察和渔业部门使用。

军用铁路及通信器材则拨借给行政公署下属的交通处使用。

军粮除留足驻台中国军队及日军战俘生活所需外，剩下部分拨借给地方平余，以平抑当时台湾岛内粮食价格上涨过快现象。

军用布匹调拨一部分制作军官服装，蚊帐鞋袜等均发给部队使用。日军营房仓库能用的继续作为营房仓库由中国军队使用，不适合的予以拍卖。

最后是遣返大量日军战俘及日本侨民。



基隆港今貌

四

陈仪要求中国军队在军事接收过程中，对日军战俘实行“勿记旧恨”的宽大原则。

为做好日军战俘遣返工作，台湾省军事接收委员会于1945年12月1日成立战俘管理处，下辖5个战俘管理所；同时又在基隆港和高雄港成立遣返日军战俘和日本侨民的运输司令部。

为使日军战俘能够较好地配合中国军队的遣返工作，接收委员会又下令驻台日军战俘成立“日本第十方面军善后联络本部”，任命安藤利吉为联络官。同时成立的还有“日本侨民管理委员会”。

为使驻台日军投降得心服口服，接收委员会特意拟定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战俘管理处教育计划大纲》等文件，并采取演讲会、巡回教育、广播教育、文字教育、政治座谈会及辩论会等形式，对日军战俘进行思想教育，启发引导他们正确认识《马关条约》不平等在什么地方；1931年后日本不断扩大和发动的对中国大陆及东南亚国家侵略的法西斯性质；启发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中国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法文件规定，收回台湾主权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由于需遣返的战俘及侨民总数多达45万人，需要大量的船舶和较长的运输时间，中国军队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人力物力，是驻台美军伸出了

援助之手。在他们的协助下，从1945年12月25日至1946年4月26日，短短4个月就完成了遣返任务。此次共遣返包括少数韩国战俘在内的日军战俘165638人。日本侨民除少数有技术专长、本人又愿意留在台湾工作的，共有292713人被遣返。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波茨坦公告》第10条规定：对于战争罪人犯，包括虐待吾人俘虏在内，将处以法律之裁判。

驻台日军中当然也有犯有破坏和平罪、违犯人道罪等罪名的战争罪人犯。

在收复台湾的整个过程中，负责战争调查的人员也没闲着。经调查核实，在1945年1月美军飞机轰炸台湾的作战中，部分美军飞行员跳伞后被驻台日军俘虏，时任日军第十方面军司令的安藤利吉曾下令对美军飞行员先实施非人道的虐待再予以杀害。在美军的指控下，安藤利吉被捕。

1946年1月12日，包括安藤利吉在内的20名驻台日军战犯嫌疑被押送到上海等候审判。安藤利吉自感虐杀俘虏罪不可赦，于1946年4月1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给冈村宁次写下悔过书后服毒自杀。其他战犯经审判都得到相应惩处。

记忆是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个人若丧失记忆，只能行尸走肉般地生存；一个民族若丧失记忆，那它将成为什么？重拾记忆会疼痛会伤感，但再疼痛再伤感，历史就是历史，不能故意忘却更不能特意歪曲。

“勿记旧恨”不等于可以忘却旧恨。

消失的“马祖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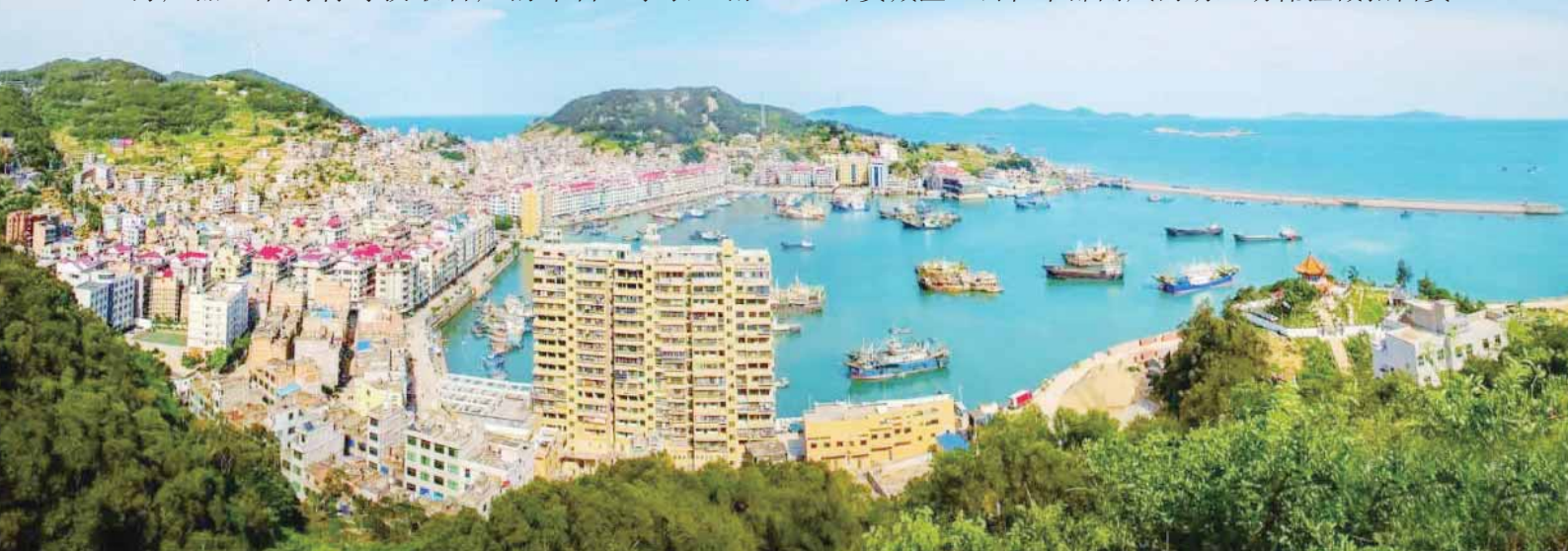
林 庚

连江黄岐与马祖一衣带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习俗相近，素有“里山”与“外山”之称。倘若风平浪静之时，从黄岐摇橹4000下，舢板船就可抵达近在咫尺的北竿岛。自古以来，岛上所需柴米等日用品均依靠黄岐提供。1953年之后由于两岸对峙，民间小额贸易中断。20世纪70年代初，马祖渔民利用与大陆渔民海上接触的机会，开展以货换货的零星贸易活动。

1979年后，长达30年的两岸隔绝状态被打破。这时期，黄岐渔民利用在海上作业时机，以海产品、中药材等换取台产的布料、手表、雨

衣、三用机等物品。黄岐人称之为“走东沙”（民间讹称“走大沙”）。“东沙”是东莒岛的旧名，位于马祖列岛的最南端。该岛是当年两岸渔民间贸易活动聚集点。“走东沙”比“发大海”（渔获大丰收）获利更大，“嗜利忘禁”者与日俱增。

当时两岸贸易管理一度失控，境内一些不法分子在海上走私贸易，牟取暴利，干扰正常的民间贸易活动，“走东沙”便成了打击对象。渔民们趁着夜幕开着船只前往马祖列岛海域，然后满载布匹、三用机等货物，凌晨时分返航靠岸，卸货藏匿。公社干部闻风而动，动辄拦截扣留货



物。那时候，笔者哥哥在黄岐公社做临时工，负责办公室文字工作。公社有一次拦截“走东沙”行动，人手不够，也将“心肠软”的哥哥喊去凑数，安排他在土岗上负责守护缴获的布匹堆。因为看到一个布匹被收缴后痛哭流涕的老妪，哥哥怜悯之心顿生，悄悄地将三捆布匹踢到土岗下面。老妪颤巍巍地抱起那三捆布匹，急匆匆地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事后，哥哥跟祖父说起这件事，祖父只是颌首微笑。当过“船老大”的祖父在“公社化”生产队解散后就赋闲在家了。哥哥也不想再参与这种行动了。

不幸者倾家荡产，幸运者盆满钵满。不少“走东沙”的渔民捞得第一桶金后，个体集股购买钢质渔轮，将目光投向远洋捕捞业。1985年之后，渔民购置钢质渔轮拖网成为热潮，远洋捕捞业得以迅速发展。

随着对台政策的开放，海峡形势的缓和，通过海上渠道的对台小额贸易逐渐增多。1986年连江凤翔贸易公司成立，进行对台小额贸易，将大陆的农产品、海产品等生活用品驳运到马祖岛，黄岐“马祖贩”也应运而生，开始专营与马祖的海上贸易活动。全年除遇台风无法出海外，他们每天从省城、县城及各地采购粮食、蔬菜、猪羊肉等农副产品及日常生活用品，先运到黄岐，然后出港在海上交易。“马祖贩”鼎盛时期，年交易额在500万美元以上。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福州读书，暑期带着一项社会实践的作业回黄岐。恰好三姐夫从事“马祖贩”。在他的帮忙下，我花了一个多月时间，走访几位知情人，撰写一篇散文《马祖贩，两岸贸易的“导航员”》，后来发表在《福建经济报》上。我用抒情的笔调写道：

“黄岐，东海畔的一座小镇，一个古老的渔乡，马祖岛是它遥遥相望的近邻。老一代的渔民还记得他们年轻时候跨海踏洋来往海峡间。众所周知的原因，那‘海路’消逝了。

“十年前，一个月明的晚上，几位勇敢的渔民乘着船儿，满载着羊肉、蔬菜、鱼虾……与马祖船



停靠港内的拖网船



从畚箕山上眺望对岸的马祖

旧址上出现了当地第一家台资企业，深得渔民们喜欢的台湾产雨衣雨靴便在这里出厂了。另一位台商申请在“畚箕谷”沙滩上建造别墅式宾馆——他认为黄岐镇真正引进台资，当务之急要下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靠在一起，大家轻轻握手了……

“从此，‘马祖贩’们载去了大米、蔬菜、鱼肉、番薯……载回的是雨鞋、衣服……现在，‘马祖贩’渔船已发展到22艘了。据悉，市场上日用品、食品、酒类等约43%便是出售给‘马祖贩’的。每当夜幕降临时，码头上便摆满了一筐筐的货物，这些货物经对岸的马祖岛涌入台湾。”

如今，“马祖贩”那种“秘密”的海上贸易逐渐公开化了。这一民间贸易改善了两岸的气氛，特别是海峡对岸的马祖岛驻军不再为难当地渔民了。过去，马祖渔船晚上出海接货时，渔民家属便躲到山上，待天亮船归才回家团聚。

“马祖贩”繁荣了黄岐半岛的市场，改善了对台贸易的环境，对台贸易得以迅速地发展，现在台商还可以直接在黄岐购货。“马祖贩”——那些两岸贸易“导航员”，掀起了推动巨龙腾飞的一波又一波投资浪潮。

后来，在“车阑尾”山巅的对台有线广播站

当地人都说：“‘马祖贩’引来了‘金凤凰’。”的确，一个小小的渔村，除了当地人建的冷冻厂外，再没有其他工厂了。台商建厂如平地惊雷一声响，“马祖贩”们掀开了那帷幕的一角。

“马祖贩”也带动来此探亲的人们寻根谒祖，回馈桑梓。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捐资办学。

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马祖贩”发展高峰期，仅黄岐镇四海（海建社区、海兴社区、海新社区、海丰社区）就有40艘左右从事“马祖贩”的渔船。1992年，黄岐港先后被福建省人民政府批准为“台轮停泊点”“对台小额贸易点”和“对台渔工输出点”，黄岐由此成为连江县对台开放的前沿平台，其人员和货物往来在全省35个台轮停泊点中位居前列。

近年来，由于两岸经贸交流的不断升级以及大陆经济快速发展，从事“马祖贩”的渔民越来越少，“马祖贩”将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在高雄的日子

施昌寿

20 世纪 40 年代后期，父亲在高雄港务局任专员。我家住在市区一幢两层楼的员工宿舍里。这是日本侵占台湾时期的老建筑，位于如今高雄五福四路与鼓山一路交叉口。

我家和另几家港务局的员工都住在楼上，楼下无墙无门无人居住，所有金属构件都被日本人拆卸一空，下水管道渗水，阴暗潮湿，散发着腐臭。孩子们都不敢去那儿玩耍。“二战”结束台湾已光复三年了，高雄市政建设仍毫无起色。

在周边有路无市的这幢楼里，因有我们这几户人家居住，才平添了几分生气，与我们住同一楼道的其中三户人是福州老乡，一户姓陈，生有一个女儿和我同龄。因为还想生男孩，就按福州习惯给她取乳名抱弟。抱弟长得肥胖，因家长管束严，我们都不喜欢和她玩。住在中间一户是个单身女子，独来独往，不善与邻居交流，若不是有位音乐老师来找她，扯上福州话，我们还不知道她也是福州老乡。倒是那位音乐老师很健谈，他是日本投降后才到台湾来谋生的。他曾和父亲一同哼唱他们当学生时的福州学堂乐歌。我们很

快也学会了，记得歌词是：“春天来了，春雨潇潇，春风飘飘，春花开放了。红的红来白的白，矮的矮来高的高，有的一瓣一瓣开放了，有的半开半放正含苞。花儿好，花儿娇，春花开放人人爱，爱她的颜色俏俏，模样儿妖娆。大姐姐、大姐姐，你爱哪种花？哪种花儿妙？告诉我们知道。”父亲说这首学堂乐歌，只要那个年代在福州念书的学生，几乎人人会唱。而那位独居的时尚姨姨却从来不唱，她经常唱的是当时流行的时代歌曲，如《夜来香》《花样年华》《五月的风》和《三轮车上的小姐》之类的。到了夜晚，她便浓妆艳抹地出去过夜生活了。

这座楼房与我家隔壁的高姓人家，虽也是福州人，但因为不在同一楼梯，所以极少往来，倒是高家兄妹时常下楼上楼地找我们兄妹玩耍。哥哥名依秋，妹妹名依美。粤港澳民间习惯称呼“阿”字，如：阿叔、阿婶、阿明、阿标等，闽南亦然。福州一带则喜欢称呼“依”，如依伯、依姆、依弟、依妹，或是依明、依标等。高家兄妹都说福州方言，从不说普通话，当时叫“国

语”。依秋年龄比我大，他教会我玩“贱骨头”，即陀螺。这是古代传统玩具，木制圆锥形，尖端插一铁钉，倒竖地上，用一根绳鞭不断地抽打，使其不停地旋转，否则就会倒下，于是便有福州大人责打孩子时说“你真是‘贱骨头’，不打不‘嘎闹’（滚动）”。春节前北平税务部门退休的祖父带着祖母老两口来到高雄，投靠独生子——我的父亲。他俩虽在外多年但乡音未改，不久家住福州仓山的堂叔也来我家，托父亲给找个事做。抱弟一家人更是不时茶余饭后过来串门。一位从淮海战场败退下来的国民党兵，是父亲少时英华斋的老同学，老福州人称学校为“斋”。他常来找父亲发牢骚，他们说的都是家乡话。我的算术（数学）老师是用闽南话教学，我听不懂，故成绩极差。父亲就延请一位老乡端木先生来给我补课。我才知道福州人称老师、医师为“先生”。端木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用福州腔极重的普通话教我。几年以后我回到福州，读到鲁迅

的《藤野先生》，就会联想起我的端木先生。

这座楼堆积太多的福州元素，无异成了福州人的世界。我耳濡目染逐渐听懂了家乡方言，知晓了福州特产。最引起嘴馋的是赛园橄榄，最好奇的是大人们爱喝民天酒厂的“の半酒”，起初我以为这是日本酒，因为那“の”字分明是日文，其实是草书的“四”字，这也许是商家的广告艺术。在高雄，福州的特色工艺品是当时的稀罕物，我们这几户人家因是福州人，多少都会有一些，诸如脱胎漆器、油纸伞、牛角梳等。而父亲常用的是洪塘篦梳。现在的人基本不用篦梳了，而我儿时常看到人们用非常细密的篦梳把头皮屑篦出来，头发愈显得油光滑亮。

福州洪塘不仅产篦梳，还盛产“不求人”。这是一种挠痒痒的竹耙子，一尺多长，人们背后痒痒自己挠不到时就用它而不求人帮忙，取名“不求人”真是福州人生动贴切的创意。它另外一个妙用，就是以此当作竹批来责打读书不



赛园橄榄



洪塘篦梳



内九彩巷

努力的孩子手心或屁股，方言称：食“毛笋干炒肉”。但祖母的“不求人”只是她的专用物，我从来没有动过。还有一种自己捶背用的竹柄布槌子，也叫“不求人”。

祖母出生于福州城内蔡氏家族，虽是大家闺秀，却无甚文化；但是她说许多福州掌故，我和高家兄妹还有抱弟都爱听，她说的福州急避巷（吉庇巷）的由来是我最早听到关于三坊七巷的故事，她还津津乐道地和老乡们谈起福州许多老地名的俗称：韭菜巷、豆芽菜巷、鲞耶巷、酸枣营、笕篱巷、篦梳巷……不一而足。

若干年后，我回到福州，才看到这些街巷的土名俗称已有了正式的雅称，一一对应的是：九彩巷、大门彩巷、孝义巷、孙老营、早题巷、秘书巷等。现在号称美食一条街的达明路，20世纪50年代是名副其实的“弹棉河沿”。那时从双抛桥向北经元帅庙，水流湾有一条内河（今已填平），河沿经营着一排弹棉花的店铺，成天有节奏地传出“嘭嘭”的弹棉声。福州话“弹棉”与



孝义巷

“达明”谐音，谁先谁后，无从考证。

话说这些福州老乡，离乡背井到台湾谋生，大家都很关切故乡。那年闻讯福州“做溪水”，洪灾严重，父亲主动牵头，发起了一个向福州同乡募捐的赈灾活动。整座楼不但户户踊跃捐款，还分头出去向全市的福州同乡募捐。我亲眼见过那枚印证收款的木质临时印章。据说那笔义款后来捐给了福州受灾较重的某私立学校。

春节临近，那时福州人都称“做年”。“年暝

兜到了”，准备灶糖灶饼“谢灶”是福州的习俗。高雄那时没有搭配齐全的现货，老乡们就分别零散地采购了“老鼠仔”（一种油炸淀粉条，小手指般粗细，甜的）、金钱饼、芝麻糖、花生咖还有我最爱吃的红纸包成麻将牌似的杏仁酥，五颜六色地盛满一个大盘子，彰显浓浓的年味。

除夕前，这座楼的老乡还相约一同带上自家的孩子到新落成的市中心“五层楼”商场去给老人、小孩购置新衣服。那是台湾光复后新落成的高雄市区最高的建筑。此前高雄的建筑可能因防台风、防地震、防轰炸或是技术原因，从未超过

四层。在那个年代，“五层楼”就和广州珠江边的爱群大厦一样，鹤立鸡群于全市之上。各家吃过年夜饭后，都按照福州习俗在家“守岁”，孩子们都拿了压岁钱到街上买“枝仔冰”（闽南语：冰棒）吃，而福州人冬天是不许孩子吃“冰箸”的，说吃了会“病泻”（拉肚子）。

大年初一之夜，各家都按习俗早早地入睡，父亲用福州话说这是“斗夜灯”，我听不懂，只知规矩如此。初二一早各家都带着孩子外出到亲朋好友家拜年，当然都是福州老乡，我去的好几家也都在案头上摆满红红的福橘，拜过年临走时，主人总要抓几粒塞给我“做意利”（图吉祥）。回到家里我分给邻居几个小伙伴，大人们都说“这是我们福州螺洲的特产，又有福又有吉”。于是祖母又给我们讲了田螺姑娘的民间故事，孩子只听得有趣，大人听着不禁勾起思乡之情。抱弟的爸是个闽剧戏迷，还会咿咿呀呀地哼上几句，虽然听不懂，但是我们都爱听他讲戏文，他讲的“貽顺哥烛蒂”“荔枝换绛桃”等掺杂着“半咸淡”的普通话和福州方言，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记得有一次讲到甘国宝在台湾当总兵的故事时，大人们还为了甘国宝是屏南人还是福州人争得面红耳赤。

不久，父亲调出了港务局，我家也就搬出了那幢宿舍楼，告别了那些福州老乡。那时战事吃紧，海峡两岸已不通航，父亲通过港务局老关系，率全家搭乘一艘油轮，绕道返回了大陆。我和抱弟还有高家兄妹等从此中断了联系。



福州灶糖灶饼

【编者按】为挖掘整理船政文化，福州市 2019 届市管引进生（清华、北大、人大）与马尾中国船政文化管委会、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福建船政文化交流协会等联合发起“福州船政文化口述历史计划”，至今已对十几位早期船政工人进行了采访。本文系联合采访组对林键的采访成果。林键出生于五代海军世家，长期以来专注于船政文化研究、保护、开发，以一己之力创办《船政文讯》，并聚焦基督教史研究和马尾地方文史研究，为船政文化研究、保护和开发做出了贡献。

守望船政人

邓啸林 整理

初次见到林键老师，是在马尾中国船政文化管委会的办公室里，第一印象是有点沉默寡言，但是一谈到熟悉的船政历史，他的话头马上就多了起来。你很难想到，眼前这个其貌不扬的中年人，血脉里居然有这么厚重的历史，由他完成的“马江海战炮台、烈士墓及昭忠祠”和“福建船政建筑”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备案工作被国家文物局评为 A 等，学历并不突出的他也参与了“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国家重点社科项目。他的论文《福建船政中枢机构建筑的布局理念》曾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福建船政创办 150 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并结集出版。在马江海战纪念馆的近 20 年时间里，他曾多次给省部级领导讲解，并

在国内最早提出“福建船政工业遗产”的概念。

五代海军世家

林键出生于三个海军世家联姻的五代海军世家。清同治五年（1866）福建船政创办之时，林键高祖林世贵（字道崧）与其弟林道藩由闽侯凤港来马尾船政务工，是首批华匠。不久林世贵任船政帆缆厂委员。光绪十年（1884）中法马江战役之后，他曾监装闽江口金牌、猴石、烟墩等处炮台，因功赏戴花翎钦赐五品军功。林世贵娶福清黄氏，育有一女三男：长子林元钊，船政前学堂肄业，后任汉阳铁路核算员；次子林元铨为船



民国海军参军中将林元铨将军

政驾驶学堂第18届毕业生，曾任总统府参军海军中将（列入《福州市志·人物传》）；三子林元鋈（1892—1934），字长鋈，号肃轩，系林键的曾祖父。清光绪末年林元鋈经族兄林森引荐就读于福州鹤龄英华书院，民国五年（1916）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南京海军雷电学校第二届无线电班，获学校奖励金壳手表一块。毕业后历任东北吉黑江防队旗舰“江亨”舰通信官、海军海岸巡防处东沙岛无线电观象台台长、浙江省坎门无线电台台长、观象养成所教官、福建省民政厅公署无线电通信官、上海吴淞口海军巡防处无线电联络官和教官等。

林键祖居马尾中岐“城泰埕”，原是著名水菜行商号“城泰”王氏所建宅地，后“城泰”破产，王氏将房产典当与林家。从“城泰埕”这里走出了林键的爷爷林修瑜这一辈的多位名人。长房长孙林修藩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留学比利

时国立岗城大学，获土木工程与电力机械双硕士学位，抗日战争期间他作为中国桥梁专家响应胡宗南战区司令的号召，在敌后修建以木头架设的铁路桥梁，为西安输送晋煤。1944年6月率团赴华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途经此桥，为之惊叹。抗战胜利后，林修藩获国民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和证书，1948年赴台任日月潭大观发电厂工程师。长房孙女林修娟适严复侄孙严家和。长房孙子林修基（原名林修熙）先后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医科、中正医学院，他是当代血液病专家、浙江医科大学博士生导师。二房孙子林修灏是林



在台湾的林氏家族合影。左起：三姐夫海军少将杨录（杨树庄之侄），大姐夫严家和（严复侄孙），大哥林修藩，五弟林修瑜

元铨将军的长子，他曾留学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获中国最早的药学博士学位，任贵州九三学社常委（列入《福州市志·人物传》）。二房孙子林修璘曾任国民政府中央勋绩委委员。二房孙女林修杰适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侄儿杨录。杨录为台湾海军少将。三房孙子林修瑜是林键的祖父，他毕业于中央南京警校第二期。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他是第一批参与光复台湾的警界人员，后来担任台湾省警界督察教官。三房孙女林修俊适刘荣霖，刘荣霖曾先后以第一名成绩毕业于马尾海军学校、英国皇家格林尼治海军大学，曾任“重庆”舰副舰长（列入《福州市志·人物传》）。

林键父亲林齐瑄1946年出生于台北东门町，1947年3月随母亲从台北返回福州定居。1986年

初他进入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工作，为马江海战纪念馆第一任负责人，后来又参与了全国第二次文物普查工作，撰写了20世纪80年代马尾区一些口述历史材料。林键说：“我如今也从事马尾区的文史研究工作，希望将本地区冷落了30年的地方社会史往前推进一步，因为大家都去关注船政专门史了。”

从林键高祖开始到他这一代正好有五世，除曾祖父、祖父在外地工作之外，其余都未离开马尾，一直与马尾有种种机缘巧合的联系。马尾地方社会史就浓缩在他的家族史之中。“这让自己对家乡的文史建设工作具有深厚的情怀，我为自己能够在前辈们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动地方社会文史研究而感到自豪。”林键说。



马江海战纪念馆（昭忠祠）



民国《陶江林氏族谱》

同时，林键也是海军任光宇将军家族、马尾周氏海军世家、海军林元铨家族三个海军世家联姻的后代。任光宇将军家族居于琅岐，他的堂妹任文箫适马尾中岐周氏周宗颐，其宅位于马尾街最繁华的马尾前街下排行，就是原马尾影剧院正对面，马尾人熟悉的“北方水饺”里面宅邸的周家。周宗颐是周家老四，毕业于船政绘事院。他曾任上海江南造船所绘图师、厦门船坞绘图师。周宗颐与任文箫之长女周慧玉是林键的祖母。正是这种家族传承，让林键有责任、有义务为弘扬船政史、地方史、家族史做一些工作，这也是支撑他长期坐“冷板凳”的重要动力。

一己之力办刊

让人惊叹的是，这么一个船政世家出来的子弟，这些年竟然甘于寂寞，办了一件很有文化价值的事——以一己之力办一份关于船政研究的刊

物。

2014年1月，林键从福州马江海战纪念馆借调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在此期间，他专职办了一份《船政文讯》的期刊。

《船政文讯》是A4开，每期含封面有12个版面。主要内容有：新闻动态、船政史涵、船政论坛、船政人物、船政艺文、文化遗产、基地建设、文化交流、史迹探寻、特稿、随笔等。创办这个刊物的目的在于：弘扬船政精神，加强船政文史研究，让各界及时了解船政文化建设、发展、研究、教育等各个方面的资讯。《船政文讯》总共办了两年，总计18期，每期印制500份，主要向福州市宣传主管机关及地方史学专家、船政后裔等发送。

在《船政文讯》编辑部，林键既是执行主编，又要负责文字、美术、约稿、摄影等具体工作，甚至稿费的发放和其他相关经费，都由他自己承担。他几乎倾注了他所有的精力办好这份刊物。“所以在那两年埋头苦干期间，感觉时间过得特别快，人也瘦了一圈。”谈起这段往事，林键唏嘘不已。

醉心于基督教史研究

在林键看来，以马江侗社社长的身份，以文入史的陈公远是马尾文史第一人，在他身上体现出“文史并生”“医儒同源”“立德、立功、立言”等特点。正是在陈公远的影响下，林键开始醉心



2016年12月林键在纪念船政创办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留影

于马尾地方文史研究，并形成近3万字的研究成果，对基督教史的研究也与此密切相关。

“我们从事文博文史工作的人，就必须‘广博精专’，知识面越广越好，知识点越精越好，这就是说对世界史、本国史、地方史都要了解。尤其我是做近代史、中西文化交流的，我们既要对外方文化核心基督教有所了解，也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通过网络，林键给我们发来这段话，阐述自己研究基督教史的“初心”。在进行马尾造船厂老工人口述历史研究的时候，林键对于其中一些工人的教会背景格外感兴趣。

林键表示，在大航海时代来临的世界背景下，福州作为东方的沿海城市，在道光末年就成了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这里从明代末年以来就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心。明末著名的“三山论学”开启中西文化史无前例的深度交流，迨至近代，西方教士来到福州，在

他们的著述、书信里会以异域的视野记载当时并不为国人关注、但是在今天看来却十分重要的关于近代福州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的研究内容。要全面深入了解近代福州社会，除了看中文史料，还要借助英文史料才能有更多新发现，这些史料让人十分惊讶和着迷。2013年他曾参与完成国家重点社科项目《福建与中西文化交流史论》，负责其中第六章《近代福州圣公会神学教育史》的撰写。故此，林键对近代福州西式教育史、教会神学教育史都十分熟悉，这对研究船政的教育史也有益处。许多船政学子早年都毕业于教会学堂，他们先在教会学堂受到良好的英文教育，才能在就读马尾海军学校之时，快速适应全英语、法语教学，所以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很好，比如陈绍宽、刘荣霖等都毕业于福州格致学校。

谈起未来的船政研究、保护、开发，林键有很多自己的心得。在他看来，船政的开发，不仅要突出“城”，也要突出“港”，要把本土经验和世界眼光结合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要有一些默默奉献的初心。

整个采访时间不长，给人的回味却是绵长的。正是因为有了一批像林键这样的人传递船政薪火，赓续地方文脉，长期深耕基督教史和马尾地方文史，船政的研究、保护、开发，才会大有希望吧！

（本文联合采访组成员：邓啸林、江心雨、陈为通、黄晗微、蔡琳琳、邱宁远、徐锦龙、陈莹）

反抗者何遂

鹿 野

2019年10月22日，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里人潮涌动，共同见证吴石、何遂两位将军的铜像落成。吴、何两家的二十几位亲友后代从海内外齐聚福州，为铜像揭幕。分隔半个多世纪以后，两位生死至交以这种方式重聚故乡，曾经潜伏在暗夜里的英雄，名字不再只隐于档案之中，他们和无数为人民解放做出牺牲的烈士一起，站到了阳光下，接受后世子孙的怀念与敬仰。



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英雄广场吴石、何遂两位将军铜像落成揭幕仪式

缘于前几年电视剧《潜伏》的热播，吴石将军为原型的余则成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共密使、谍报英雄。但是吴石先生的好友、革命之路的引领人何遂却鲜有人知。即便在立有“辛亥元老何遂故里”之碑的福清港头镇，问起何遂将军，也很少有人对其生平事迹诉说一二。

也难怪故乡人不识，何遂待在故乡的时间不长，因为父亲在江西南昌做官，何遂从小跟着父亲到了江西。何遂出生于1888年，正是清朝帝国行将覆灭的时候，各地反清的声音不断。10岁那

年，父亲带回一本书，那是在泸州做县官的祖父所写的《余蛮子事略》。余蛮子原名余栋臣，四川大足县龙水镇人，原是背炭为生的贫苦农民，后加入哥老会，勇猛侠义，成为大足龙水镇哥老会龙头老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因法国传教士授意官府禁止百姓举行一年一度的迎神赛会，余蛮子率众捣毁教堂，被官军诱捕收押。为了救出余蛮子，当地民众及哥老会发动劫狱。在此事件中，余蛮子的孩子和两个弟弟都被杀害。官府和民间的矛盾由此激化，数千煤窑、纸厂工人拥戴余蛮



何 遂

子为起义领袖，几个月时间，队伍从几千人发展到几万人，波及全川 30 多个州县。起义持续了一年多，才被清军剿灭。

《余蛮子事略》一书记录的正是起义的原因和经过。何遂祖父身为朝廷命官，却为一民间反清斗士写传，可见彼时的社会民心对于革命者充满了期待与同情。这本背着父亲偷偷看的手抄书，成为何遂此后一生革命生涯的启蒙。

第二年，何遂的祖父去世，正值中年的父亲也在奔丧中哀劳过度死去。11 岁的何遂和母亲弟妹一起到泸州投奔二叔，一路上所见瘟疫横行，饿殍遍地。他还见到，二叔家里买了许多丫头，任意摧残打骂。寄人篱下的何遂，对旧时社会这种对人的剥削与不平等所产生的厌恶与不满与日俱增。

1900 年，清廷下诏变法，准许各地办新学。何遂开始接触革命思想。《盛世危言》《新民丛报》，魏源《海国图志》，尤其同乡侯官严复所译《天演论》，成为当时寻求中国出路的一剂良药，无人不

受其影响。正值年少而精神苦闷的何遂也从“天演论”适者生存的思想中窥见了一个窗口。面对灾难深重的晚清末世，那个时代的年轻人似乎都显得比今天的青年早熟，血液里澎湃着救国救民之理想，何遂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位。至 1903 年，15 岁的何遂与母亲家人离开四川返回福州时，已经长成了一个初具民主革命意识的新青年了。

二

回到福州的何遂通过一位当翻译的远亲介绍，进入福建武备学堂第二期预科班学习。武备学堂是 1902 年由闽浙总督许应骙创办的一所军事学校，位于今天的津泰路鼓楼区政府所在地。校内请日本人担任教官，所学均为军事学。何遂家住三坊七巷附近的灵响路。彼时，林觉民、方声洞、林之渊等人就读于福建省立高等学堂（今福一中旧址），陈与燊、陈更新等人就读于侯官小学，这些同样充满了革命思想的年轻人聚到了一起，革命热情在他们心中激荡。他们交换革命书报，尤其读到《扬州十日记》中百姓遭屠杀的惨景，何遂伏案恸哭，悲愤难抑，发誓此生拼尽全力也要推翻封建王朝统治。

在福州仓前山的望北台，何遂和年轻的革命同志们举行聚会演说，痛陈清朝统治之腐败、列强对中国之侵略，讲到动情处，声泪俱下，痛彻心扉，台下听者莫不深受感染。

这些激进行为虽然不容于校方，但毕竟是学生课余为之。而在课堂上，何遂所表现出来的反抗精神就让老师坐不住了。在一堂汉文课上，老师要求学生读诸葛亮《出师表》后作文，本意想要宣扬诸葛亮之忠君精神，何遂却在作文中讽刺其愚忠于一家一姓。学校终于找到了开除这个“刺头”的由头，但同学们却纷纷声援何遂。校方和学生的对抗一直闹到闽浙总督衙门。何遂这个反抗者的形象算是坐实了，不仅武备学堂不敢再留，官方甚至通电福建省内各国公使、各省督抚，都不能收留何遂。年轻的何遂不得不离开福建，寻找出路，这成为他革命生涯的开始。自此以后，他将在革命的路上经历无数次的辗转逃离和追求寻找。

此时的中国，改革之声已经成为潮流。立宪派，改良派，革命派，各方都在寻找救国之路。当时，日本为了笼络中国的革命青年，对中国的留学生开放自由，何遂一度也想要东渡日本，但考虑到家人的负累，经济上的拮据，他听从了同乡林森的建议，在林森介绍下到南京林述庆的新军队伍当中，当了一名军人。何遂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去不了几天，剪下了辫子，穿上了军装，从此在狮子山麓石头城下度过了一段艰苦的军旅生活。”

进入军队的何遂因其激进好学，如鱼得水，只一年时间就从三等参谋考入河北保定陆军学堂，同时又与北方的革命党人孙岳、王法勤以及同在保定就读的革命党人方声涛、吕公望、林知

渊等人建立了联系。

1909年，21岁的何遂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保定陆军大学。时逢同为福州乡亲的王孝缜（清末状元王仁堪之侄）受广西巡抚张鸣岐的委托，到北方延揽新军人才，何遂和一班年轻的革命党人满怀热情到了广西。1910年，何遂会同干部学堂、陆军小学堂、学兵营等几个部门的同志20多人聚在一起，组建了广西同盟会支部，这是广西同盟会的初始机构，他们在一起办报纸，写文章，鼓吹革命，并与香港的同盟会总部建立起了联系。何遂除担任干部学堂的参谋处筹略科科长以外，还兼任干部学堂的教官，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干部学堂的师生也倾向革命，纷纷加入革命的队伍。

广西桂林福棠街2号，如今是桂林地税局所在地。1910年，何遂和同志们聚集在一间小小的公寓里，商议筹划起义之事。在这里，他们曾经接待了外省来的同盟会同志。1911年，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方声涛的姐姐方君瑛、弟弟方声洞、嫂子曾醒从广州来到桂林共商起义。他们计划化装成送葬的队伍偷运军火至广州。但因为消息走漏，原定的起义计划被迫提前。3月30日，广州黄花岗事败，尚未来得及赴港增援的何遂看到失去弟弟的方声涛接到电报后悲恸欲绝，狂饮大醉。此次起义中牺牲的福建籍烈士达23人，其中陈更新与何遂最为熟悉。在福棠街2号的寓所里，两人曾兴奋地谈论革命到半夜，有时候困了就和衣挤在一张床上睡去。何遂还曾调侃身材

瘦弱的陈更新，看似文弱书生，如何敢上战场，引得陈更新大怒，要与他决斗。倏忽之间，斯人已去，令何遂及留下来的革命者悲愤不已。这可能是何遂第一次亲身经历革命失败、战友离去之痛，但也让他认识到，革命的残酷与牺牲之必然。

哀恸过后，何遂离开桂林，北上与革命者会合，准备伺机而行反清之举。就在此时，武昌传来起义之炮声，新一轮席卷清王朝的战斗打响了。此时湖北的新军领袖吴禄贞正担任清军第六镇统制，驻军河北，受朝廷之命赴武昌镇压革命军。吴禄贞欣赏何遂身上的革命精神，他将何遂收编入军，作为自己的参谋。行军途中，何遂设计扣押了清军运往武昌的军饷、物资，给山西的革命党人营造时间。当时吴禄贞已经联络了山西的阎锡山组成燕晋联军，反攻北京。时至今日，仍有人在设想，如果这次起义成功，中国的历史将如何走向。但令所有人没有预料到的是，吴禄贞身边最亲近的副官被袁世凯收买，在起义的前夜割下了执火者的头颅。何遂亲历了那个混乱恐怖的夜晚，他听到枪声，赶到吴禄贞身旁时，吴已躺倒在门槛边。“南吴北袁”并称的吴禄贞之死为此后袁世凯势力崛起让出了道路，中国在向民主自由进步的路上又往复周折。

吴禄贞被害之后，燕晋联军推何遂为燕军都督，继承其遗志，反攻北京。但几轮对抗过后，队伍溃散，何遂和战友为了躲避清军的追剿，化装成和尚躲进五台山，风声鹤唳，九死一生逃到南京，与革命大本营会合。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但南北割据，孙中山不得不同意袁世凯窃位之举。原以为革命成功之后，国人能享受太平，将所有的精力致力于富民强国之路，但接连不断的割据纷争与没完没了的政治倾轧，令置身其中的何遂和一帮当初怀着热血想要救国救民的同志深感前途渺茫。革命是一时之勇，而管理和重建一个国家则需要更多的智慧和勇气。何遂又重温去日本学习政治经济的念头。

1913年，北洋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依然混乱不堪，因宋教仁遇刺，孙中山领导发起的二次革命失败。何遂经日本人须藤军医的帮助，和王孝缜等人流亡到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主修政治经济学。

“当轮船缓缓地开出吴淞口外，我回首遥望苦难深重的祖国，依然风雨如晦。多少年来梦寐系之的一次革命就这样失败了。一刹那间，真是百感交集，心乱如麻。在这时许多人灰心了，当然也有许多人没有灰心。我也深感前途渺茫，一时还找不到一条救中国的道路……”

但是在日本，似乎也没有找到他们理想中的救国之路。当时何遂的妻子陈坤立无法忍受日本教育中所宣扬的对女性权力的打压和漠视，两人在一年之后又放弃学习回到国内。

此时袁世凯正策划着重建帝制，全国上下对他的倒行逆施已经怨声入云。云南护国军打响讨袁第一枪，何遂也游走山西、浙江、安徽等地，联络各地军阀力量共同讨袁。川湘两省的讨袁通

电一出，袁世凯在惊惧与暴怒中死去。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位，何遂因为在反袁中出力颇多，被黎元洪派往欧洲观战。何遂便借此机会，暂别乌烟瘴气的国内，赴欧走了一圈。

从1916年底到1918年7月回国，两年多的时间里何遂游历了日本、美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瑞士等诸国。目睹了“一战”中的欧洲各国的成败得失之后，何遂对于理想中国家的设想更具有了一种文明的高度，并形成了《参观欧洲大战记》的报告，大力推崇瑞士之自由平等精神。对西方各国的观察，让他对于战争与政治的思考也更加深刻而具有现实性。

在何遂之子何达的回忆当中，还多了一个细节：何遂此行是以空军负责人之资格赴欧观战，一路上目睹了战场上的职业军人，有白发苍苍、伤痕遍体而勋章满襟者，不过上尉少校之阶。何遂内心大惭，整个过程自动改佩中校肩章。据说以何遂此举始，后以代表身份出国考察军事者，多在肩章上自动降级。

三

自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到1928年蒋介石统一中原，中国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军阀混战。1926年，何遂所在的国民军失败后，杭州涌金门外91号西湖边上的一栋小楼里，对于长年的混战感到疲惫的何遂把精力转向了考古和书画。他搜集了数千计的瓦当，200多枚铜鉴，一一拓印成

册，至今中国国家图书馆仍保存着他的四册瓦当拓片和两册铜鉴拓片本。其间蒋介石派陈铭枢与何遂见面，请他出面斡旋，让原有的直系军阀归顺北伐军。事成之后，何遂谢绝了蒋总司令的酬谢，仍旧回到涌金门外91号的小楼里，继续醉心于考古。

彼时国内连年内战，民不聊生，老百姓企盼和平统一，而此时的蒋介石被认为是统一中国、结束内战的最佳人选，故何遂以蒋为友，在蒋忙于中原战事，无暇兼顾黄埔军校事务的时候，何遂还曾以代校务的身份管理黄埔军校。现在立于黄埔军校旧址中的孙中山纪念碑即为何遂在校时主持修建，碑身上所书的“和平，奋斗、救中国”几个大字即为何遂以帚代笔所书。但随着蒋



黄埔军校旧址孙中山纪念碑上的“和平，奋斗、救中国”

介石在清党运动中对共产党采取残忍手段，对待抗日又是消极态度，何遂与蒋介石渐行渐远。1929年，何遂辞去黄埔军校代校务之职，闲居北京。

何遂向来主张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何遂随朱庆澜将军一起组建辽吉黑热义勇军后援会，朱庆澜任会长，何遂任常务副会长、55军军长，坚持在热河抗战，谱写了一首可歌可泣的义勇军抗战之歌。为了筹集抗日军费，1931年，何遂将家中收藏之古物字画悉数拍卖，首批运至上海展览的2000多件文物，吸引了叶恭超、傅斯年来观赏。为了不让这些文物流失国外，在叶、傅二人的撮合下，大部分展品由南京中央研究院收藏，何遂所获的奖金4万银圆捐给辽吉黑热抗日后援会用于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国共合作局面形成，何遂对在民族大义面前放弃党争、团结抗日的共产党心怀敬仰。尤其在和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高层领导的接触中，何遂更加倾心共产党。他利用自己的关系，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送枪送药，争取军饷，还把自己的好友、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缪秋杰等人介绍给共产党。正是在他的介绍下，吴石将军成为中共地下党员，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

四

从少年时期武备学堂那一节作文课开始，何

遂就以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展开自己风云变幻的一生。其子何达说他不爱钱不爱权，唯爱名。他所崇拜的战国时期的鲁仲连，纵横捭阖，以不战之姿力挽狂澜。在风云诡谲的晚清民国的历史漩涡当中，何遂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却没有自立山头当军阀的野心，仅以“参谋”“幕僚”之身份甘居幕后，如他所崇拜的鲁仲连一般，不在风口浪尖，却时时左右潮向。

他一生反清政府，反袁世凯，反军阀割据，反日军侵略，反国民党之腐败，反蒋介石之独裁，但是在儿女和孙辈们眼中，他又是一个温和与宽厚的长辈。作为国民政府要员，他默许甚至鼓励孩子们加入共产党，奔赴延安，还利用自己



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前行执杖者）、何遂（其右执杖者）等考察敦煌莫高窟情景。左一为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



何遂书画作品集

的关系，三番五次为困难时期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帮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以辛亥元老之身份，出任司法部部长，又担任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但因身患心脏病，1952年以后何遂就退居幕后，潜心于书画及考古。

虽退居一隅，但他名士之性格却未改。在直系军中之时，就因看不得冯玉祥亲信王铁珊之有名无实，故意以福州口音将“铁珊”呼为“铁栅”，友人私下问之，何遂说其人如栅，远看威严近看则满是漏洞；又讽刺直系军中善于趋炎附势者，如自行车骑手“伏低身子，双膝猛蹬”；而最常为身边人提起的是蒋介石某日派副官邀请他会面，因为不屑副官假委员长之命令语气，何遂竟闭门谢之；后来在“文革”当中，何遂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到政协礼堂参加批判同为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的右派分子黄绍竑的集会。正当大家群情激愤围攻黄绍竑的时候，他独自离席到小卖部买了一盒冰激凌，送到满头大汗的黄绍竑面前。

留德学医的日本籍名医矢原谦吉民国时期在北平开医馆，由于医术精湛，许多达官贵人及其亲眷求诊，因此得以接触众多军政界人士，留下许多不同于正史的秘闻，辑为《谦庐随笔》一书，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当中对张学良、冯玉祥、宋哲元等民国时期朝野名流颇多臧否，唯独对何遂称誉有加，说他“豪放有才又旷达，真文士也”；闽侯同乡林庚白在《何遂旧体词集序》中评其“天分甚高，不屑以兵家自限，旁通六艺，兼能敏捷。其词于平易之中存真，以性情之人，宜有性情之词，此其所以迥殊凡响欤”。

“英雄各有文章在，圣义应教性命轻”，这是晚年何遂对逝去的革命旧友的追怀之词，也是一个“反抗者”戎马一生、南北驱驰，为革命、为理想至死不悔的心迹自陈。



（本文部分资料引自何达、王苗主编《何遂遗踪——从辛亥走进新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创业者何康

建 梅

—

我近年来常有这样感觉，觉得生活宽广深厚，我们要做的事很多，心中充满了愉快，对事业充满信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个人的思想都消除了。高黎贡山的杜鹃花，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家，海南岛迎风摇曳的椰子树，亲眼见它一年年长大的胶树都引起自己的留恋与深厚情感，我有时很愉快，感到自己不会为个人用自私侵占我整个心灵！

这是何康 1957 年 8 月 20 日写给妻子缪希霞的信里的一段。

彼时，35 岁的何康刚从北京林业部调至海南工作，任华南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所长。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不久，经历了长期的战乱，一个伟大的国家正在复苏和兴起，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充满着希望，青年人积蓄了满身的力量，有着火一般的热情和

浪漫，要为此这个崭新的国家贡献一切。

何康生于 1923 年，因为父亲何遂的关系，少时辗转多地求学。1936—1937 年，何康在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就读，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开除，后来加入周恩来领导的抗敌宣传第七队，到武汉和襄阳以演剧方式宣传抗日。1939 年 5 月，何康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何康父亲何遂是辛亥革命元老，为推翻帝制和封建军阀统治冲锋陷阵，九死一生。何遂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历来主张积极抗日。九一八事变之后与朱庆澜将军成立辽吉黑热义勇军民众后援会，又为 55 军军长，多次毁家纾难，为抗日倾尽全力。西安事变后，何遂将军赞成中国共



年轻时的何康与缪希霞



何遂一家合影，后排右二为何康

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等建立了良好关系。正是在父亲的影响下，何康的两个哥哥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奔赴延安，何康则留在上海，由叶剑英、董必武直接领导。1946年因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国共双方合作局势发生变化，为安全考虑，三人关系由中央直接领导转至中共中央上海局。

1947年4月，在何遂何康父子的引荐下，国民党高级将领吴石与中共上海局的领导者刘晓、刘长胜、张执一等在锦江饭店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之后，吴石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张执一单线联系，何康为联络人。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何家寓所，吴石与张执一有过多次单独会面。何康回忆：吴石“不断送来重要情报，大多由他自己送来，有时则包扎好，写明由我父亲收，派他的亲信副官聂曦送来”，这里面包括在渡江战役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民党长江江防兵力

部署图。

很多年后，吴石之子吴韶成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冷暖人生》栏目的专访中回忆说，父亲吴石在1949年随国民党撤离大陆去台湾之前，在他学校的信箱中匆匆留下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了六个字：“有事情，找何康。”

当时，何康的父亲何遂、二哥何世平一家及妹妹何嘉都已经按组织部署在台做统战工作。吴石到了台湾以后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力劝他们回到大陆。尤其对于多年的生死至交何遂，吴石买好了台北直飞香港的机票，并亲自将何遂送至机场，看他上了飞机才离开。所以当1950年吴石在台湾遇害的消息传来，已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部长的何遂悲痛不已，认为老友是替自己牺牲。此后多年何遂何康一家一直为落实吴石烈士的身份奔走，直到1973年，吴石被迫认为烈士。1994年，吴石夫妇的骨灰归葬于北京福田墓地，与何遂夫妇墓地紧邻，归葬仪式由何康主持。

二

如果说父亲何遂一生的事业都是在反抗与斗争，那么何康则是在建设与创立。父亲一辈所梦想的强国理想，在和平年代才得以实现。从抗日到农业报国，何康从小受到父亲的影响。父亲何遂从小就灌输他们“民贵，农本”的思想，给他们讲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管仲“仓廩实而知礼节”的思想，所以何康从小就有

一种观念：中国是土地大国，人口众多，自古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只有农业发达了，人民才能富足，国家才能太平。

1941年，因父亲何遂工作调往广西，原本在成都光华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一年级的何康转学至广西。他听从党内领导人董必武的建议，选择广西大学农学院的农艺系，重新从一年级学起。广西大学农艺系有“战时农都”之称，何康师从著名农业学者马保之。他是当年学校两名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之一，另一位是李崇道——诺贝尔得主李政道之兄。20世纪80年代，何康任共和国农业部部长时，李崇道当了台湾“农业复兴委员会”主任（相当于农业部部长）。同宿舍的黄成达任港英当局渔农处处长。“一室三部长”，成为佳话。

1949年，上海解放，何康参与接管工作，任上海市农林处处长。1950年成立华东军政委员会，何康被任命为农林部副部长，时年27岁。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作为军需物资的天然橡胶严重匮乏，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不能生产天然橡胶。周总理指出，当务之急，是自力更生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基地。

林业部领导赴苏谈判，斯大林提出苏中合作，发展天然橡胶事业。苏联提供专家（但苏联并没有橡胶专家，只有农业专家）和机械、化肥、农药等，在我国生产的天然橡胶，按国际市场价卖给苏联等国。

为了开辟中国的橡胶事业，也便于和苏联专家打交道，需要挑选一个有专业文化又有政治资历的年轻干部主持具体工作。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的何康被选调到北京，担任新成立的林业部特种林业司司长，时年29岁。由此他的小半生工作生涯都与中国的热带作物联系在一起。

橡胶树原生长于南美巴西的热带雨林中，它的生长发育需要高温、高湿、静风和沃土。《大英百科全书》中断言：橡胶树仅生长在界线分明的热带地区，大约赤道南北10度以内。世界各国的橡胶也都分布在低海拔的赤道以南10度到赤道以北15度之间。而我国海南岛的南端已是北纬18度了。如何克服寒潮、台风和土地相对贫瘠等不利条件，大面积种橡胶并达到较高产量，这是一个突破传统植胶禁区的创举。

为了橡胶，29岁的何康带着一家四口主动由司长变所长，由北京下迁广州，再到海南，创建了华南特种林业研究所和华南农学院海南分院。

当年那是一所茅草房，职工每人每月仅19斤口粮，一场台风，学校的房顶就被吹走。更艰难的是科研环境，当时海南只有几十万株橡胶树成龄开割，一枚橡胶果比一两黄金还要金贵。何康翻译外国橡胶种植资料，编写教科书，办英语培训班，与学生一起种红薯。他和科学家黄宗道一起突破外国专家的植胶禁区，成功地在我国北纬8—24度地区大面积种植橡胶，成为一个世界创举。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海南农垦已经成

为我国最大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

本文开头的一段，正是何康在海南艰苦创业时期写给妻子缪希霞的信。在海南的20年，何康奉献了自己的一切，包括妻子的健康。

三

何康比缪希霞小三岁，两人既是夫妻，也是战友。在成都读光华大学起，两人就是同学，到广西大学又是同学。

缪希霞出生国民政府高官之家，才貌出众，在广西大学时经常演出京剧和话剧而成为校花。由她担任主演的曹禺名剧《日出》给师生们印象极深。当时陈寅恪先生执教于西大，看了她的演出，后来到成都燕大遇到缪希霞的妹妹还问起“陈白露”。缪希霞在校时追求者众，其中不乏才华出众的进步青年。但她不为所动，因为她心中早已属意自己在成都光华大学就朝夕相处的何



缪希霞饰演话剧《雷雨》中的陈白露的剧照

康。

二人不仅从同学到夫妻，更是亲密的同事和战友。1947年9月，中共上海局指示，以何康父亲何遂和岳父缪秋杰的社会关系和身份，在上海愚园路俭德坊2号成立“瑞明股份有限公司”，何康任总经理，缪希霞任财务人员，以此为掩护开展地下经济工作。为了应付一次突如其来的经济警察的搜查，缪希霞用棉被遮住窗户，挑灯夜战，连夜赶制出一本假账，由何康第二天带着账本去警察局。在缪希霞的多方奔走和疏通之后，何康才得以脱险。她还数次以国民政府盐务总局局长女儿、立法委员儿媳的身份来往于上海香港两地，传递情报。1948年，这位广西大学的校花，在爱人何康的影响和介绍下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和平年代，为了支持丈夫何康的橡胶事业，缪希霞脱下大家闺秀的旗袍，换上列宁装，到了海南并肩作战。为了两人的事业，也为了妻子的身体，何康在生完第二个孩子之后做了绝育手术，他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应该心连心，互相体贴，把我们的全部精力投身于工作，再不产生什么苦恼……我有信心依靠群众，创立新型的热带作物科学体系，这是我国应担负起的任务，总有一天我们看到热带国家的解放，那时作物更有飞跃的发展。”

在儿子何迪的记忆当中，海南的生活是艰苦的。1958年，12岁的何迪在海南儋县那大中学上初一，他记得当时一天只有两顿稀饭，一周不用大便。1960年回到“两院”自办的中学，家里也

只能保证父亲何康每顿一小碗米饭，孩子们一天只有一顿米饭，其余就是吃红薯，所以长大之后的何迪一见到红薯胃就犯酸。

即便是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何康作为“两院”领导，每逢过年过节，还组织大家开联欢会。他拿出少时在学校演剧的功夫，和妻子缪希霞两人京戏话剧齐上阵。在何康的带领下，“两院”团结得像个大家庭一样，从简陋的草棚起步，办起了后来著名的“热作两院”，创立了“一统四包三结合”的新型科研教学推广生产服务体系，在“文革”前成为全国科研教学的典型。1960年2月，周总理视察“两院”，来到何康一家的住地，看到何康贴于门框上的春联“儋州落户，宝岛生根”，挥笔改为“儋州立业，宝岛生根”，自此成为“两院”的院训。

1982年，何康所主导的橡胶北移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一等奖。曾经被断定不能产橡胶的国家，橡胶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居于世界前列。这是以何

康为首的许多杰出的农业专家多年奋斗的成果。

何康“文革”之后历任国家农委副主任兼国家计委副主任、农业部副部长、农牧渔业部部长、农业部部长、全国花卉协会会长、全国科协副主席等职。1990年退居二线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兼财经委员会委员。1992年，年届七旬的何康因颅内管瘤压迫了视神经，必须及时手术，此时妻子缪希霞正因哮喘住在中日友好医院。为了照顾何康，她不顾医生的警告，来往奔波，最终因感冒引发肺心病、肾衰竭，于5月27日去世。这一年她73岁。她比何康大3岁，在两个人的相处中，何康一直称她为大姐。她一生追随何康，为了爱人的事业，可以说牺牲了自己的才华甚至健康。临死前她还把次子何巍和大儿媳王苗叫到身边，嘱咐他们说：“你们的爸爸是非常重感情的人，我去世后他不会再找别人，但是有一个人，爸爸可能会接受，那就是他大学的同学郁隽民。”

郁隽民是烈士郁华大法官之女，郁达夫侄女。1944年，日本占领广西，国民党湘桂大撤退时，何康凭借父亲何遂的关系，找到当时国民党第四战区参谋长，帮助郁隽民和几个同学乘上开出柳州逃离战区的火车。但火车严重超员，何康自己只能爬上车顶，用绳子将身子和气窗绑缚在一起。到达柳州下火车后又搭上载着木炭燃料的汽车从柳州辗转贵阳到重庆，把郁隽民平安送到在重庆的姐姐郁风和姐夫黄苗子处才安心离开。这份情意被缪希霞看在眼里，所以，知道自己时



周总理赴海南儋州视察两院工作时与何康合影



何康与第二任妻子郁隼民

日无多，她安排孩子们找到何康昔日的同学，希望往后的日子，郁隼民能代替自己陪伴爱人。

为了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大儿子何迪和儿媳王苗开始打听郁阿姨的下落。他们通过《中国日报》原总编冯锡良拿到郁隼民在美国的联系地址，先后发了两封信去联络，但都未得到回复。直到1993年春夏之交，得知郁阿姨要从美国回北京。郁隼民到北京的第二天晚上，何迪和王苗就找上门去，诉说了母亲最后的嘱托。郁隼民听后深受感动，经过慎重考虑，答应了他康之子的请求。

郁隼民青年时期与大姐郁风生活在一起，郁风与时任财政部秘书的黄苗子结婚。郁隼民与国民党财政部长的表弟结婚，但这桩婚姻很快因性格志趣不同而告失败，郁隼民长期过着离异独居的生活。此时的相遇与重逢既是何康子女们善意

的成全，仿佛也是上天特别的眷顾。此后何康和郁隼民在一起，共同度过了生命中珍贵的26年。2019年8月，他们的郁阿姨去世，孩子们感谢她在父亲晚年时相守相伴，带给父亲和子女们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

四

1982—1991年，何康任农业部部长期间，中国农业粮食产量每年增长8%。由于这项举世瞩目的成就，何康于1993年获得联合国的世界粮食奖（准确的翻译应为世界食物奖。粮食是主要的食物，但不等于全部食物）。何康为华人当中获此奖的第一人，第二位获得此奖的科学家是袁隆平。何康将20万美元奖金悉数捐出，在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下面设立了“何康农业教育科研基金”，用于奖励高等农业院校品学兼优的学生和科研项目。

退休后的何康仍然热衷于农业工作，从长江



何康赴美领取世界粮食奖

柑橘到攀枝花芒果的发展，从农村沼气的推广到农村环境的保护、生物能源的开发，甚至中小企业的发展，他都倾注了心力。

何康曾两次回到祖籍地福清。当地基层农技员陈有兴还记得他与何康部长在家乡两次会面的细节：一次是1982年4月24日，何康在省市领导的陪同下第一次回融。陈有兴向他介绍自己研究创新的小发明，“新植甘蔗套种洋葱”新技术和“七间八套”等农技成果。何康听完很高兴，说这个办法好，回到北京之后，专门在《农民日报》上撰文推广这一技术。十年后，1992年1月28日，何康第二次回到故里。头一年的11月，出生于福清新厝的年轻科学家陈章良刚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被称为青年诺贝尔奖的“贾乌德·侯赛因青年科学家奖”。于是何康专门请福清市委电话邀请陈章良的父母会面聊天，感谢他们给国家培养出了大科学家。陈章良毕业于何康主持创立的华南热带作物学院，并曾在学院短暂执教，后留学美国，获得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生物及生物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当上了北大副教授，在北大主持了国家“863计划”中的多个研究项目。获联合国奖时，不过30岁。看到自己学院培养的学生在农业科学研究中取得的杰出成就，何康当然倍感欣慰。

五

2019年12月25日是何康妻子缪希霞百岁诞



缪希霞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封面

辰，何缪两家后辈相约在深圳举行了纪念活动。长子何迪与妻子王苗为母亲编辑了厚厚的一本纪念文集，里面收集了何家亲友对于缪希霞及何康的回忆文章，写满对于父亲母亲的感念之情，读来颇为动人。此时的何康已经97岁高龄，因为此前生病的原因，记忆大不如前，但是在文集的封面上，是他满怀深情题下的“希霞百年”四字。

这一年的8月，陪伴了何康26载的老伴郁隽民也因病离去了。为了有更多的时间与父亲在一起，长子何迪和在美经商的次子何巍一家都回来一起生活。子女们谈起父亲何康，言语中是由衷的尊敬与爱戴。与其父何遂晚年知交零落的暗淡忧郁相比，何康的晚年是温暖美好的，他充满热情与理想，为新中国建设奋斗了一生，收获了事业，也收获了真挚浪漫的亲情与爱情。他们家族长期居住生活的地方，位于北京的“和平里”，这地名似乎暗合了他们那一辈人所开创的美好时代。只有在和平年代，一切的奋斗与理想才有安放之处，一切的亲情爱情才得以绵延不断。

“发现” 编木

莫 洁

—

闽东北与浙西南一带峰险壑深林密，溪流纵横湍急，古代桥匠就地取材，以石为基，以木搭桥，建造起一座座牵手两岸的木拱廊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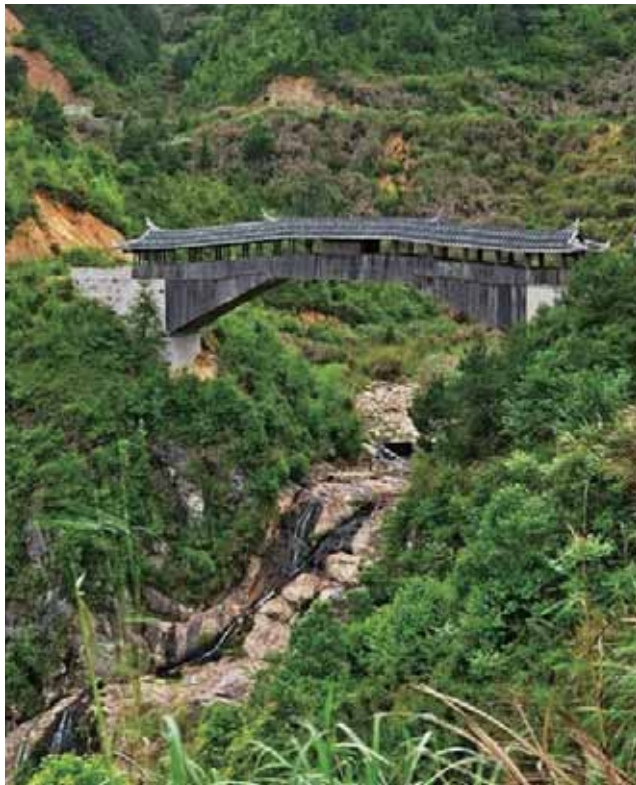
木拱廊桥因营造技艺的繁复与施工的难度，被赋予神性，而有了风水学上“锁关”的功能，一座村庄的水尾凌空飞架一座廊桥，也就实实在

在地“锁”住了村庄的风水。

廊桥不仅供行人驻足休息，也是村民聚会的休闲场所。桥上设有神龛，是村民从事祈福消灾、求子安胎、反省忏悔等与神“对话”之处，桥神庇佑廊桥本体平安，庇佑村民四季纳福，庇佑这一方村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村民们常在桥上议事论事，排戏习武，甚至协调邻里纠纷、解决大小事件等，还开展品酒斗茶、走桥祈福等活动。



棠口村千乘桥



漈头村金造桥

廊桥还是文人墨客吟诗作画、举办沙龙的场所，漈下村飞来庙残墙上的古壁画，留下了清末庙旁水尾桥上来自古田、宁德、福安等县郑文堂、张方清、甘炳琨等文人墨客的文艺沙龙。

不知从哪一天起，村民们发现一座座木拱廊正在快速消失，除了极少数毁于水火、台风等自然灾害外，更多的是被人为拆除，取而代之的是石拱桥、钢筋混凝土桥，还有索桥、铁架桥等。老县城双溪通往省城必经的长澜桥，曲线优美的金钟桥（俗称虾姑桥），还有单条桥、溪坪桥、大峭桥、长宦桥等，都因公路修建或城镇化进程而被拆除了。

“数丈飞桥跨远川，龙蟠水面是蜿蜒。空潭夜夜淘明月，便是珠光一颗圆。”清进士张方矩驻足蟠龙桥，为“飞桥如龙蟠，空潭淘明月”的意境所陶醉，一首《题蟠龙桥》诗成了千古绝唱。

“廿丈桥横两岸边，眼看鱼戏浪三千。前村犬吠花间客，隔水牛耕屋上田。”从家乡漈头赴省城途经金造桥，清进士张正元留下的诗篇，后人却已很难体会诗中“牛耕屋上田”的美好意境了。

.....

建造一座廊桥，从确定之日起，相关的选址择日、南山伐木、祭河开工、月福礼仪、编织拱架、上梁喝彩、诵经开走、分发福钱等桥事桥俗活动随即铺展开来。一座座轰然倒下的廊桥，不仅只是桥这一本体，还有相关的桥事、桥俗、桥匠以及营造技艺等皆随之消失。接踵而来的倒塌声中，村民们猛然发现，木拱廊桥不仅是一座生活实用桥，还是村民们公共的精神文化空间，离开了廊桥的生活，是不完整的乡村生活。

二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全世界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中国昆曲艺术上榜。随后，古琴、十二木卡姆等也入选联合国“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我国相关的评定及推广工作随之广泛展开。消息传来，村民们从中顿悟，申报的过程就是集政府与

民间于一体的对木拱廊桥最好的保护，是延长木拱廊桥生命的必经之路。

失传营造技艺就谈不上保护，连维修也举步维艰，而技艺就掌握在桥匠的手上，寻找桥匠成为木拱廊桥保护工作的第一步。

通常认为，能建造大木作房屋和塔楼、能安装水碓水车的师傅也能建造木拱廊桥。经过一段时间找到不少大木作师傅，却没有一位能建造木拱廊桥。此时，村民们才意识到，木拱廊桥营造技艺的科技含量要远高于建造房屋与安装水碓水车，具体难在哪里，村民们一时说不出所以然。

2003年1月，国家文物局专家来到千年古镇长桥的万安桥，调研宁德市木拱桥相关课题，在屏南县政协副主席郑道居的陪同下，寻到桥屋梁上记载的主绳、67岁的造桥名匠黄春财，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前期的申报工作有序展开。2008年6月，“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国务院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8年9月，宁德市启动以屏南、寿宁为主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工作。2009年2月，“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参与全国备选推荐申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11个项目的激烈角逐，最终成为2009年中国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的三个项目之一。省市两级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相关文化文物专家倾力指导，屏南、寿宁两县及宁德市分别组建申报工作领导小组，拨付申报专项

款，抽调精干力量组织申报工作团队，由屏南县政协主席周芬芳女士（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具体负责，下乡调研、实地考察、收集材料、技术分析、小组讨论、撰写文本、制作申报片……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的奋战，完成申报材料，并在接受文化部培训的基础上进行修改。2009年3月，申报文本送往北京参加初审，很遗憾被否决，理由是“申报文本出现方向性错误”。此后，申报组开始艰苦的4次进京申报之旅。

“有错就改，直到通过为止！”周芬芳按照团队成员的特长，将团队分成申请调研、技艺展示宣传和文本资料准备三个小组，对准难点，分头出击，逐一突破。经过这一番奋战，在第二轮评审中，项目终于从仅三十五分之一的通过率中脱颖而出。

第二阶段的申报工作在提升申报材料、展示营造技艺和制作宣传册等三大环节中展开。如何



慈云村十锦桥



黄春财与儿子、孙子共同演示木拱廊桥搭建

将桥匠用方言所说的木构件名称、营造技艺、桥梁习俗，用普通话准确地表述出来，成为一件棘手的工作。为了向一位资深专家请教，周芬芳与文体局局长苏旭东在电梯口苦等3个小时。从北京返回屏南后，周芬芳马不停蹄地组织桥匠黄春财负责的技艺展示组修建十锦桥，为“申遗”工作提供影像资料，并在短短的期限内，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制作出《屏南木拱廊桥》宣传画册3万余份。

2009年2月5—23日，由文化部和发改委等18个部委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行，屏南县木拱廊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春财、黄闽屏、黄闽辉父子三人应邀带去木拱廊桥参展模型，并在现场搭建与展示木拱廊桥模型的传统营造技艺，轰动了古老的北京城。刘云山、李长春、刘延东、李岚清、陈至立等原任及时任国家

领导人到馆参观，与黄春财父子亲切交谈，对木拱廊桥模型及木拱廊桥超乎想象的承载力赞不绝口。参展历时半个月，每天观众逾万人。组委会推荐黄春财父子参加央视“探索与发现”特别节目《中国手艺》的现场录制；周芬芳作为全国仅有的两位县级代表被特邀参加文化部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方式保护论坛”，并作《木拱桥的保护与利用》主题发言。高规格

的展示活动与论坛，快速提升了木拱廊桥的知名度，为“申遗”工作营造出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

第三阶段是向联合国递交申报材料，先用方言介绍木拱廊桥木构件、营造技艺、桥梁习俗等，再翻译成英文，但联合国非遗司专家表述他们所理解的意思，却完全偏离了方言的原意。虽经双方努力沟通，但始终无法让他们掌握准确的方言信息。最终在宁德师院外语系教师的帮助下，经过反复的磨合，才形成一份满意的英文版申报材料。评审最后阶段，联合国非遗司专家针对申报材料一下子提出28个问题，只要不小心答错一题，申报工作将前功尽弃。周芬芳、苏旭东与屏南县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陆则起（时任屏南县文体局副局长）从下午忙碌到晚上，解答完27个

问题。

“核心技艺是什么？”这是专家组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

“榫卯结构。”申报组成员经过一番谨慎的讨论后做出回答。

“不对，所有的木构建筑都是榫卯结构。”

“不用寸钉片铁。”

“不对，古代许多的木构建筑都不用寸钉片铁。”

“相对较短的木构件，逐节延伸，实现大跨度廊桥的建造。”

“不对，石拱桥技术采用更短的构件，实现了相对更长的跨度。”

“叠梁拱技术。”

“不对，伸臂廊桥也有这项技术。”

“木拱廊桥技术。”

“不对，石拱廊桥技术应该更成熟、更古老。”

……

至此，申报组成员都知道核心技术就藏在木拱架里，却苦于找不出准确精练的表述文字让答案浮出水面。时间一点一点地流逝，答案一次次被否定，时值寒冬，现场申报组成员个个都紧张得直冒汗。虽然夜已深，但是周芬芳还是硬着头皮拨通了文化部专家的电话。通过紧张的咨询、分析、讨论、总结、提炼，申报小组再次向联合国非遗司专家递交了答案。

“贯木拱技术。”

“‘贯’，贯穿；‘拱’，隆起。基本能表达申报文本所陈述的‘上下交叉，穿插别压，相互承托，挤压咬合，逐节延伸，形成大跨度木拱架’的大致意思，但还没能阐明如何‘交叉’与‘咬合’。”

答案再次被否决，刚刚还信心十足的申报组成员，瞬间都像瘪了气的气球一样。

“上下交叉，穿插别压……”这不是织毛衣吗？望着疲惫不堪的申报组成员，周芬芳信口调侃道。

“对，编织技术！”申报组成员们几乎异口同声欢呼起来，用“编织”两个字来阐释贯、拱、叉、插、压、合、伸等技术，真是太绝了！木拱架核心技术正是“编木技术”，木拱架的结构就是“编木结构”。

……

这真是一项伟大的发现，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代编织技术被先民运用于木拱桥的建造，即，将无法弯曲的刚性木构件，通过榫卯连接的方式，进行上下穿插，巧妙编织，既实现逐节延伸的大跨度建造，又达到两组系统相互咬合共同承载受力的目的。可以说，是从树枝、竹子、藤条、线绳等“软编织”技术到木、铁、钢等“硬编织”技术的一次历史性飞跃，具体演化过程可推测为，篱笆—墙体—篾筐—篾席—绳索—线衣—布料—编木拱架—“鸟巢”，等等，而举世闻名的北京奥运城“鸟巢”，正是现代钢编织技术的典范。

2009年10月1日，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传来喜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宣布，以中国宁德市屏南、寿宁两县为主申报的“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闽东首个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

四

营造技艺申报世界“非遗”获得成功，闽东北与浙西南木拱廊桥遗存重要县份对廊桥本体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信心倍增，闽浙木拱廊桥本体“申遗”序幕由此拉开。

2012年11月，国家文物局正式将以万安桥为龙头的闽东北与浙西南7个县，即福建的屏南、寿宁、周宁、政和等4个县与浙江的泰顺、庆元、景宁等3个县具备条件的22座木拱廊桥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其中福建12座、浙江10座，屏南独占5座位居榜首；12月，黄春财被命名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2017年，闽浙两省联手推动木拱廊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签署《中国闽浙木拱廊桥保护与申遗联盟协定》。生产性保护得到重视，双龙桥、进贤桥、横山桥、登云桥、屯福桥、濠洲桥、文兴桥、中国台湾南投桥、德国雷根斯堡桥等一座座重建或新建木拱廊桥拔地而起，相关桥事、桥俗、桥匠以及传统营造技艺等



2014年1月重建谢坑进贤桥（水尾桥），可以看见独特的“编木结构”

得到“活态”保护。新一轮“申遗”的脚步声如桥下潺潺的流水声，变得悠扬动听。

2019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周年之际，在全国最长的古代木拱廊桥万安桥畔，两岸村民举办了古老的盘诗射箭传统贺冬民俗活动。鸟铳三响，鞭炮开路，鼓乐齐鸣，两岸村民载歌载舞。盘诗对答诵丰收，庆丰年；射箭借风舞火龙，佑大桥。插糍上酒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四季平安……

编木为虹

景 艳

—

在我的印象中，“廊桥”总是和“遗梦”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可能是那部片名叫《廊桥遗梦》的电影给我留下的印象太过深刻；另一方面，也许是内心里认为这两个词放在一起独有韵

味。一个“遗”字，沉淀了多少前人留下的古意风骨？一个“梦”字，又萌发着多少临风抒怀之幽情？

廊桥如虹，横悬溪涧。

其跨越山水间的那份气定神闲，也常常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古老的美好常常和回忆相伴，残存的思念往往与远去相随。木拱廊桥曾经有那

么一段时间默默地散落在中国的闽浙大地之上，以至于文物保护专家与桥梁专家们误以为，中国古代木拱桥只存在于古籍和古画卷中，而许多生活在它周边的人们，享受着它的荫蔽却忽略了它的价值。在一波又一波开疆拓土的浪潮之下，在便捷交通、现代桥梁的挤压之下，这集楼台轩榭的建筑风格和技术于一体的中国传统造桥



双龙桥

技艺，渐渐黯淡了它的颜色，消散了它的芬芳，几乎成为“遗梦”的部分。不过，当我来到屏南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黄春财家的时候，方意识到这一印象有失偏颇。以廊桥为代表的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在新时代、新观念的氛围之下，正显露出勃勃生机。

在黄春财师傅家采访，满屋子与造桥技艺有关的获奖证书和大大小小的廊桥模型十分亮眼。从进门的屏风橱柜、客厅里的电视柜到他卧室里的工作台，都摆满特别制作成的廊桥模型，其中许多是人们熟悉的万安桥、千乘桥、百祥桥、双龙桥。墙上挂着他的廊桥设计图，连桥上的勾梁、狮子都线条分明，惟妙惟肖。一屋子挤满廊桥的元素，展示着这个家族与廊桥化不开的渊源。

现年 79 岁的黄师傅，虽已满头白发，但看上去很精神，身着很中国很传统的月白式对襟布衫，相比于印象中的工匠，他更像一位儒师。他出生在屏南县长桥镇长桥村的一个造桥世家，自师祖卓茂龙以来已历五代。祖父黄金书是清末享誉闽东北的廊桥工匠，父亲黄象颜也是一位高产

的造桥名家。黄春财 15 岁起就跟随父亲学木工，勤劳好学的他逐渐掌握了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这门“绝活”。他自豪地告诉我，家中原本存有祖上传下来的“鲁班尺”，那可是行业中正宗传人的一种标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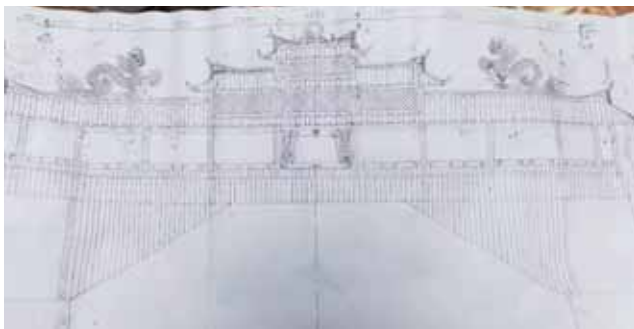
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主要是以口传心授，家庭、师徒传承为主要特征，因此，实践中的摸索尤为重要。采访中得知，屏南会造桥的师傅不少，但像黄春财这样会设计画图的主绳师傅却不多，这一能力让他在行当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

早期造桥，师傅需要把立面图同比例画在大门板上，由多人抬来抬去，很费力，极不方便，黄师傅跟随父亲重建修复万安桥西端拱跨的过程中，提议将立面图画在纸上，得到了父亲与伯父的高度肯定。他清楚地记得，他的第一张图是画在春联纸上完成的。纸质图纸可以较为自如地对整座木拱桥作精细设计，经过分析与计算，木构件可以预先加工成型，既缩短工时也降低成本。

木拱廊桥是旧时闽浙山区最常见的桥梁，造桥的主绳师傅十分受人尊敬。“主绳”又称“主



黄春财师傅制作的双龙桥模型



黄春财师傅绘制的廊桥设计图



黄春财指着万安桥上的墨书对儿子黄闽辉说：“主绳黄生富、黄象颜分别是你的伯祖父与祖父。”

墨”，是行业里的最高荣誉，相当于现在的建筑总工程师，指的是既能设计又会计算绘画且能指导施工的能工巧匠。在屏南的古桥的梁上都会刻上主绳的姓名、建造时间，以及历代曾经参与修缮和重建的师傅名字，享有留待后世瞻仰的无上荣光。廊桥工艺，易学难精，真正掌握其要领者寥寥无几。有的人尽其一生参与无数桥梁的建造，但却不能担当主绳，桥梁上也未能留名。这种师傅称为“帮场”。

1956年，长桥上圪村要造桥，请的主绳师傅是黄春财的父亲黄象颜，恰好黄象颜没空，年仅20岁的黄春财便在父亲的鼓励下独力担当。人家看他年纪轻轻，只管叫他“小鬼”，还老追问：“你父亲来了没有？”结果，等他圆满完成任务之后，主家信服地摸了摸他的头：“你这个师傅不错。”就这样，黄春财生平第一次做主绳，名字被

刻到了桥梁上。也就在那一年，他应招进入屏南城关建筑社，成为一名建筑工人，学会了建筑设计与绘图，这对他建桥技艺的提升大有帮助。

二

人们看桥，除了其外表的造型之外，更关注的是其是否牢固结实。建桥者还要考虑承重与桥梁跨度的问题。大跨度的桥梁，有利于桥下的行船与水的排泄。在现代建材出现之前，建造

桥梁的材料只有木材、石材和绳索等，林木刚柔相济，是建桥的好材料，但是它的长度、树径与密度又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专家认为木拱廊桥的拱架结构是一项很有价值的创造，它解决了木构桥梁的大跨度问题，是中国传统木构中技术含量最高的一类结构形式。整座桥不要寸钉片铁，只凭椽靠椽，桁嵌桁，衔接严密，结构稳固。因其结构与北宋张择端所画的《清明上河图》中的虹桥极为相似，以梁木穿插别压形成拱桥，形似彩虹，由此，桥梁专家们确认北宋盛行的虹桥技术并未失传，称其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的“活化石”。

编木结构是木拱桥营造的核心技艺：两组支撑桥梁的木结构系统以“编织”的方式通过交叉搭置、互相承托、挤压咬合形成拱形支撑，相对较短的木构件通过榫卯连接，逐节伸展，实现跨

越山谷和支撑桥面荷载的功能。按河床宽窄设计墩、孔。窄的河床是无墩单孔，宽的河床则需一墩二孔或多墩孔，墩越多，造桥成本就越高，难度也越大。所以，大凡建桥都选择河床最窄处。传统木拱廊桥的建造有一定的程式，包括立水架柱、上三节苗和五节苗、进苗间栓、立将军柱、上剪刀苗、架桥屋等工序。在实际施工中，要善于计算每根木头的长短数据。这些数据的精确与否决定了整座桥的成功与否。黄师傅告诉我，拱架搭得好不好是一座桥建得牢不牢的关键。如果拱架搭得好，桥梁完工时，桥架便会与桥身自动剥离，桥梁也会越压越牢，反之，则不合格。黄师傅到现在还记得发生在65年前的一件事。那是1954年夏天，屏南县棠口境内重建一座木拱廊桥，桥拱落成后，主绳师傅动手拆桥架时，发现桥身与桥梁咬在一起，拱梁下沉，顿时大惊失

色。主绳师傅获悉黄春财父亲是个造桥高手，便连夜赶到长桥，请求相助，为了表示诚意，特地请黄春财和父亲坐轿而来。黄象颜到实地仔细检查了桥身，发现设计有误，用材不当，父子俩对症下药，采取补救措施，终于拯救了危桥。主绳师傅千恩万谢，包了一个大红包，还披红挂彩，鞭炮欢送。那时的黄春财，除了感佩父亲的高超技艺以及对自己从事的这份工作倍感荣耀之外，更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弧度不精密的话，桥做好了，用铆用角铁钉上去、用螺丝旋上去都没有用。”

不过，正当他学艺渐进，踌躇满志，更待一展身手的时候，却“失业”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桥梁建筑技术的进步与建筑材料的改进，木制桥梁逐步被水泥桥、石梁桥所替代，以他为代表的黄氏建桥世家、木制造桥行业逐渐



黄春财师傅指挥上梁



上“三节苗”

淡出人们的视线。从1969年造了古田县平湖镇唐宦桥之后，直到2004年，黄春财都无桥可造，更谈不上技艺流传。眼睁睁地看着许多木拱桥被拆掉，一身的传统技艺无用武之地，两个儿子谁也不想承接他的衣钵：一个学修配，一个到上海经商。黄师傅苦学多年的技艺竟然成了“屠龙之术”。每当看见乡村间那些凝聚着祖辈智慧、记录着父辈和自己曾经的骄傲的木拱桥时，黄春财便会想：“难道这个技艺到我这就停止了吗？”

如果不是世事变迁，机缘巧合，这位廊桥名匠，很可能会和他们所拥有的技艺一起，就此隐没民间。

三

事情的转机缘于人们对传统文化、技艺保护意识的提升。廊桥，作为古人流传下来的人文资产，有其科学、历史、文化三个方面的物质价值体现，又蕴含着包括营造技艺、形制特色、历史背景、民俗风情等非物质文化层面的元素，它的价值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渐渐为世人所知。

据说，首先意识到廊桥价值的是浙江人。“浙江人到我们这来买了两座廊桥，后来才知道人家拿去安装，就成了古迹风景，靠这个出了名。”说到这里，黄春财的小儿子黄闽辉颇有点惋惜，“廊桥本是我们福建的特色，却因为我们缺乏这一意识而落伍了。”

被拆走的桥成了邻省的宝贝，也成为屏南人

自省的原动力。1998年以来，屏南县和寿宁等地陆续开展了木拱桥资源性普查工作。各地基本以木拱桥这一文化遗产实物为普查对象。一批具有极高价值的木拱桥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一批普查资料、研究成果也相继面世，提高了闽浙木拱桥的美誉度，引来了第一波考察闽浙木拱桥的高潮，也为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普查、申报工作打下了基础。

2003年1月，为了调研国家文物局关于宁德市木拱桥的课题，时任福建屏南县政协副主席的郑道居，再次来到长桥村的万安桥。那天他鬼使神差地特别注意廊桥桥屋的大梁：“一般木拱廊桥桥屋的梁上都会记载着建桥年月、捐款人、建桥董事和建桥工匠，以前没怎么留意，那天就巧了，抬头一看，建桥工匠里只有主绳黄象颜的名字最清晰。”



万安桥上主绳的名字

长年研究木拱廊桥的郑道居知道，建桥人大多不是本地人——这是一个常识，但那天他无意中开口问身旁的村民：“黄象颜是长桥村人吗？”

这一问，更巧了！黄象颜正是屏南县长桥村人。1952年，始建于宋代的万安桥，西端被大水冲毁了两个拱架12个开间。1954年，县政府出资重建，主绳的除了黄象颜，还有他的哥哥黄生富。

“黄象颜不在了，他的儿子黄春财还在。”

“那，黄春财会造桥吗？”

“会。”

没想到，一句无心之问，竟然让郑道居找到了隐藏在民间数十载的造桥世家。

2005年，因为要建水库，际头村一座始建于

清代嘉庆年间的木拱桥需要进行保护性迁移，黄春财师傅被请出了山。

“真想不到，我还有机会造桥。”一时间，黄春财百感交集。正当青春壮年，他不得不搁下手中的技艺，待重新拾起，已年近古稀，更让他料想不到的是，他竟然是当时福建省内最年轻的主绳师傅。

四

黄春财的这一次出山一发不可收。政府的重视和新闻媒体的大量报道，使福建的木拱桥一时间广为人知，黄师傅的一身绝技也声名远播。随着木拱廊桥在家乡人民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



万安桥

请黄春财重建、新建木拱桥的人也越来越多。

这时候，黄春财毅然决然地将大儿子黄闽屏和小儿子黄闽辉召到身边，跟着他学造桥。或许因为从小耳濡目染，两个儿子进展很快，虽然他俩在技术操作上各有侧重，老大重在施工操作，小儿子重在学计算绘图，但自2005年至今，14年时光已经将他们都打磨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主绳。

黄师傅告诉我，修一座木拱廊桥从设计、备料到建成，前后大约需要半年的时间，但碰上任务急，他们也曾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突击完成了屏南的国家风景区白水洋里的古桥建设。他认为，要鼓励传统技艺融入现代建筑艺术，进一步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为传承发展营造更适宜的土壤和活水源。

搬迁金造桥，重修百祥桥，新建双龙桥、十锦桥，还有寿宁登云桥、古田卓洋桥、蕉城鸾江桥……黄师傅和他的儿子们忙得不亦乐乎。

2006年，屏南县的万安桥、千乘桥、百祥桥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2009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了首批来自8个国家的1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位列其中；2012年11月17日，闽浙两省7县联合申报的闽浙22座木拱廊桥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2年12月，黄春财被文化部认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木拱桥传统营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2013年6月6日，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授予第二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2013年9月9日，被中国艺术研究院聘为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硕士研究生导师……一系列荣誉的背后体现了当代人类生态保护意识的日益觉醒和高涨，反映了文化遗产权与诠释权的在地化回归的趋向。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载体，唯此技艺才不会消亡。“最重要的还是有桥可造，让传承人有用武之地，在建造过程中技艺自然也就传承下去了。”郑道居如是说。

黄春财的建桥技艺得到公认。与此同时，他也借助更多的场合把木拱廊桥传统营造技艺展示于世人面前。他和儿子到北京参加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到台湾参加“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在央视演播厅演示木拱廊桥技艺，参加《中国手艺》《文明之旅》的节目录制；他成立黄氏家族木拱桥技艺传习所，担任“八闽特色文化教育”辅导员，参加第三届中国廊桥国际学术研讨会……如此种种，恰似薪火。他有一个梦想，便是在有生之年能有更多机会建木拱廊桥，拥有更多的平台将廊桥文化发扬光大。

风雨廊桥，几多梦想。勤劳的先民用非凡的智慧建造了它，当代的乡民怀着深厚的情感护佑着它，廊桥方得以从古而今，栉风沐雨，挺立如斯。期待在屏南这块秀美灵毓的土地上，廊桥将有一段新梦的演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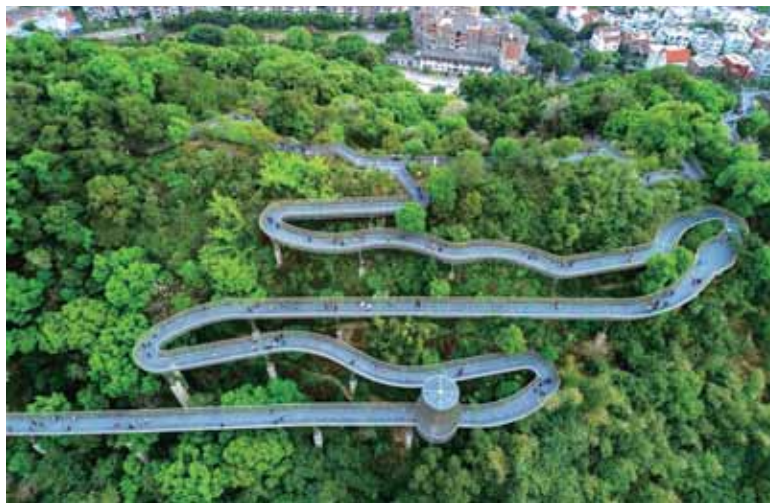
芳 野 行 踪

张 茜

—

福州是一座“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碧水入廓、古城拥翠”的山水园林城市，虽说公园就在家门口，抬脚便在画中游，可那毕竟只是单独的一座，久而久之园中花草树木假山便了如指掌，思绪和心念便想要飞翔，飞向湛蓝的空中，如白

云般俯瞰更多的园。这时，一条犹如城市骨骼的空中廊道——“福道”腾空跃起：东起左海公园环湖栈道，西落江滨国光园。贯穿左海公园、梅峰山地公园、金牛山体育公园、国光公园、金牛山公园，一如卡尔维诺《树上的男爵》中的男爵般行走于树端，穿雾拂岚，悠悠 38 里。休闲健身、览城观景分秒间切换，座座翠峰，道道花谷，杜鹃海、樱花园、紫竹林、兰花溪、摩崖



福道

壁、名人历史足迹……仿佛一幅幅画卷，仿佛满天闪闪星斗展现眼前，这是人类奋斗、大自然恩赐的幸福硕果。

有福之州的福道与众不同。她承载着“福荫百姓，道法自然”的使命横空出世，开创了我国首条钢架悬空步道之先河，犹如机器人般由空心钢管桁架组成，披着蓝天白云，戴着月亮繁星，迈着坡度8度的脚步，蜿蜒起伏于城市、山峦、树木之上。桥面上的格栅板一块块保持等间距，将充足的阳光分享给下方的动植物；安全围栏随着道体摆动，变幻着曼妙身姿，或直立，或倾斜，或旋转，酷似一架正在演奏的手风琴。驻足福道，侧耳聆听，天籁仙乐似乎从云端、从树梢、从山顶、从峡谷间悠悠飘来，使人恍然如梦，以为误入仙境。

2017年，福道荣获“国际建筑大奖”。这个鹤声四起的“国际建筑大奖”，是芝加哥文艺协会建筑与设计博物馆和欧洲建筑艺术与城市研究中心于2004年联合设立的奖项，是引领世界建筑界潮流指标的奖项之一，获奖作品必须是突破设计极限，并成为一座城市中具有艺术价值的建筑。

福州福道，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是福州人具有时代性与实用性的空中揽福廊道。

二

海绵公园是城市园林人的理想追求，是一座城市的环保与生态的高度，是人类艺术与大自然



牛岗山公园

的脉脉接通，虽由人做，宛自天开。

经济发展壮大、城市化进程光辉背阴处的垃圾废土堆砌山以庞大的体态填满了牛岗山与金狮山之间的小型峡谷，每逢下雨，泥土流淌，污染环境，堵塞城市管网，降低生物多样性，破坏地表，构成安全隐患。

牛岗山公园借鉴国外先进生态修复经验，针对垃圾废土堆砌山，就地依势造景，在坡脚处加固抗滑桩，从下至上，分区分块整平密实，梳理自然排水流向，恢复人工植被，人工造林——香

樟树、菩提榕、黄山栎树、花灌丛五彩缤纷，层次分明，疏密有致。山底雨水承接系统使用土工布滤水、植草沟储水滤水、微型雨水花园储水滤水、地下盲管沟吸水滤水渗水，导流水进入大型储水湖，湖水旱季浇灌植物，汛期储蓄渗透再分流。这样精密细致的操作，让山地、草坪、储水湖从高到低，依次布局，成就了牛岗山公园鲜活的海绵体。

三

福州古代扩城、地理变迁、交通水运绵延养成“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的独特格局，这个“东方小威尼斯”在古人笔下是这样的情调：“人烟绣错，舟楫相连，两岸酒市歌楼，笙歌从柳荫榕叶中出。”

107条内河密密交织，宛如叶脉，属国内罕见，然而，在城市的发展与扩张中也患上了污染、排涝能力不足等“城市病”，2016年政府倾力治水——“水清、河畅、安全、生态”。

五四北解放溪首先清澈了，河畔秀峰公园也是福州水系串珠公园的第一颗珠子，小小园子有着自己的榕树主题，菩提榕、小叶榕、大叶榕、红榕、高山榕、聚果榕……或单植或丛植，或修剪，或自然地掩映着弯弯绕绕的防滑地砖小路，三角梅、山樱花、紫藤萝间杂其中，花架、小亭、长廊、景墙错落有致。榕城的绿意、园林的意境漫散开来，柔软舒缓了紧邻的地铁出口站、

马路，居民三三两两闲步其中，成了画中点缀。

湖前河与晋安河相交，托起老年医院串珠公园，园子主角是几棵数百年大树，庇荫十亩，连接起公益路和五四路。院中的老人们或步行或坐着轮椅来到树下乘凉闲扯，马路上过往的车辆和行人，便是他们眼中的鲜活风景。

温泉公园如意湖是串珠公园的一颗美珠，相依着温泉博物馆，一座白色石拱桥将新湖与旧湖连成一体，成为五四河汛期洪水涌向晋安河的中转站，化解了五四片区的内涝，并由单纯的景观湖转为集生态、景观及排涝功能于一身的城内湖泊，是“海绵城市”设计理念的充分体现，通过“海绵技术”的运用来实现调蓄错峰、滞水、净化的作用。

来到公路与河流交织的南台岛，流花溪公园如同它的名字，让人徜徉流连。这是个自然原生态极为饱满的地方，抛开近旁摩肩接踵的高楼大厦，你会以为到了野外自然。河面在这里宽阔得叫人感觉奢侈，岸基下是规模不小的湿地，常见的湿生植物，大会师般相拥生长，状态极好，这是自然中植物多样性的健康表现。芦苇、旱柳和木芙蓉最为出众，茂密的芦苇荡掩映着流水，花束洁白，丰硕蓬松，微微摇曳。

闽地少见的旱柳，守护着芦苇荡，“男女老少”繁衍成为群落。旱柳虽说少了垂柳的流苏飘逸、柔情万种，却也是片片银叶，窄如蛾眉，枝条斜展，洒脱利落。木芙蓉立于水边湿地，演绎着“出水芙蓉清绝姿”，花朵娇媚，红白粉闪耀，

点亮了初冬的天空和绿色调打底的溪畔。一座精巧的钢构桥，飞跃河上，桥中段的屋顶下，几个青年男子闲坐钓鱼，从桥上伸出细细的鱼竿，垂下长长的钓鱼线，鱼桶里鲫鱼鲤鱼鲢鱼惊慌地游作一团。下桥走上架于溪水和莲叶之上的人行栈道，顿觉入了电影。荷叶枯了边缘，依旧挺拔，一人多高，密匝匝地遮盖了三分之一河面，水流无声，波光闪闪。栈道上也有小小木凉亭，坐在其中，环视蒹葭苍苍，真是宛在水中央。

流花溪下游的飞凤河犹如系在一块碧玉上的飘带，这块碧玉便是飞凤湖公园。湖水清亮纯净、静若处子，安卧于身旁伟岸葱茏的飞凤山麓。一条细水从湖边打开的缺口处潺潺流出，纤弱如带，蜿蜒曲折，溶入闽江。园丁精心地用绿

草小花将它全程装扮，好像一个带着两个美丽花环的孩童，让人顿生喜爱疼惜之情，会不由得屈下身来，想要亲近他、拥抱他。若是炎炎夏日，也可清泉濯足，与之互动嬉戏。

一条平整舒适的透水沥青跑道伴着细流。在清晨或者傍晚，喜爱跑步的人们，会一路沿着它跑到闽江边上。

飞凤河串着飞凤湖公园，公园包含着飞凤山、台地园、石光园、澜趣亭、潏光园、入云台、暮雨坡、揽城凹、串钱柳、腊肠树、风铃树、小小游船……如诗如画。

“飞凤山凤岗里，三十六宅，眼睛走板白（走路让人累得翻白眼）”。飞凤山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座房子、每一片树林、每一条小路都似乎相同，难以辨认，再加上树林茂密，转来转去，晕头转向，犹如迷宫，犹如福州的世外桃源。

丰盈的活水滋润着榕城，串绿成线，串珠成链。

江畔散落着的大型主题公园，花木葳蕤，群鸟翱翔，生机盎然而气质鲜明，沙滩排球公园、花海公园、湿地公园、文化主题公园……这些开放在大地上的花朵既是自然的厚赐，也是福州园林人送给所有热爱生活的人们的礼物。



飞凤山奥体公园



剽繁决剧的能吏马亮

——两宋福州知州系列谭

汪征鲁

中国中世纪政治文明在两宋发展到一个最高水平，尤以地方吏治的清明为显著特征，而福州地区的吏治最为典范。这里不容详谈，可参见将出版的《福州通史·两宋卷》。在中国中世纪官本位的社会里，地方吏治的清明与否，全系于第一把手，即在州系于知州事，在县系于知县事或县令。知州、知县对辖区内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等，事无不总，一锤定音。考之史志，两宋福州知州先后有两百位，大都可谓循吏良守，文苑英华。然至今，除了一二人外，如辛弃疾、蔡襄，绝大部分已不为人们所知。本系列谭或可拂去岁月的尘埃，再现先贤当年的治绩与风骨。

马亮于北宋太宗淳化年间任福州知州事，据考所任时间不出一年。不过，宋代地方官调动频

繁，以福州而言，知州的任期以一年、二年、三年为多见。这里，我们以他曾任福州知州的身份来考察他的仕途与历练，又以他一生的历练与仕途来诠释他的福州知州之任。

马亮（959—1031），字叔明，籍贯庐州合肥，即今天的安徽合肥市。登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授大理评事，此为当时中央司法部门的低级审判官。接着，任芜湖县令，这是一个亲民的地方官。可以说，司法与地方民政构成了他后来功业的基础。

芜湖县令任满，马亮调至中央，任殿中丞。北宋前期，殿中丞仅为寄禄官，亦名阶官，即有俸禄而并无实际职掌。旋又任常州通判，为知常州事的副手。两宋之际，中央与地方、地区之间官员的交流十分频繁，当然有利有弊，但总是

利大于弊。

其时常州发生了一个案子，衙吏与老百姓因故亡失了官府的钱款，充他们的家产也不足以抵债。连同他们的妻儿，抓了数百人。马亮上任，一接手，就全部放人，并宽缓他们还债的期限。众人感激涕零，不出一个月，就还清所有的欠负。其时，罗处约任荆湖路巡抚，很欣赏下属马亮的作为，以亮治理卓著上报朝廷，遂被擢迁为濮州知州事。

又逢诸路转运司设置纠察刑狱的官职，于是，以初露锋芒的马亮为福建路转运司的纠察官。宋代，地方行政体制，行路、州、县三级制，路转运司，长官为转运使，负责均调一路租税以供国用，兼有监察之责。亮到任后，复查、平反冤狱，全活者达数十人。由于转运司主管均调一路租税，其之法办对象大多是逋逃赋税者，属经济犯，而马亮一贯体恤这一类弱者，自然可以全活就尽量全活。

马亮是于太宗淳化（990—994）年间初知福州事的，其任期及治绩，史籍几无记载。这不是马亮一反常态，在福州不作为，而是福州历来政治清明，民风温顺，社会和谐，故使以剽繁决剧著称的马亮英雄无用武之地，较之在其他地区的施政而显得乏善可陈。朝廷也终因马亮有理剧长才，不可浪费，很快将之调到他处了。两宋福州社会的清明，限于篇幅，这里不能深入述论，但举一例：终两宋，福州地区未发生过一次民变即

农民起义。

马亮在福州时有一堪称佳话的轶事。其时，吕蒙亨为福州属县的一个县令。他有一个儿子吕夷简也带在任上。马亮偶遇夷简，交往之下极为欣赏，后把女儿许配给他。妻刘氏怨怪说：“怎么可以把女儿嫁给一个县令儿子？”马亮说：“这不是你能知道的。”后来吕夷简果然位登宰相。史书上有一段记载：“亮卒，时夷简在相位，有司谥曰忠肃，人不以为是也。”其弦外之音就是马亮是沾了女婿吕夷简的光才被谥为“忠肃”的。这是因为，当时死者的谥号不仅仅在于他的功业，还在于他的官爵，马亮实际的最高官位为工部尚书。又陈执中、梁适为小京官时，甚至田况、宋庠及其弟宋祁在童子时，马亮都厚遇之，勉励他们：“将来必鹏程万里！”世以马亮为知人。

还有一桩轶事，这里也附带一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闰六月，马亮在知升州任上为一私事上奏皇帝，曰：“早年，刚中进士，有同榜戴永者，分配到岭南为官，对臣说：‘苟不生还，以遗孤为托。’不久，永卒。臣找到他幼年的儿子，养育在家，长大了，把最小的女儿嫁给他。今希望开恩，让他释褐为官，以继故人的血脉。”仁宗嘉赏马亮的信义，于是下旨：“以进士戴国祥试将作监主簿。”这里不知进士是不是御赐的。亦见马亮为人之一斑。

话说回来，马亮知福州未逾一年，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的状元，时任参知政事、相当



于副宰相的苏易简，向朝廷推荐马亮有“剴繁理剧”之才，朝廷随即将其召回，委任为提点三司都勾院、磨勘凭由司。这是两个官名，前一个为中央经济部门即度支、户部、盐铁监察机构的长官，后一个为中央经济部门审核、复查机构的长官，工作至为细碎、繁复。这也是用马亮的长才。

久之，才外放马亮，为饶州知州。州中豪强白氏家族总与官府过不去，其头领曾经杀人，后经赦免，出狱后更加横行霸道，为闾里之患。马亮经调查属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公布其罪行，处死为首者，境内敬畏、信服。

州有官府办的铸钱工场——铸钱监。这个监工匠多而可供铸造的铜、锡原料跟不上，常常窝工。马亮获得上司的批准，将一半的工人迁到池州，再组建了一个铸钱监，结果岁增缗钱十万。这表现出马亮经济方面的才干。

又随例交流为京官，升职为殿中侍御史。此官为宋代御史台的一个职务，主要监察皇城内的违法、失仪行为。

北宋太宗至道三年（997），太宗驾崩，真宗皇帝刚即位，朝臣纷纷献言。马亮也上书曰：“陛下初次执政，对军队的赏赐要快，以安军心。现在当地的有些官员不及时颁放赏赐，请派遣使者到各地督察。又朝廷已下赦书，免除了州县所欠的赋税，而有关机构却置若罔闻，更急迫地去征讨，应当兑现赦书，普及皇恩，宽慰百姓。往例，以亲王任开封府尹，位尊势重，嫌隙易

生，以此事的缘由为鉴，表示对皇族的保全亲爱之道。契丹连年南侵，河朔地区萧条，请修好契丹，让边民休养生息。”真宗皇帝赞许他的意见，认为马亮可用。

马亮的建言，不是抽象的儒家伦理道德的说教，而是为巩固政权，迫切需要解决的实事、要事。两汉以来，国家选官的标准，一为经术，包括儒家伦理道德。一为吏干，包括断狱、文学，后者又演化为经世致用之学，而以前者为优先。综观马亮的言行，不能不说更具有后者的色彩。

真宗咸平三年（1000）夏四月，四川益州低级军官神卫都虞侯王均、戍兵李延顺等发动兵变，现代传统史学归为农民起义，于是朝廷以马亮为四川转运副使，负责镇压大军的后勤保障和督察工作，旋又升任为正使。叛军固守益州城。宋将雷有终、石普率军攻城，战事至为惨烈。王均在弓箭的箭头上涂有毒药，射中官军即死，城下陈尸累累。雷有终募敢死队，在城墙下挖洞，上蒙毛毡，手持火炬强行攻入城，麾戈直冲，遂克其城，前后杀叛军三千余人。

翌年，战事甫平，真宗皇帝召四川转运使、兵部员外郎马亮入京，汇报四川战况。此时，真宗才知道，雷有终平叛之后，诛杀不已，马亮急加制止，全活了一千多人。城破后，出现饥荒，城中斗米千钱，马亮尽出官府仓库的存米，以半价售与饥民，民赖以济。马亮擅自宽赦叛军、发官仓赈济是有风险的，然真宗仁君，予以首肯。



正在此时，四川方面押送了俘虏的叛军八十九人至京。当时主持全国军政的知枢密院事周莹主张全部处死。马亮坚决反对，说：“愚民是被胁迫为贼的，这不过是其中的百分之一二，大部分还窜伏在山林，若不宽赦这些人，心怀反侧之人闻风疑惧，揭竿而起，是再造一个王均也。”真宗皇帝省悟，宽赦了全部八十九人。

为奖励马亮，加官直史馆，复遣还四川履职。四川宿产井盐，然此时诸州盐井，岁久泉涸，已产不出盐。官府照样收税，督责严酷，一州竟拘捕了数百人。马亮发现此弊，下令释放全部被拘捕者，奏请废除不出盐的盐井，可不再进入税目。又豁免民间欠官府的二百余万钱物。

真宗咸平五年（1002）五月，又召马亮入朝陛见，奏事称旨，赐以金紫官服、佩戴，命知潭州。州下属县有亡命的士兵打家劫舍，为乡里所患，乡人共诛杀之。经审判，因杀人，当处死四名凶手。马亮亲临其事，对僚属说：“为民除害，反被判死罪，不是司法的本意。”于是在案卷上大笔一批：“全部无罪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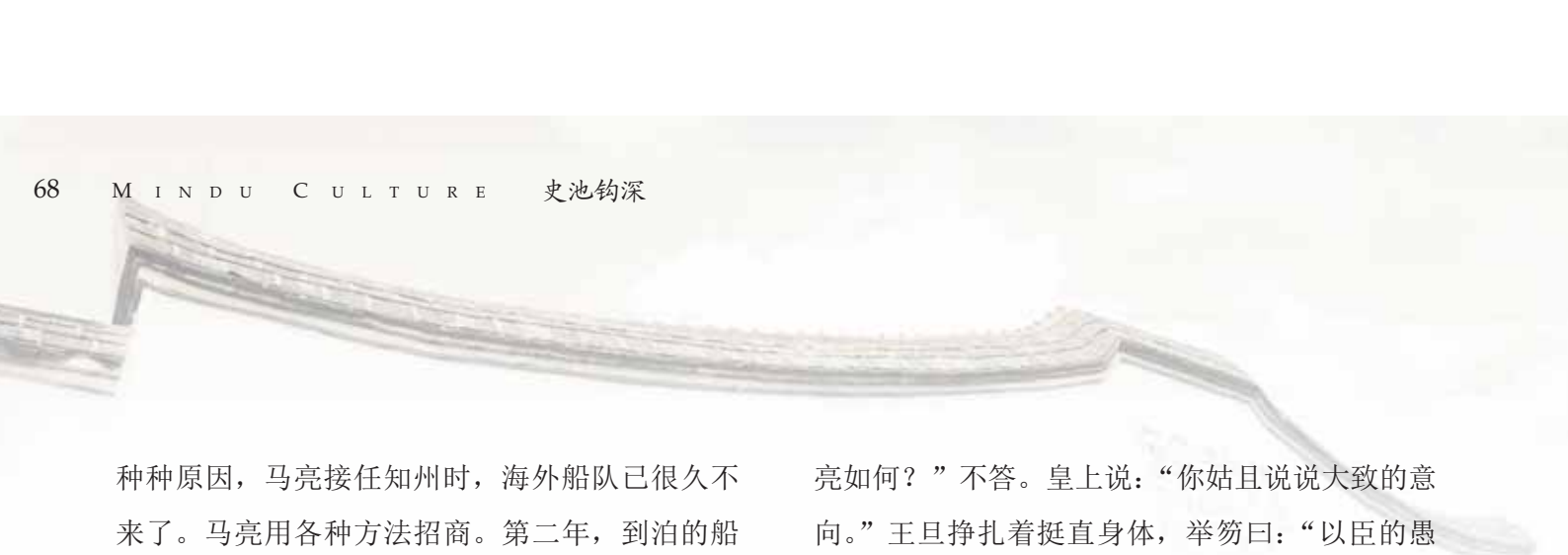
后转官为升州知州。上任途中经过江州，当地大旱，饿殍遍地。恰逢来自湖湘赴京的数十艘漕米船经此，马亮当即截留，移文管辖的守将，发漕米以赈济饥民。上奏陈情曰：“沿江诸郡皆严重歉收，地方官不救荒年，下官只能动用漕米赈济。”也是冒擅动皇粮之罪的。

真宗景德四年（1007）冬十月，马亮知升州

任满，返京述职。上表朝廷说：“祖上坟墓在合肥，请求典守庐州，以便清扫、祭祀祖坟。”及皇上召见，但曰：“如国家有所任用，岂敢顾及个人的私利？”时广东宜州陈平之乱初平，真宗向他垂询广东、桂林一带的政事。马亮对曰：“当地长官高谨徽、高绅都循规谨慎，不是岭南郡守之才，要慎重选择人选。窃以为张咏、刘综可以胜任。”上曰：“张咏有病，不宜离京远行。刘综镇守并州，寄任已重。”原来准备命杨覃知广州，上在召对中，发觉马亮愿意赴此，就对宰相说：“马亮之吏干、敏捷不在杨覃之下。”于是，任命其知广州。为此，擢升为右谏议大夫，以壮其广州之任。

宋代皇帝定期召对外官，在皇帝方面可倾听下情、考察官员，在官员方面则可提出建议和要求。在上面列举的真宗两次召对马亮，一次是马亮汇报四川的平叛与善后，一次是与真宗讨论岭南地区的长官人选，马亮都直言不讳，屡献谏言。尤可称道的是这些意见都为真宗采纳，并通过后一次考察任命其为知广州事。亦见在宋朝，君臣有很好的互动，这也是当时政治的开明之处。

真宗大中祥符三年（1010），在广州，刚刚平定宜州陈进之乱，附从陈进反叛的澄海兵家属二百余人，依法当发配为仆隶。马亮到后，一如既往，网开一面，悉不问罪。当地的盐户拖欠盐税，被逼税无奈，有将妻子典质于富家的，马亮命全部归还原家。广州是当时的国际大港，由于



种种原因，马亮接任知州时，海外船队已很久不来了。马亮用各种方法招商。第二年，到泊的船队是当初盛时的一倍，珍货大集，朝廷派中使赐宴慰问。这一年，皇帝行泰山封禅大典，马亮敦喻海外大食陀婆离、蒲含沙等国朝贡方物于泰山下。于此，可见马亮还有发展海外贸易的意识。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正月，马亮知荆南路。其向朝廷建言：“窃见天下庶官的职田，即官职所附的公田，其租作为官员俸禄的补充，获利过于优厚，请二三年间，暂停职田之设，职田所收聊助国家行政经费。臣今年行此制，所得米麦有四百二十余石。”庶官，指一般官吏。职田，又称职分田，北宋时仅外官官职所附，作为俸禄的补充。

马亮在真宗皇帝后期，历知虔、洪二州、江陵府，再迁尚书工部侍郎，复知升州，徙杭州，加集贤院学士。入为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知庐州，徙江陵，又徙江宁府。似乎官位一直在知州事、尚书侍郎之间踏步。其实，真宗有延揽其入中枢的思考。史载，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春正月，宰相王旦得痰疾久不愈，真宗命用桥子将王旦抬进宫，着其子王雍可相随。入宫后，内省直班吏人将之扶入便殿陛见。真宗慰问四番，就单刀直入地说：“卿现在痰疾加剧，万一有不讳，我当把天下事付之何人？”王旦叩头说：“知臣莫如君，惟明主择之。”再三问，不回答。皇上说：“张咏如何？”不答。又问：“马

亮如何？”不答。皇上说：“你姑且说说大致的意向。”王旦挣扎着挺直身体，举笏曰：“以臣的愚见，不如让寇准上。”皇上沉默了一会儿，说：“寇准性刚直，心胸狭隘，卿再想一想还有没有其他人。”王旦对曰：“其他人，臣都不了解。臣病困，不能久侍左右，请准予辞退。”这番谈话后不久，真宗皇帝还是尊重王旦的推荐，以寇准入相。

这段君臣问答，良可玩味。一则，宋代皇帝任相唯贤，兼听则明，不固执己见。这与那些王朝末季的昏庸之主，只亲近佞倖、外戚、宦官，不啻有天壤之别。二则，当时马亮仅为知州事、侍郎一类的中级官员，若论资排辈根本轮不到他为宰辅之选，足见其在朝野的口碑与人望，甚至他的嘉评上达天听。然此事不谐，倘若马亮真能为相，以他的才智、历练、为民请命的情怀，当是有宋的一代贤相，地位不在寇准之下。然历史不容假设。走笔至此，一声喟叹，恍然久之。

仁宗时拜尚书右丞，复知庐州，召回任京官，判尚书都省兼知审刑院，迁工部尚书，又外放，知亳州，又迁江宁府。

马亮在判尚书都省兼审刑院任上，有两个建言。一是在仁宗天圣四年（1026），权判都省马亮建言：“天下僧人以数十万计，有的为盗贼，民颇苦之。请在一年规定的时间内度人为僧，其他时间不可度人。今后亦不能收曾犯法的和有文身的人入僧籍。”诏可。一是在仁宗天圣五年（1027），马亮建言：“有奸人知将颁恩赦而故意



犯法，不得以赦免。”仁宗为之下诏曰：“自今国家有大典礼前，会赦免，但也下达了约束规定，如在这一期间有故意犯劫盗者和官员受贿者，并依法处置。”显然，这些建言都是利国利民的。

然其亦有所请为朝廷所拒绝。如前马亮知广州时，上奏：“夏天炎热，欲停诸军的例行教阅。”真宗临览奏后说：“朕记得，开国以来，广东、四川地处遐远，过去未尝给兵器，习武艺，素质较差，马亮遽停诸军教阅恐不妥。”乃诏总理军政的枢密院检查出原来的命令与近年的实例，谕令马亮遵守。

马亮知荆南路时，其辖下辰州地区溪蛮骚动，有攻掠邻近地区之势。诏命马亮，发潭州虎翼军五百人屯驻鼎州，一俟辰州有警报，就前往救援。辰州知州事张伦陈说形势利害，要求加派军队消灭溪蛮。马亮也请中央派兵支援。宰相王旦则说：“此小股蛮贼，不足以动用中央军队。但当严防其攻掠，忽使该蛮入境，杜绝其异动，地方就安静了。”真宗也同意王旦的见解。从另一个角度看，于上全部建言，为朝廷同意的大多是谋国利民方面的内容，不同意的两条则为战略战术或技术方面的内容，这恐怕并非纯出偶然。亦见当时的政治开明。

马亮最后以太子少保致仕，仁宗天圣九年（1031）卒，得年七十三，赠尚书右仆射，赐谥忠肃。他实际最高官职为工部尚书，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政府的部长。时人晏殊在《马忠肃公亮墓

志铭》中褒扬其“委质三朝，勤身四方，保绥吉禄。尽瘁克忠，褒甄有加。进退哀荣，为儒臣表式”，都是官话套话，没有评价到点子上。宋代的史书，评价其为“有智略，敏于政事，然其所至无廉称”，甚至称“饶才智而寡廉称，士论以此为惜”，元、明、清的史志陈陈相因。其前句论其禀赋、功业显然是不够的。后句说其清廉有亏，虽语焉不详，却是良史之笔。即循吏能臣也是有缺点的，“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廉，既是一个道德范畴，也是一个法律范畴。二者之间有一个质的临界。这里的廉，是否说马亮生活奢靡？但有宋一代厚禄养官，官员的生活都很优渥，中、高级官员更是如此，像欧阳修、苏轼、寇准、辛弃疾、张浚等，都以生活奢靡著称。恐怕还有其他不廉之举，但不是很严重，当然这也只是我的猜测而已。

窃以为，马亮智略超群，有行政、司法、经济长才，能驾驭复杂的政治局面，有很强的执行力，特别是他以民为本、起溺拯亡的为政宗旨，每每救苦救难，造福一方，在风格上则可谓“唯有霹雳手段，方显菩萨心肠”，为两宋“剴繁决剧”能吏之典范。至于其清廉方面风评有微词，当是白璧微瑕。其之知福州，也为福州的历史留下了仁人志士的足迹。当然，任何历史人物都有他时代的局限性，这里对马亮的高度肯定只是在中世纪历史条件下对他的评价，也就是历史主义的评价。

名山石上文

——程师孟帅闽前后交游碑刻与诗作欣赏

林思明

1034年，结束了20多年地方官磨砺的程师孟被朝廷任命管理工程事务，接着出任江西转运使，这也是地方官，却是独当一面的藩镇大员了。一众友人纷纷道贺，江西籍的曾巩、王安石等甚至写了长诗给这位有场屋之旧的老友，也庆幸家乡得了一位廉能精干的地方官。

最著名的贺诗出自强至，其《送程公辟郎中知洪州二首之二》曰：“君王从此不南忧，善付名郎第一州。笳鼓出严千骑从，旌麾坐制九诸侯。城巔观阁屏间见，江底乾坤镜里浮。门下贤豪常满榻，却应仲举减风流。”他这样直截了当地把“控蛮荆而引瓯越”的江西当成南方十省枢纽之地第一州，很是传神！

所谓“坐制九诸侯”，并非朝廷真给了“名郎”程师孟这么大权柄（只是诗人套用前朝典故，稍有夸张），而庆幸得一能臣治洪、王化南

面之意跃然也。程师孟不负众望，马到成功，两年以后调任更逼近前方的福州任知州。

当年的南方蛮族之变，忽平忽起，福州亟须建一道牢固的城墙。几十年前福州为闽国王氏治下，城墙重点是向北防御，宋统一后防御方向变成朝南，筑城工程量不小。从曹颖叔起，几任知州试过后都报告说，经费不足。

其实程师孟不觉得太为难。他的工作始以文治。福州和中原旧有交流，人文气象已粗具规模，只是和平既久，不免缺乏备战热度。曹颖叔任上已遍访地方名士如海滨四先生等，程师孟则从拜访福建的退休绅士湛俞始。

一、访贤宿猿洞

湛俞是福州仕宦人家的后代，进士出身，



“茉莉晓迷琼槛白，荔枝秋映绮筵红”，湛俞这两句诗被收入后人所著《广群芳谱》中

做过屯田郎中的湛俞年五十就弃官退隐并三召不起是真爱做平民，爱上了乡野长乐台的生活。程师孟又陪同拜谒他的先祖坟莹（湛氏祖先湛温，事闽王王延翰为祭酒。延翰遣温鸩其弟建州刺史王延禀。湛温恐兄弟启衅，构战祸民，乃自饮鸩卒。闽人哀而葬之，并名其山为祭酒岭），并在《书仲谟

在北方做了几年县官就告老还乡隐居了。湛俞的住处在城南郊外，乌石山支脉豹头山旁的宿猿洞（实为唐朝前荒山，有道士携猿猴宿其中，遂名）。程师孟前去拜访这位久违的老友，并写了一首《书湛仲谟宿猿洞》相赠：“永感无心恋搢绅，十年不起卧龙身。一朝黄纸除书下，八郡衣冠尽望尘。”

诗的口气，非官员下指示，而是老友邀请。前两句算对老友“十年不起”之总结（事实上程师孟中进士比湛俞还早几年，也在县官一类的小位置上折腾了近30年），后两句则是邀请他做自己的副手（名义说是当时福建路转运使张徽的副手，通判）。

先人功德院》中道：“高门余庆本光山，不幸流离五代间。今日太平家可乐，郎君富贵锦衣还。”

大意是，您家先人高德大义，不幸生于乱世，如今太平盛世，您还是出来做事吧，这才是家业功名嘛！

作为全州“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一把手兼科名前辈，礼貌至此，湛俞就不得不重出江湖，担任程师孟的苏州同乡、转运使张徽（字伯常）的副手。

有湛俞等福州士绅的协力参谋，张徽和程师孟构筑新城就容易多了，半年左右工程如期完工。由于工程的缘故，张徽、程师孟也常常在城边的湛俞家小酌、夜宿，留下一些彼此唱和之诗。

程师孟《宿猿洞饯仲谔》：“洞口车轮欲去地，江山风物动光辉。不须猿鹤相惊怨，自是君王未放归。”

程师孟《与伯常会宿猿洞》：“双塔和云宿翠屏，梦魂千里到禅扃。还教画手添新意，一簇林猿伴二星。”

张徽《宿猿洞和程师孟韵》：“日上高台云半屏，洞门休唤夕阳扃。巍冠不整跣趺坐，秋楮斓斑数点星。”

张徽《宿猿洞》：“洞天虚寂翠屏欹，心迹萧然万物齐。无奈宿猿嫌宿客，夜深犹向乱云啼。”

程师孟《宿猿洞和张徽韵》：“更深应是枕双欹，思得舂夔事业齐。终为清时难退隐，出山甘被百禽啼。”

程师孟《越二年正旦又会宿猿洞》：“夜半春归晓始惊，郁然佳气入山亭。千门喜庆逢元日，一座光华见使星。难得同时传寿斝，合将新句勒诗屏。渔郎莫向游人道，洞口而今尽不扃。”

张徽《宿猿洞再和程师孟韵》：“入林休顾小猿惊，寿酒交持石外亭。刺史尊崇上卿月，主人高隐少微星。只因避雨投松盖，屡为障风夹桧屏。笑语林猿能解意，往来应不限岩扃。”

程师孟诗因得《全宋诗》保存 60 多首，受他礼遇的湛俞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在《全宋诗》里仅有题为“福州运判”所作《宿猿洞和程师孟韵》之诗（很可能是湛俞的作品），缺数字：“晓来人语□□惊，空有三元□□亭。冻酒点唇浮白

蚁，秣桃迷眼落红星。地名小酉神仙窟，天设湘阴水墨屏。蕴藉莫夸洞庭记，移文休勒北山扃。”

善书辟巢大字的程师孟还题写了篆书“宿猿洞”三字，被湛俞作为洞南面额，并所唱和诸诗勒之石上。两年后程师孟去职，仲谔先生也再次告老专门莳花弄草，于洞之前后辟 25 景，自著 25 咏。洞前旧有荔枝名树洞中红，久之萎。山上枫叶极佳，后之诗人多有诗咏之。但湛俞本人的所有诗词都没有流传下来。《宋史》载他有文集传世，只是后来湮没了。

不过湛俞的宿猿洞旧址已在 30 年前全部重建，今日以黎明湖公园位置大体近之。

二、以乌石山、于山、越山以及宿猿洞为中心的交游之诗

程师孟在修竣福州城的南向城墙前后，常与僚属及友人登山过洞，间有题吟，多见刻石，然时光荏苒，时事更迭，所存已无多矣。他之爱好于山、乌石山，初因为督造新城，后竟成为习惯。

上任当年秋，福州诗人陈襄返乡探亲，刘彝因去湖北上任也途经福州。陈未仕时就名列“滨海四先生”，当县令起以多智闻（破案实例“扣钟辨盗”即出其手），后被名相富弼延入朝中做京官。因事外调，回福州“省松楸（给祖先扫墓）”。他后来做过杭州知府，与副手苏东坡交游密切唱和甚多（苏东坡因诗案入狱，他被牵连判“罚铜三十斤”，是最重的处罚）。刘彝则是福州



先薯亭旁的“程公辟、陈述古、沈公仪、湛仲谟、刘执中、杜伯通、马损之，熙宁元年冬游”题刻

郎官刘（一族多人做到郎官）的成员，特长是治理水患，江西赣州“千载不涝工程”的下水道设计即出其手。陈襄、刘彝二人比程师孟、张徽稍微年轻，官阶亦略逊，出于礼貌也谒见地方官，程师孟待若上宾。

当年的出游记录存证于石的，目前还有乌石山先薯亭侧的题字。

陈襄也是认识湛俞的，不过他访问湛俞时，湛俞已经出山任职，和程师孟、张徽之访贤性质略有不同。

陈襄《和程公辟游宿猿洞二首》：“老来归鞅海边村，犹喜诸亲聚里门。汉宗朱辨临祖账，韩侯清酒满离樽。猿惊出洞时三哭，梅送行人早一番。此去蓬莱峰顶月，梦魂应到荔科技园。”

程师孟《越山亭》：“江山千古仙人地，城郭三春刺史天。文士莫如今日盛，方袍更比别州偏。”

陈襄《和程公辟大卿游越山亭》：“荔子园林海日边，幽亭更在碧云巅。江山旧是无诸国，楼殿今为极乐园。五马如君多暇少，一樽惟我共游偏。须知白首留连意，已有新诗寄北船。”

这一组唱和，陈襄所作为律诗，程师孟的原诗则仅剩中间两联，甚是可惜。

陈襄《和程公辟红梅》：“谁把繁英染绛脂，



于山石刻“光禄卿、直昭文馆、知军州程师孟公辟、同刑部郎中充秘阁校理陈襄述古、提点刑狱都官郎中沈绅公仪、转运判官屯田郎中湛俞仲谟、新湖北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刘彝执中，同提点刑狱内殿承制杜该伯通、通判军州都官员外郎马益损之游。熙宁元年冬题”

晓妆红淡腊前时。栽培上苑无多地，嘱付行人第一枝。朔雪有情相掩映，东风何事少嘘吹。莫嫌冷落天涯远，他日和羹气味移。”

但遍寻程师孟诗，却找不到对应的原诗。

由于景点的核心部分从宋明以来渐次陵夷损失严重，一些记载也比较混乱，难以还原。

例如，曹颖叔《长乐台》诗：“兰姿冰骨与秋辉，疑作危岑磴翠微。向晚山僧苦留我，层层寒看乱云归。”被福建不少志书误题为《同述古游长乐台》，当成曹颖叔与陈襄唱和之作。

而陈襄《和张运使咏长乐台》诗：“云暗鸣驄出谷时，一方生齿庇余辉。知君才业非张翰，莫为鲈鱼有意归。”也相应被误改为《同曹颖叔游长乐台》。但察其内容，陈襄的诗很显然是写给张徽的（因张徽与张翰同姓同为江苏人，这个

“鲈鱼”的典故才算用得妥帖）。而曹太守说的留，乃是山僧之留，无关文友之谊。当然，长乐台的湮没、张徽原诗不见是造成误解的主要原因。

程师孟喜欢登山，几乎可为今日健步族之同志，寒食节、吃冷饭、芳园病叶甚至10年不能升官都不影响他的兴致。

程师孟《寒食游九仙乌石二山》：“城中无事喜寻山，千里提封并海宽。宾客相从筵既冷，士民同出食犹寒。芳园病叶堆何限，古院闲花落几般。谁道异乡多感慨，登临迟却十年官。”

越山附近的冶山，程师孟所建有欧冶亭，自为记云：“余至州之明年，新子城。城之东北隅，灌木阴翳，因为开通，始问此水。或对曰：欧冶池。予窃嘉其迹最古，且爱其开阔清泚。又池之南，陇草盘纤，乔林古木，沧洲野色，郁然城堞



升山寺后石磴百级，至今仍存题名者程师孟、陈倩、马益、何辟非、刘奕等。后人林则徐、郭柏苍等也留有刻石



今日卧龙山龙首境之山门

之下。于是亭阁其上，而浮以画舫，可燕可游。亭之北跨濠而梁，以通新道。既而州人士女来游不绝，遂为胜概。”

程师孟在这一带的散吟句也有不少佳构，如：“海上风流荔枝国，人间潇洒菊花天。”“欧冶池塘晴潋滟，越王山寺晓玲珑。”“最爱荔枝初熟后，人间都在赤城间。”

三、北郊升山、卧龙山、品石岩之游

升山在福州北郊约7里，也称飞来峰。《寰宇记》载：“越王勾践时，一夕，会稽飞来，岩石

间时闻鼓声。”山巅诸名胜古迹计有紫云台、任公台、静游亭、洗药池、熙春台、不溢泉、鬼磨石、仙升岩、岩孕芝、息龟池、揽秀亭等。

去城5里的卧龙山，一名伏龙山（今日铜盘马鞍山一带）。山下有三石列如“品”字，名品石岩。石圆而耸，叩之则诸山响应，又名应石（但今日已夷为平地辟为公路，唯空余应石山路之地名矣）。浮仓山（今名浮村），在卧龙山北。

《闽都记》载：“晋太康时，凿东湖，山在湖心，上平下方，若浮仓然。”旧湖淤塞，今又重新疏浚为琴亭湖。战坂及战坂之西的陶灶，俱古地名。

这一片丘陵地，北宋时为福州主要农业区，

太守亦多巡视。前太守元绛有《卧龙山》诗：“朱车番何事独来频，不为溪山只为民。最爱年年禾稻熟，时丰定有壤歌人。”

程师孟《与陈襄、刘彝、湛俞同游卧龙山》诗：“闻说林泉便访寻，平田一径陟孤岑。松阴落处宜诸客，荔子生时值万金。尽放迟回官舍近，不妨闲处石门深。四边稻熟征租子，稍愜微官出郭心。”陈襄、刘彝同在福州又逢稻熟征租，当是熙宁年初冬，粮食收成好，下一年度的官就好做！

《全宋诗》载之程师孟作诗《升山祠堂》也是不完整的：“行处松萝深似幄，望中城郭细如棋。清泉可惜藏岩下，不作先生洗药池。”

因为陈襄《和程大卿游升山》诗是律诗：“相逢不及荔枝期，况值千岩雪洒时。南国小棠偏去近，北山逋客独来迟。云中直上三清路，尘外都如一局棋。闻欲引泉添洗药，未应夺我凤凰池。”

四、结语

程师孟在宋朝不算大红大紫的人物。但他精明笃实，在福州解决了前五六任积欠下来的南方城墙建筑问题（以后广州任上又解决了广州的城墙难题），又利用地方绅士财力扩充府学，3年不到被评为“治行东南第一”。程师孟一生著作流传至今只有《全宋诗》中留下的60多首，其中在福州期间所作竟占了一小半，足见其对福州感情之深。



光禄吟台的程师孟题石图

当程师孟以78岁高龄从越州知州任上退老返乡时，顺路探访了已从权力中心退出的老友王安石（他们俩虽有所谓“场屋之旧”，但一生见面都推诚相见“如青衣时”。故虽拜相数载，程师孟竟不曾受挟一官）。王安石问他，你还会想再做官吗？程师孟坦然答，还想再做一任知州！这位老人家做过五六地知州，其中闽、洪、广、越四州人民为其立生祠！做官，能得上意不易，得民心尤难，像程师孟这样的好官，真是太不容易了！

近代博物学家郭柏苍《题追昔亭》诗曰：“读遍名山石上文，吟台清兴更凌云。万株手植无人忆，我独瓣香忆使君。”是深知公也。而古迹之遭千载剥啄，师孟之诗尤宜再设法刻石以纪，概斯人之于是邦曰有功焉。

《容斋随笔》作者在福州

刘湘如 林依光

《容斋随笔》是毛泽东主席生前十分珍爱的一部书，一直伴其左右，精心研读达40年之久。临终前13天，他老人家还要索阅此书，于是该书成了毛泽东一生最后要读的古籍。

许多人不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洪迈，还与福州结下过一段渊源。

洪迈是宋代一位大学者，江西鄱阳（今波阳）人，字景卢，号容斋。父洪皓、哥洪适都是著名文人。洪适官至宰相。洪迈中进士后，曾任过知州、翰林学士，编修国史等职，在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度过了79年之久。他学问渊博，著作极丰，除了《容斋随笔》外，《夷坚志》也是传世名作。尤其是《夷坚志》这部巨著保存大量宋代福州民间以及全省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与轶闻掌故。

洪迈于宋代绍兴十五年（1145）中举后，曾到福州任教授。他在福州任职期间，广泛收集采访许多民间传闻轶事，如《福州猴王》（又称《宗演去猴妖》）以及《福州两院灯》《海大鱼》《闽



洪迈

丞厅柱》《永福（永泰）村院犬》《榕树鹭巢》《闽清异境》《福州大悲巫》《福州异猪》《福州屠家儿》《长乐海寇》《闽侯雪峰异僧》《福州民家猪》《闽清张圣者》《无缝船》等，达16篇之多。其中《福州猴王》为当今研究福州民间的“猴文化”“齐天大圣信俗”以及《西游记》孙悟空等信俗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背景。尤其是《无缝船》这一篇，记载800年前宋代绍兴二十七年（1157）七月，“福州甘棠港有一条船从海上漂来，船上有三男一女，载有数千斤檀香。其中一人是福州人，



《容斋随笔》，洪迈著



《夷坚志》，洪迈著

家住南台，经常在海上来往，因遇险失舟，偶得一木浮行到大海上。该岛系一岛国，岛国人知海难为中国人，便留他饮食居住，并妻以女，在该岛生活了13年。由于语言不通，该国人使用舟船经两个月航行，送到闽县（福州）登岸，县令丘铎文还前往探视，以酒招待。”这条史料非常珍贵，说明早在800多年前福州人就驾船从甘棠港出发到国外进行贸易，为研究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提供了宝贵资料。

此外，洪迈还到闽北、闽东、闽西、闽南地区任职考察，任过知州（知府）等，留下《汀州（长汀）通判》《浦城道店蝇》《尤溪仙奕》《长溪（霞浦）民》《泉州杨客》《邵武试院》《建阳驿小儿》《莆田蔡京孙妇》《莆田海船》《古田民遗宝》《南安穷神》《建宁叶道行法》《泰宁牛梦》《泰宁狱囚》《武夷道人》《莆田处子》《德化鸢兽》等几十篇文章，为研究800年前当地民情风俗留下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洪迈在闽任职期间，为官清廉，多为民着想，对于地方恶势力给予严厉打击，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他任建州知州前，闽北地方富豪依靠社会恶势力随便杀人，并持刀劫狱，长期拒捕，逍遥法外。洪迈到任后，“正其罪，黥流岭外”，把罪大恶极者予以正法，其他人押送到边远地区。另外，有的流氓恶棍为了泄私愤，往往对“仇人”进行“耳朵灌注溶沙石蜡，使人耳聋”“湿布裹身卵石殴打，致人暗伤”“鱼钩藏物令人吞食，使人肠腐”等种种残酷的手段，横霸乡里。洪迈获悉后，便对这些社会上的奸猾之徒进行惩治，张榜明令禁止各种犯罪活动，并告诉外省官员，若到福建做官，要留心此类案件，一定要严惩地霸奸凶。

洪迈在福建当官期间，广泛搜集地方轶闻民俗，在《容斋随笔》与《夷坚志》里，保存了许多民间文献资料，是很有历史价值与现实借鉴意义的。

无 患 瓷

林 肖

究竟为何，一件古旧的薄脆之物会唤起人们如此绵长的思绪？现在，它静静地躺在我的手掌里，我须格外小心地拿捏、翻看。这是一个黑釉的浅碗，底部带有一圈陶土黄，酷似《水浒传》里好汉们用来痛饮的黑酒碗。若不说来由，放在今天怕是无人问津。它如此易碎，却又坚韧异常，经得起万千时光的研磨，从两宋一路走到明清。它盛过饭食、果蔬、粗茶、淡酒，也装过工匠的热望、农人的艰辛、游子的牵念。我凑近它仔细打量，只见幽幽的光泽从器皿身上透射出来。这些源自瓷土中万千石英云母颗粒的光，让所有光线都朝同一方向折射，似在暗示某种诡异的走向；这走向，又因折射而有了曲径通幽之妙，使历史在寒冷处生起暖意。



东张宋窑遗址

闽中秋意渐浓，久未降雨使得福清东张的群山失了几分灵气。无患溪依旧从青山绵延处潺湲而来，水势虽说低落不少，但总归构成了一副山水缠绵之态。这里属于戴云山的余脉，山势渐



东张窑口外保存的古窑瓷品

渐止于舒缓，而溪水则接纳了涓滴之流，默默登程，向着龙江汇聚。

4500年前，无患溪畔的小山坡。福清最早的古人类组成若干个父系氏族在此狩猎、捕鱼、种植、采果。这样一个走过漫长渔猎农耕岁月的族群，在数千年后延续着“道”“常”规律，与泥土、水、火焰日夜晤对辨析，追求臻于至上的制瓷技艺，说来也是悟天修道——山生土，土生瓷，瓷生万象。

石坑村和岭下村坐落于无患溪畔。一条村道从山坡下蜿蜒而过，与无患溪对望，若不加以点明，恐怕没人会对这座普通的小山包产生兴趣。午后的秋阳渐生灼热，斜斜映射着无患溪水，也附丽在山间草木上，仿佛有意烘热隐藏其间的宋代遗窑，使之醒转过来。

20世纪80年代初，东张宋窑遗址被发现，一时间，考古队、淘宝者纷至沓来，石坑村和岭

下村成为众人寻宝之地。在村落后面约1万平方米的山坡上，发现了10多处古窑遗址。最初时，漏斗型匣钵、瓷片、垫饼、支柱、支圈等古物在方圆2平方公里的地面上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堆积了3米多高。这些古窑始于北宋，盛于南宋，衰于元。据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记载，东张宋窑为南宋时期福建四大民窑（同安、泉州、福清、连江）之一，多烧制黑釉、

青绿釉、灰白釉、兔毫茶盏及其他日用瓷器。这些简单的文字，却在这片不大的山坡地，建构起了千年之前的人间秘密，频频供后人追怀、探究。

我们不妨把这些窑址内的瓷器称为“无患瓷”。既然选择与无患溪为邻，就必然要接受溪水对一个时代、数座窑的抚恤纾解，以及溪畔那曾经纷杂的人影和足迹。

树丛间，几处砖砌窑基残壁清晰可见。未加掩饰的残破定格于历史深处，或是它现在最好的面目，仿佛这样才会隐隐道出那些陌生的故事，而不惊动尘嚣和声浪。但事实并非如此，这里已被人翻过了无数遍，许多瓷器碎片散落在窑旁、树下，如同弃儿。我在碎片堆中反复翻捡，明知不会有完整的器皿，也乐于让指尖触碰这些古老之物，好似轻拾残碎的梦影。它们多来自未及烧就的作品，釉色尚未完整呈现，却几乎在天地之间摆脱了人为修饰而至于纯粹。

“无患”，没有忧患，像是美好的祝愿，除却明媚、恒久，即便有喑哑、苍凉，想必也该化入那一片山色水光中，只见淡然自若了吧。

二

博物馆里的“无患瓷”盏自然已与山光水色绝缘，只有当保管员打开几重保险柜，小心翼翼地将捧出，置于窗台上，它才重见了天光。

这种茶盏的制作风格与建阳水吉窑的建盏极为相似。釉色黑而润泽，釉质虽不比建盏肥厚，却紧薄有致，硬实刚强，造型精巧大方，口大底沉，胎骨较薄，釉形凝重。釉面则呈现规则的丝条纹，细如兔毛尖，是为“兔毫”盏。这种黑釉盏的独特装饰，以建窑烧制最负盛名，东张窑“无患瓷”盏既与之高度相似，自然不缺变幻莫测的纹理。

这些奇异的釉调，形成于黑铁釉的结晶原理，并受坯、釉、窑温及其还原气氛诸因素共同影响。这是泥土、水和火焰共同完成的魔法。简单说来，在1300多度的高温焙烧中，坯中的部分氧化铁与釉熔融后缓慢冷却，局部形成过饱和状态，并分解生成气泡，当气泡聚集到一定程度，便会连带周围的铁氧化物一起排出釉面。匠人掌握了这一规律，通过控制焙烧温度和铁氧化物聚集，塑造出不同风格的釉面：油滴、兔毫甚至鹧鸪斑、“曜变”。黑釉上的点、片、条状图案由此呈现纵深幻觉，令人为之目眩，惊为天技。

那是属于宋瓷时代的高峰之作，孤绝于前后茫茫时空，却又和青瓷、白瓷一起，共同铸就宋瓷的质地：致密、坚硬、儒雅。这便是黑瓷。

但对于产自无患溪畔的黑瓷，这样的评述仍然只具概念意义。当你伸出手，一次次摩挲，一遍遍赏玩，视觉和指尖所传递的美感与质感，总能轻易占据我们对一件器物的认知，即便交接起它的前世今生，也未必能完全参透其中的重重玄机。我们只能静静与之相对，努力捕捉那一丝呼吸、那一缕生命，哪怕只有一丝一缕，都是千年人生，足以容纳人们对时间的真切敬意，以及滋生于隐秘之中的虔诚。

三

与其他黑瓷盏一样，“无患瓷”盏缘起茶道，可谓是时运之物。

先让我们梦回宋朝：宋人好雅，盛行饮茶，不但帝王官宦如此，士商及市井细民亦习此风。《东京梦华录》所记汴京茶肆盛况，或可谓奢华无以复加，“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面”，茶之尚日盛一日，“点茶”“斗茶”风靡于京师及民间。如此热衷品茶，自然对茶盏品种格外讲究。茶之常品，其色绿，多“煎啜之”，宜于白瓷和青瓷盏；而茶之佳品，其色白，以黑瓷盏“点啜之”显然更为适宜。黑釉可衬托出茶汤之白，便于观茶色、验水痕。如此一来，包括“无患瓷”盏在内的黑盏得以受宠便在情理之中了。

宋室南渡后，南方各窑烧制黑盏较先前更盛，福清东张窑也声名鹊起。

彼时的南中国，茶事依旧，黑盏热销，然而宋人内心的震动和变化却是微妙的。此前，黑盏为浮华生活的介质，“乳雾汹涌，溢盏而起，周回凝而不动”，所谓浮生若梦，恰如盏中之物。而在南宋，黑盏之中除了寄放暂时的逸乐，更多了时局忧惧下渗出一丝丝苦涩，它随一杯杯茶水被灌进喉咙，在胃里发酵，继而生成对遥远土地和祖先的思念。

犹如苦酒一般，灼痛整个南宋血脉和神经的是失去的半壁江山——那土地和河流，祖先的叹息萦回其间，此时又因失去而倍感沉重。然而在南方烈焰的煅烧下，曾经的土地和河流得以重生，得以交握于南人之手，延续着看似不变的日常。这一切，有如奉了神谕。许多被迫遗失之物，往往印证着数种转化的可能，隔一个或几个时空与客观世界彼此心照，阴与阳、正与负、偶然与必然、可知与不可知，在盏中叠合。但叠合，便是存在，便是纾解的出世和隐性的安顿……烈日暴雨过后的短暂秋日，“无患瓷”盏和它的黑盏家族，以最接近祖先召唤的质感和纹理，执拗地寻找慰藉和宁静，在残破江山，在敏感而多思的内心。

闽中的飒爽秋意，在千年之前与千年之后或许并无分别，一样在东张的山谷里泛起阵阵遐思，盈满我们手中的杯盏。“无患瓷”，以其耿介、多情应对乾坤巨变，富有尊严地走过荣枯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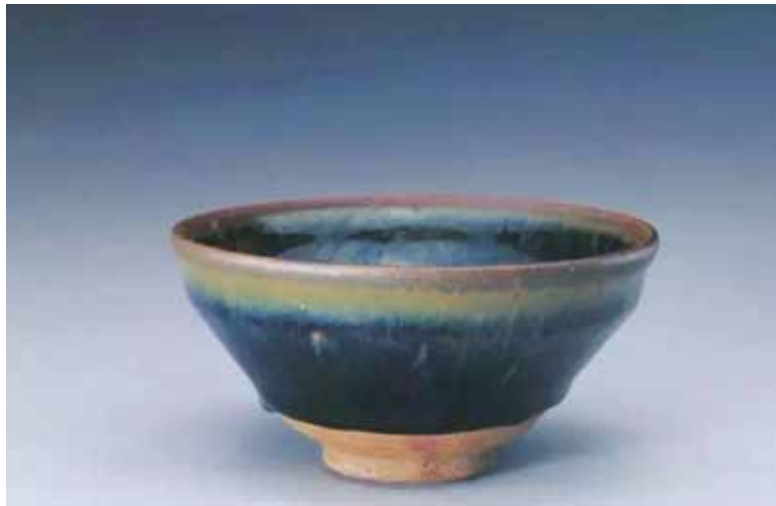
生死。而在对美和信仰的追求中，福清人关于泥土、水和火焰的理解，早已超脱固形的束缚，充满消融万物的渴望，也让后人在笔墨深情的赓续间，窥见了复杂人世中的那一瞬永恒。

四

站在无患溪畔，连接石坑村和岭下村的山坡尽收眼中，状似卧龙，又在午后光影浮动中，渐渐复苏，升腾起缕缕青烟……

这是南方特有的窑形，依山坡而建，自下而上，如龙似蛇，内砌多道挡火墙，形成“分室龙窑”。满窑的瓷坯经繁复的工序做下来，已具雏形，装填完毕，最后的命运将托付给狂舞而鬼魅的火焰，等待奇迹降临。窑门封闭后，窑头之火先燃，依次投柴，窑内随之火龙翻腾，热气沿坡度迅猛上升，可达1300多度。人间精品的锻造，耐性、韧性的挑战，都被置于这性命攸关的几天几夜。把装师傅寸步不离守在窑前，眸子里火球滚动……

无患溪水在窑前潺潺流动，山色映入水光，水光必定也映入燃烧的龙窑，附着在黑釉瓷上，使之隐隐闪亮。溪中立着一座座水碓，溪流转动，石碓日夜锤打，将瓷石舂碎舂细，再掺入高岭土，吱呀吱呀，扑哧扑哧，连同流水的潺潺声，不绝于耳，渐又像一曲山歌隐入青山绿水，使这里的一切都成为其中的一滴水、一片叶、一丝悲欣。拉坯、利坯全凭经验和手感，那是窑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东张窑黑釉盏

工与器物、岁月的血缘关系，竹片、刀子、手、神经末梢因而连成肌体。竹片、刀子旋舞之下，呼哧作响，坯花飞溅，坯体越削越光洁，然后晒坯、刻花、施釉……多少个日夜，他们眺望青山，俯视溪流，进逼火焰，心头必定也承受光线的变幻不定：闪亮的、阴暗的、耀眼的，一次又一次，更迭、环复——制瓷，就是烧制无穷无尽的水光山色。

逝者如斯，时间、生命隐喻其中，万水归海，海就是时间和生命的集合。“无患瓷”的生命、窑工的智慧、商旅的热望，曾被不计其数的帆船、竹筏满载，在此登程，顺溪流东去，经过35公里的龙江水道，到达海口，继而转换大船，漂洋出海，将无患溪畔的水光山色分销往日本、朝鲜、东南亚……

12世纪，黑盏出现在日本，其中不少是来自福清的“无患瓷”盏。日本人惊叹之下用“天

目盏”来称呼这些神奇的茶道器皿，还根据不同花纹，冠之以“曜变天目”“油滴天目”“禾目天目”等名号。当时日本“茶会”盛行，中国禅院的茶礼被广泛采用，渐成日本茶道的初始形态。14世纪南北朝时期和15世纪室町时期，日本的“茶会”风行鉴赏黑盏等名贵唐物，上流人士纷纷以拥有黑盏等宋代茶具为荣，甚至在茶道点茶中出现了“天目点”，即专门为天目盏点茶而设的一套程序。直到

16世纪中叶，日本“茶圣”千利休对“草庵茶”进行改良，使日本茶道进一步庶民化，中国的黑盏才被束之高阁。

一段文明的传奇就此封存。福清的宋瓷文明、海丝之路必经无患溪，一代又一代瓷人出没于此，然后像溪水里的树叶、山花、鱼儿，消失于时间和文字。溪底卵石依然静卧，或如千年以前，溪畔的工棚、货仓、客栈、驿站、农舍早付了云烟，唯余古窑数座，静看溪水流逝如古往今来，人间万事明灭不定，东入海。

四围山色中，一溪残照里。

秋阳渐渐黯淡，山岚水雾反倒更浓，我像宋人一样，在无患溪畔游荡、寻觅。极目向溪流东去处张望，隐约可见水天交接之际泛着海的颜色，而我的体内，也开始出现一盏光亮、三桅帆船及其转化生出的不尽沧海——答案，总向更远处无限延伸。

百舸争流待后生

林 敏

大樟溪自西而东贯穿永泰全境，流经9个乡镇，最终汇入乌龙江，流入东海。永泰境内群山林立，沟深谷狭，多激流险滩，《永泰县志》记得详细：“全程有169处滩濑，其中35处为险滩孽濑。”

在如此险恶的水上作业，无异于“虎口夺食”。如果说古代嵩口的繁华昌盛离不开水运的繁荣，那么，在大樟溪上跑船的船工、排工就是

英雄，历史该给他们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笔者走访了几位曾经的船工、放排师傅。他们回忆起曾经跑水运的经历，自豪之中仍留有余悸。

船工：帆樯如云竞樟溪

直街近古渡口处有一拱形门洞，上书“群贤毕集”四个大字。再出去就是德星楼，几根红



贯穿永泰全境的大樟溪



通往古渡口的小拱门，上书“群贤毕集”四个大字

漆木柱左右排列，支撑起三层楼房，也打开了古街往古渡口的一楼通道。在中山村林书记的引荐下，我们在德星楼下走访了两位老者。一位是曾经的船工林登华，今年 80 多岁，亲切温和；一位是在此设了个小摊点卖些嵩口特色食品的林开进，土生土长嵩口人，今年 70 多岁，颇健谈。

此时正值炎热的 7 月午后，阳光炙烤，但这里不仅阴凉蔽日，时时还有溪风穿街而过，凉爽舒适。我们就此无拘无束地打开了那段并不久远的历史。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大樟溪帆樯如云。各埠头木帆船数量，包括沿岸各支流的共有 200 多条，其中嵩口就有 30 多条。嵩口是周边 5 县 10 多个乡镇的中转站，集散各地的土特产品，如李干、茶油、笋干、香菇、茶酒等，数量庞大，品种繁多。这些货物常常由挑工肩扛到渡口，经由大樟溪水运到县城、省城。返航时，再装上油盐酱醋、布匹干货等生活必需品及化肥农药等生产

物资，用木帆船运回。由于嵩口物资丰富，除了嵩口本地船之外，梧桐、赤溪、县城等外地船只也时常往返于此。嵩口人以一种开放的胸襟、包容的姿态共同促进大樟溪水运的繁荣。

嵩口船工是专职行业，多为月阙村林氏。船家的上司是商家老板。商家老板各姓氏都有，船家的收入由他们商定，但可以讲价，给付的方式是货到即付（运费）。但这一趟下来，假如船与货中途有损失，船家必须赔偿。回忆起当船工的苦与险，两位老者滔滔不绝。

“当地有句俗语，三种男人不像‘子’：衙门人、戏子、撑船人。”乍一听，不解其意。细听来方明白：衙门人生性风流不是正经人；戏子因条件所迫，男女一起睡舞台，外头人觉得不像话；那船工呢，一旦上了船，下半身穿条裤衩甚或连裤衩都不穿，也“不像子”。这是因为水上作业，全程（往福州 8 小时左右，回程 3-5 天）与水打交道，身上无一时一处是干爽的，没有穿



旧时大樟溪上的木帆船和船夫



嵩口古渡口

工，3条船就是9名。林老形容拉纤船工就是“四脚爬的动物”，苦不堪言。说到此，一直静静聆听的林书记忍不住接过话茬：“我爷爷就是在返程拉纤时，由于前面纤绳断裂，船往后退，压在了船后的爷爷身上，所幸大难不死，但身体严重受伤，从此不再跑船。”

的必要。另外船工生活拮据，怕衣服长期泡水易损，舍不得穿。寒暑皆如此。沿岸漂洗衣服的女子见到有船只近前，都下意识地闭上眼睛。这一“不像子”饱含了船工多少的心酸苦泪。

在大樟溪上跑船的船工，除了膂力过人，还得胆大心细，熟记全程中的险滩恶濑位置，以不同的手段对付。即便如此，危险仍无处不在。

跑水运的船都配有一根桅杆，上挂帆布。顺流而下时无须张帆，从下游返航，遇到有风时帆布张开。后面来风效果最佳，船借风势便能获得前行的加速度。如果是左右横向来风，在有经验的船工手里，也是可以利用的。但多数情况下，风不可能如此便利，最怕迎面风不止，或遇到激流险滩时，船工就必须下船拉纤。为了节省人力，经常三条船结伴而行，每条船上配备3名船

拉纤出事只是个意外，最危险的还是“三门斗瓮”，即如今界竹口水库坝址处，那可是有名的险滩。水面到此突然收窄，水流骤然变急，溪流拐弯处，三组石头夹着中间水流，船行至此，像醉酒似的兜来拐去，不听使唤，刚蹭是难免的，一旦操作不当，就易被激流卷到“瓮”里去，那可是九死一生了。永泰邑人鄢既齐曾作诗一首《忆汙溪归棹》曰：“三门斗瓮涛何急，巫峡瞿塘浪不粗。四十年前轻买棹，惊魂此日尚挠夫。”描绘的就是这一惊险。过了“三门斗瓮”，所有的船工都可以庆幸地松一口气。

告别了两位老者，我们来到水运起点——古渡口旁，望着溪中那块象征“航船启程标志”的大石头，想象曾经千帆竞发的场景，心里百感交集。

放排工：乘风破浪走樟溪

嵩口属山区，盛产樟木、杉木和松木。樟木是远洋船龙骨的珍贵木材，杉木是船身的木料，樟杉松都是建筑良材。在陆路交通不便的年代，通过水运把木料“放”出去，也就是“放排”。所谓“放排”，是借助水流运送木材的一种方式。放排不仅可以降低运输成本，而且无须把木材截断运输，可确保材质的完整性。

嵩口排工师傅多是渡口对岸的山后自然村杨氏。因此，古渡口就形成了半边放木帆船，半边放木排的格局。在山后村，我们走访了杨德云、杨德发兄弟俩，他们都曾是排工师傅。哥哥68岁，相对沉静温和，弟弟67岁，热情善谈。据说弟弟杨德发还多次上电视台说放排故事。

知道我们来意，杨德发师傅打开了话匣子：“我13岁放排尾，15岁就放排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放排最盛。放木排就是将木材用藤

条、篾缆等索具（藤条、篾缆还有个作用，如果中途休息，将此系在滩头或桥头的树木上，以防木排漂走）编扎成排节，根据河流状况，或再将若干排节纵横连接成排架，顺水漂下，完成运输过程。木排呈喇叭形，排头4-5节，然后逐渐增宽，中间最宽处约5米，尾巴最小仅两节。木排长度一般约20米，称为一架。每架2个放排工，一个撑排头，一个撑排尾。排头要精熟水道，掌握木排的航向；并要注意排与排的间距，以免追尾（最多时大樟溪过排200多架）；还要随时观察并应对紧急情况的发生。因此，撑排头的必须是经验丰富的老排工。

“15岁还是个孩子，您都不怕吗？”我忍不住发问。

“城隍边上的人不怕鬼，溪边长大的人不怕水。”杨师傅哈哈大笑，“放排又辛苦又危险，但工资高啊！”接着他给我们算了下账，当时一位公务员年薪不足千元，而排工一年的收入达两三千。重金之下必有勇夫，但像杨师傅这样年

少就放排头算是勇夫中“天赋极高”的了，而且他还曾入选10人组成的一班“老虎队”呢，顾名思义，那是最生猛、最勇敢的放排队，据说同道见了都纷纷让路，难怪他提及往事语带自豪。杨师傅乘兴给



1972年，大樟溪上排工放木排

我们哼唱一段排工歌：“永福小县好南山，南门近来六角坑。起早走上界竹口，芦潭过去白龙坑。”原来他所唱的是县城到嵩口的水上线路，其渡口就有19个之多，用朗朗上口的民歌形式熟记沿线水路，也是排工的一种智慧。

“老虎队”成员不仅放排是行家里手，救人也当仁不让。杨师傅说，他在大樟溪上来来回回这一生，直接或间接救下的少说也有几十人次。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要数20世纪80年代那一次：那一天，杨师傅兄弟出工放排，乘风破浪一路行至梧桐白垵附近叫小坪的地方时，溪上的排越来越密集，达到了11架之多。行在前三的是汊口排，第四排是杨家堂哥，杨师傅随其后。如同“汽车追尾”事故，堂哥的排撞上前面的排，直插前排底下去了，堂哥慌乱之下忘了“跳水”（放排工最佳逃生方式），人也被卷到排底下去了。杨师傅立马喊人一起用斧头砍散木材，救出人时，已没有了呼吸。凭经验杨师傅给堂哥实施人工呼吸，30分钟后，堂哥七窍流血，大喊一声：“好痛啊！”此时，算是救回了半条命。继而杨师傅就近借了张竹椅，众人脱下衣服，将人固定其中，用拖拉机运回嵩口，在医生的医治下，终于救回了堂哥一条命。

“放排是把生命系在裤带上的职业”。排

工每日早餐不分筷子（意味不吉：散排用筷子撬），碗上不搁筷子（随带餐也都是饭团）。一家人不多言，力避与搁浅、翻排、撞散、折断等险情有关的词语和动作。

嵩口船工、排工师傅早起第一炷香敬奉“社头工”，即嵩口当地人水上“保护神”——德星楼林公大使。每年抢着到德星楼帮忙做义务工，给压岁钱，以求水上作业时能平平安安，寄托着人们对水的敬畏和希望。如今水运日渐式微，但人们对林公大使的崇拜热度不减。

嵩口：百舸争流待后生

嵩口先人择水而居，大樟溪也给嵩口人福祉。经过像船工、排工这样祖祖辈辈的辛勤奋斗，留下具有丰富水文化内涵的宝贵遗产：如明清古厝建筑，向我们诉说嵩口曾经的繁荣；因水而盛的嵩口圩市，为“海上丝绸之路”、海外贸易做出了贡献；水文化孕育了地灵人杰，诞生了月洲“进士村”，走出了像张元幹这样的诗词大家……

行船巧借东风力，百舸争流待后生。嵩口这艘“航船”，在嵩口新一代“船工”们的努力下，必将走得更稳更快更远！



偶遇御医力钧

黄以胜

1968年念小学四年级的我，在舅父家翻箱倒柜，偶然发现了一沓旧书信，不知里面写什么，就拿给我父亲解读。原来这是一封在京城当官、给皇帝看病的太医力钧写给我太叔公吴礼尊的信。吴礼尊是力钧儿时的伙伴、同期秀才，由于农村识字人少，力钧到北京后，只和吴礼尊有书信来往。力钧在信中说：“田山再便宜宁可少买，念书再困难也要多读。”又说，“拳头再大不过墙，笔杆会尖能过洋。”他在信中还教我太叔公用松针治疗夜盲症。当时我还无法理解那两句名言的真正含义。

每当我想念书或与他人争吵时，父母都会用这两句名言来鞭策教育我用功读书，并说力钧小时候用捡橘子皮换来的钱，去买书读，用木条当笔、以地当纸来练习写字，就是靠这种勤奋求学、励志成才的理念，才从这山沟沟里走向京城的。还说当医生是最好的职业，不管什么年代，都会有口饭吃。温饱问题还未能解决的我，开始对御医力钧产生了好奇和敬意，梦想有一天能够离开贫穷的乡下，到城市去工作。从此我对读书也产生了兴趣，开始用功读书了。

恢复高考后，我考入了福建卫生职业学院检



力 钧

验专业。1979年暑假过后，我从老家带些地瓜粉等农副产品，到福州南营锦巷吴家大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为白云芹滌吴氏家院，现为福州大洋百货）黄嫩妹家。她是我白云宗亲，已70多岁，菜姑（不入寺庙的尼姑）五保户，又患有白内障，视力不好，生活非常困难，经常得到我父亲的接济。由于我学校离她家近，经常帮她挑水、做卫生，并发动一些同学给她送些粮票。我还经常到东街口我父亲的建筑工地上，捡些废木料给她当柴火烧。也许是出于一种感激，当她知道我是学医的，就拿出一个精制的木箱给我看，说：“这是老家芹滌人在北京当太医的力钧，给病人看病的一个‘机器’，他去京前寄存在我公公家里，他原来也住在这里。已经八九十年了，无人

来取，你若用得上，就拿去，不能用，就当废铜卖掉。”黄嫩妹公公力方提是力钧堂侄儿，清末民初几十年间，力方提和长子力书尧（黄嫩妹丈夫）父子两代均在南营给白云芹滌人看家护院。我打开木箱一看，是一台铜制的显微镜，擦去沉积已久的灰尘后，发现是一台完好无损的进口显微镜，我高兴地把它带回了学校。

第二天，我将它拿给我国著名的阿米巴痢疾专家吴开宇教授和医学检验界老前辈郑洲潘主任看，他俩看后高兴地对我说，这是一台难得的进口显微镜，推测是在1860—1880年间，由世界最先进的光学仪器厂家——德国蔡氏公司制造，尽管100年过去了，其质量还领先于国产显微镜，能将细菌放大1500倍，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当时学校实验室中的显微镜只能两人合用一台，我带来的这台就成了我个人专用的实验仪器了。

吴教授问我这台显微镜从哪里拿来的，我说是清末时期在京城当御医的力钧留下的。年近七十、从事细菌学研究40多年的吴教授说：“力钧这个人我听说过。据《博医会报》报道，1894年之后，鼠疫又传入广州、香港、福州、厦门等地，死亡人数高达十多万人。那次在福州发生的鼠疫大流行，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无力顾及百姓的安危，任其大肆传播流行，给福州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尸横遍野，惨不忍睹。在京城之力钧和几位老中医，不顾被传染的危险，以特制的大青汤，义诊于



力钧先生用过的显微镜

市，治愈了一些鼠疫病人。这些大青汤还让许多高危市民服用，起到了一定的预防作用和安定人心的作用。”

当我问及这台显微镜在当时的应用价值时，吴教授答道：“清末时期，我国的微生物学和寄生虫学几乎一片空白，个别寄生虫病虽有描述，但缺乏实验室检查手段和生活史等科学理论依据。作为国医大师之力钧，能站在世界医学之前沿，学习西医的先进医学理论知识，应用西方的先进医疗仪器，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当吴教授细心观察了显微镜各部件后，发现低倍镜有磨损的痕迹，由此他大胆推断：第一种可能，当时我国肠道寄生虫病发病率很高，是一种常见病，低倍镜极有可能是用于肠道寄生虫的检查，一般医生操作几天就可以掌握检查要领；第二种可能就是用于教学，让学生开阔眼界，观看微生态世界，培养学生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兴趣。由此可见，力钧是一位中西医结合的先行者。

隐去庐山真面目

邱伟坛

在福建省闽侯的小村子里，有这么一个不甚普通的家庭：一个严肃古板、脾气暴躁的男主人，一个思想保守、“三从四德”的女主人，还有三个儿子。男主人叫黄宝瑛，是个举人，在当地也算有些名望。夫妻两人想着再生一个女儿，子女双全，凑成个“好”字。果然，天遂人愿，1899年5月4日，一个女儿降生了。这个取名黄淑仪的女婴，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庐隐。

在庐隐降生当天，她的外祖母不幸离世了。黄夫人便认定这个女婴为不祥之物，说什么也不愿为她哺乳，随便找了个奶妈，将小庐隐打发至下房。或许是一出生便感受到来自家族的冷遇和亲生母亲的嫌弃，小庐隐特别爱哭。扁平的长圆脸，塌陷的鼻梁，过宽的眉间，一哭起来，大嘴咧着，烦人的哭声止也止不住。父母亲讨厌，连哥哥们也避而远之。在潮湿阴暗、卫生条件欠佳的下房里，小家伙长了满身的疥疮，难看难受难耐，不承想，又生了极重的热病，母亲厌弃之外竟生绝望，差一点一棒将她打死。奶妈心善，央求着要把她带回自己家里抚养，等病好了再送回来，要是挨不过去，就算了。幸或不幸，小庐隐在奶妈家安安生生地生活了一段时间，病奇迹般地好了。



庐隐出生的房间

庐隐3岁时，黄举人受了清朝皇室恩宠，做了湖南长沙的知县，全家欢天喜地，这才想起小庐隐来。母亲便差人把她从奶妈家接来，准备跟随老爷前往长沙上任，过好日子。黄家乘船赴任，小庐隐在船上满目是乖戾暴躁的父亲和一脸嫌弃的母亲，回想起慈爱的奶妈和同龄的女伴，满心的不舍；又看到翻腾的海水，颠簸的船板，恐惧、孤独、无依无靠的感觉扑面而来，哭泣，哭泣，除了哭泣，只有哭泣，她一无所有。

黄知县正欢喜着，忽然被这漫天哭声冲了晦气，不由怒从心来，一把提起小庐隐，骂骂咧咧着，作势就要往海水中抛去……天可怜见的，一个听差奔了过来，把小庐隐从他手里夺过来，才

保全了幼小的生命。

到长沙不久，母亲便生了妹妹黄湘。1905年年关刚过，黄知县患了心脏病，10日不到便去世了。黄夫人年轻守寡，只好带着5个子女，到北京投靠哥哥。

小庐隐的舅父是清朝农工商部员外郎兼太医院御医，家大业大，庐隐的表姊妹就有20多个。一个只会些女四书一类的姨母，把庐隐整天关在家里背书。可是她一年下来，《三字经》还没读完，黄夫人心灰意冷，视之为“笨货”。

9岁时，庐隐的母亲偶然得知城里开了一所美国人开办、学费便宜的教会学校——位于崇文门附近的女子慕贞学院。因为信教可以免学费，来读书的学生大都是农村贫苦教徒的女儿，所以平常的饮食极差，而且全日住校，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庐隐便被送到这里，开始了求学生涯。许是为了免学费，也许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寄托，她在这里皈依了宗教。庐隐在学校住到辛亥革命爆发。当时，母亲一家早已从北京逃到天津租界，丢下她一人在学校没人管。等她回到空荡荡的房子时，不由悲从心来……

半年之后，辛亥革命结束，庐隐的大哥从福州来到北京，庐隐就请他辅导功课，想去投考高小。一番努力之后，居然考中了。此后，黄淑仪改名为黄英，发奋用功，进步飞快，令人刮目，“笨货”也有了“聪明”之誉。尤其是13岁那年，她考取了五年制的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获得官费待遇，更令家人惊奇不已，母亲的态度也随

之好转。海明威说过，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就是不愉快的童年。然而，让她在成名与美好童年之间选择，庐隐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她在《庐隐自传》中写道：“因为我自己奋斗的结果，到底打破了我童年的厄运，但这时候我已经十二三岁了，可贵的童年已成为过去，我再也无法使这不快乐的童年，变成快乐……”

在女子师范学校，庐隐是班上最小的一个，年龄小、身材小，却个性泼辣，极有主见，同学们都跟她要好。她与5个年龄相仿的同学，结成全校有名的“六君子”。庐隐个性中的侠义之气，在这个时候显现端倪。

庐隐16岁时，一名叫林鸿俊的表亲走进了她的生活。他聪明英俊，曾留学日本，却家境贫穷，父母双亡，只得寓居在庐隐家中。庐隐无意中从他手里借了一本描写多情薄命女郎遭遇的小说《玉梨魂》，情节凄婉，为此淌了不少眼泪，斑斑泪痕洒在书页上。有心的林鸿俊发现庐隐同样是个多情人，便给她写了一封述说自己平生不幸的信。庐隐看后，顿生“同是天涯沦落人”之感，两颗孤寂的心渐渐亲密起来。

林鸿俊便向她求婚。黄夫人觉得林鸿俊没受过好的教育，家境清贫，便拒绝了。母亲的势利态度竟然激起庐隐的一腔义愤，作为反抗，她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态度：“我情愿嫁给他，将来命运如何，我都愿承受。”黄夫人只好答应，但也提了一个条件：对方必须大学毕业，学有所成后方可成婚。林鸿俊欣然接受，庐隐则帮他张罗了

2000 学费。总算，林鸿俊考进了北京工业专科学校，也与庐隐订了婚。

订婚之后的第二年，庐隐中学毕业，当时大学不招女生，她就在北京女子中学谋得一个教员的空缺。于是，18 岁的庐隐，走出了家门，走上了讲台，走进了社会。两年后的 1919 年秋，庐隐报考北京国立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因错过考期，在国文专修科旁听。后因成绩优异，她与同为旁听生的苏雪林一起转为正班生。

当年，五四运动席卷中国，天生叛逆的庐隐如鱼得水，今天集会，明天游行，后天讲演，积极参与社会工作，被推选为学生会干事、福建同乡会代表。同时，她与学生会主席王世瑛、陈定秀和程俊英三人年龄相仿，志趣相投，“四公子”的雅号不胫而走，闻名校园。

这时的庐隐已经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纵论社会，阔谈人生，倾诉女性的苦闷与烦恼，提倡女性的自由与解放。她的文笔俏拔，才思敏捷，经常一挥而就，片刻成文。也是在这个时候，她悄悄地将自己（隐娘）和林鸿俊（凌君）的初恋故事试写成文言小说《隐娘小传》，以表达她不计门第、不讲金钱地位的自由恋爱观。后来，觉得自名“隐娘”不雅，就换成笔名“庐隐”，取其“庐山真面目，隐约未可睹”之意。

此时的林鸿俊顺利地大学毕业，但他思想守旧，在山东糖厂当工程师，准备报考高等文官，踏入仕途，同时还劝庐隐不要过多地抛头露面，而应做一个相夫教子、贤惠居家的知识女性。庐

隐大为光火，一怒之下，与林鸿俊解除了婚约，业已成稿的《隐娘小传》也被付诸一炬。

曾经苦心争取的初恋，就这样匆匆结束，其中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或许有，因为这时她的身边出现了另一个男人——郭梦良。

郭梦良（弼藩），福建闽侯县郭宅乡（今福州市仓山区盖山镇郭宅村）人。1914 年，郭梦良入全闽大学堂读书，成绩优良，翌年与林瑞贞（赛英）结婚，不久，考入北京大学法科哲学部，并在福建籍学生北京联合会担任职务，与刘庆平、郑振铎等一起筹备成立福建同乡会。

1919 年初冬，庐隐作为女高师的代表，在北京学界福建同乡会成立大会上，结识了郑振铎、冰心等人，也结识了郭梦良。会上，大家决定创办《闽潮》杂志，由郭梦良任编辑部主任，庐隐是编辑。郭梦良性格沉稳，温文尔雅，胸有大志，庐隐才智敏捷，词锋锐利，风度卓然。在频繁的接触中，他们相识、相知、相爱。但此时庐隐与林鸿俊有婚约在身，而相爱的郭梦良则是有妇之夫。

1921 年，庐隐加入了茅盾、郑振铎等人创建



郭梦良

的文学研究会。她是第一批会员，登记序号13，是继12位发起人之后的第一位会员，也是首批21位会员中唯一的女作家。这时，以“庐隐”署名的一篇小说《一个著作家》经郑振铎推荐，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发表，庐隐的文学生涯开始了。

此后，才思泉涌的庐隐不停地写作、发表。诸多短篇小说一部接一部问世，1925年7月结集成《海滨故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1922年，庐隐从女高师毕业。她先是到安徽宣城的一所中学任教半年，后又进入北京师大附中教国文，生活逐渐稳定下来。同时，在郭梦良不懈的追求中，她决定彻底释放自己的天性。面对家人的责难、亲朋的嘲讽和世人的唾骂，她挺身向郭梦良坚定地表示：“只要有爱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紧。”

一语天下惊。

于是，郭梦良返回福州，就与庐隐的婚事向郭父和发妻林瑞贞及其娘家人征求意见。因为林瑞贞一直未能生育，两家人便同意了。

1923年夏，庐隐与郭梦良在上海一品香旅社以“同室”的名义举行了婚礼。庐隐与郭梦良当时均已成名，这一惊人之举不仅在文坛引起了震动，在当时社会也是争议不断。

婚后，两人遵郭父之命回福建老家探亲，与郭梦良的正妻同处一个屋檐下，过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冷遇、歧视、偏见，让向来我行我素、特立独行的庐隐难以忍受。不久，他们又回

到上海。

1925年，对庐隐而言，多事而坎坷。1月，26岁的庐隐生下女儿；7月，她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6日，郭梦良因早有旧疾，又劳累过度，终于一病不起，驾鹤仙去，年仅28岁。临终前，郭梦良为女儿取名“惟萱”，寓“惟有萱堂（母亲）”之意；后，庐隐将之改为“薇萱”，颇有几许对生活的无奈。

庐隐带着未满周岁的郭薇萱护送亡夫的灵柩回到福州，再次与郭氏正妻同处一室。面对亡夫画像，庐隐写下啼血文字《郭梦良行状》，三周年时又写《雷峰塔下——寄到碧落》，以“这断藕的残丝”，敬献亡夫的在天之灵。

1926年，经郭梦良的老同学介绍，庐隐到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国文课。8个月后，她带着女儿转至上海私立大厦大学附中教书，又当大学讲师、教授，兼女生指导员，住女生宿舍。后又因诸多不适应，返回北京，几番曲折之下，回到北京师大附中教书，与好友石评梅成为同事。1927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了她的第2部短篇集《灵海潮汐》。

时间来到1928年，她生命中的第三个男人——李唯建出现了。

李唯建，成都人，原名惟健，笔名四郎，诗人，翻译家。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长相帅气，个性阳光，因常在报刊发表诗作，与徐志摩、沈从文、邵洵美等名流时有交往。

1928年某天，李唯建经梁漱溟介绍去拜访林宰平教授。他见林宰平的书桌上有本庐隐与于庚虞合编的《华严月刊》，早生敬慕的他便萌生了拜访“浪漫女作家”庐隐之念。林宰平是福建人，与庐隐相熟，知道庐隐每周都要到瞿世英（菊农）家聚会打麻将。林宰平便向瞿世英打了招呼，请他约了庐隐在瞿家见面拜会。

是年3月3日，初次见面，约好10点，李唯建差不多12点才到瞿家。没能守时，让庐隐面露“一些不豫之色”。但深入交谈后，互相印象甚好，庐隐还应李唯建的请求，留下了她的地址：宣武门下斜街92号。

从此，两人开始长达一年多的通信往来，并在情感深处产生了火花。两人在通信时，李唯建自称“异云”，庐隐署名“冷鸥”。浪漫的李唯建对庐隐“同情心太大太深，便变为伟大纯洁的爱了”。这种情感的爆发，与庐隐的本性是何等的相似！但是，一路情路走来见惯世态凉薄的庐隐先是让自己冷静下来，婉拒之后又不免疑虑。她



庐隐与李唯建

直言：“我爱你太深，便疑你也深。”守寡有年，心思敏感的庐隐，能不如是乎！

然而，心灵的渴望，生理的需求，使得庐隐面对难以抗拒的情感攻势，再也无法也不想招架：“请你用伟大的同情来抚慰我吧！”

两个相识相知相爱的心走在了一起，个性昭然一往无前的他们以《云鸥的通信》为题，将68封情书连载于天津《益世报》（在陆晶清、谢冰莹合编的《华北民国日报·副刊》上亦有发表），后于1929年由北平法文版《政治周刊》译成法文，先行出版单行本。最后，于1931年由神州国光社定名为《云鸥情书集》面世。

社会多舆论，世俗好八卦。想当初，庐隐毅然退婚于理念不同的林鸿俊，“做小”下嫁于使君有妇的郭梦良，如今新寡当年又携女与一个小她8岁的青年大学生谈恋爱，并昭告于天下——这哪一桩事情不是一颗颗掷入社会舆论旋涡中的石子，哪一番举动不是一枚枚扔向世俗礼教大海里的炸弹！

1929年9月30日，庐隐的好友女、作家石评梅患急性脑炎病逝。10月，庐隐依石评梅遗愿，将其灵棺移葬陶然亭畔，与生死恋人高君宇墓碑并峙而立。此后，庐隐以高君宇、石评梅为原型的长篇小说《象牙戒指》问世，成为她的代表作之一。

1930年8月，庐隐辞去北师大附中的教职，与李唯建带着爱女郭薇萱东渡扶桑度蜜月。这是她第二次到日本。到了年底，却因当地物价通

涨，经济不支，他们只得离开日本回国。

庐隐一家寄寓杭州西子湖畔，1931年2月，她在杭州生下二女儿，取名瀛仙（后因排行，改为恕先），以纪念东瀛之旅。在杭州的半年，庐隐的名篇《象牙戒指》写就。

8月，他们来到上海，住在静安寺附近的愚园路愚园坊20号。经好友刘大杰等人介绍，庐隐进入上海工部局女子中学（现上海市第一中学）任教。之后，又介绍李唯建认识了中华书局总编辑舒新城，让他进书局任特约编辑。于是，庐隐过上了她人生中最平静最安乐的一段生活，创作发表热情日益高涨。至1933年，她先后出版了《玫瑰的刺》等4部短篇小说集，《归雁》《女人的心》等4部长篇小说，待出版的还有《庐隐自传》《东京小品》《火焰》及《格列佛游记》（译著）4部著作，共12部作品。

1932年初，淞沪血战后，庐隐跳出了由家庭生活、社会环境筑成的囹圄，着眼于民族战争，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创作了中篇小说《地上的乐园》和《火焰》。特别是后者，她写出了反映十九路军抗日几大战役全程，较直接地反映了在为国家存亡而斗争中的人和事，仿佛是一部战事的大型通讯报告，可算作同时代同题材长篇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作品。与此同时，在写作技巧上，也能看出有较明显的进步与成熟。

然而，天妒英才。正当庐隐从悲情和颓唐中振作起来，目光投向了社会与国家之时，不幸悄然而至。

1934年5月13日上午11点20分，庐隐难产，为省钱请民间的接生婆接生，结果，子宫被接生婆划破，导致血崩，送医后不治，在上海大华医院14号病室去世，享年35岁。

庐隐的死亡完全是由于庸医所误，当她生命垂危之际，李唯建悲愤交加，曾欲写一状控告医生，但庐隐劝阻了他：“算了，不要去告了，人已将死，告他又有什么用呢？”足见其性情中的宽厚，亦显她生活中的无奈。

庐隐离世，李唯建悲痛欲绝，已不能作为。庐隐的后事由舒新城、刘大杰等，于次日在上海中国殡仪馆，遵照庐隐遗嘱，按宗教仪式入殓。李唯建将其生前已出版的8部著作放入棺内，同葬于上海永安公墓。

其时，27岁的李唯建也已无力抚养两个女儿。舒新城便又出面，请庐隐的生前好友与庐隐的哥哥黄勤来到上海，将郭薇萱交给黄勤抚养，庐隐的著作版权也归大女儿所有。李唯建则带着小女儿郭瀛仙回到故乡成都。

庐隐逝世周年，李唯建作《忆庐隐》追怀，古稀之年又作自传体长诗《吟怀篇》回忆与庐隐恋爱、生活的往事，言及“冷鸥空留逐波影，异云徒伤变幻性”。1981年11月，李唯建逝世于成都。

庐隐说：“我想游戏人间，反被人间游戏了我！”

隐去庐山真面目，冷鸥独舞自从容。诚庐隐哉！